

炎黄春秋

第 **7** 期
2010年

“以党治国”面面观

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

罗隆基和他的法哲学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目 录

一家言

- 1 “以党治国”面面观 于一夫
7 也谈阿克顿的名言 许良英

亲历记

- 8 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 尹曙生
14 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孙亚英
19 日军投降后的牡丹江 闫 强

往事录

- 23 中国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 杨汝岱
29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孙言诚
34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纪事 陈 兵

春秋笔

- 39 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 崔增印
41 都是日记惹的祸 韩振国
40 穿“尿素裤”的特权 陈世高

故纸堆

- 43 淮海战役日记摘抄 庄 重
51 大饥荒年代迫害上访者史料 赵宗礼

人物志

- 55 罗隆基和他的法哲学 喻 中
61 田纪云副总理二三事 邱 源
64 老记者尤淇 刘谓福
67 痛悼朱厚泽（诗一首） 吴 象

沉思录

- 67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吴 江
70 也谈“中国式思维” 苏仲湘 遗稿
73 暮年的反思 徐 孔

争鸣录

- 75 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
..... 张素华

求实篇

- 76 刘少奇和江渭清的一场争论 王永华
81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肖 磊

海外事

- 83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尹振环

编读窗

- 87 读者来信摘登 裴国成 霍拥军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副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 徐庆全

社 长 助 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 李 晨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吴 思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 yhcqxf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以党治国”面面观

• 于一夫

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对“以党治国”论提出严肃批评。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在最后一次“南巡”谈话中,更明确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反映了邓小平的遗愿。然而,他所反对的“以党治国”论,却始终阴魂不散。鉴此,考察一下“以党治国”论的来源、演变及其危害,不无现实意义。

一、“以党治国”论的提出与演进

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屡受挫折后,改奉“以俄为师”,将苏俄“党化国家”的体制引入中国,提出和推行了“以党治国”论,这便是“以党治国”的发端。

早在1915年,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920年,他更强调党是民国的根本,郑重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改组期间,孙中山解释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注1}孙中山把建国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训政时期“党在国上”。他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注2}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在阐述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时强调说:“‘以党治国’是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取向的政治模

式,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和“三阶段论”发展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走上了专制独裁之路。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要求国人对领袖绝对效忠。在推行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党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应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注3}“以党治国”经过这样的演进,就成为建立“党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基调,从而使中国宪政化进程出现大倒退。

二、“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以党治国”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就曾出现过“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注4}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实行“三三制”^{注5}，“以党治国”与“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显然难以协调。于是,邓小平于1941年4月15日著文对“以党治国”论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进而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

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又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认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注6}

但是，邓小平这种语重心长的提醒，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194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注7}这种发端于抗战时期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实行，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本应逐渐健全法制，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然而，最高领导层已经形成的“以党治国”观念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强化。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继而在和1958年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之后，在政法机关突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更使“党化国家”成为定型。它的最集中的表现，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注8}其时，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这些论断，就是“以党治国”论的极端表现。这种主张使党权无限膨胀，任意毁弃法制，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亿万人民身受其害，也使执政党自身

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

三、“以党治国”的实际运行

“以党治国”并非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党内高层的共识，当时主管和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都曾讲过类似的话，指导政法机关按照党的意志去执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以党治国”在实践中是如何运行的：

（一）执政党不受法律的约束

1955年1月间，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从刘少奇的上述指示来看，他认为法律是由党领导制定的，明确把执政党置于法律之上。这种观点与“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法治理念相距甚远。实行的结果，就是导致在“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随意破坏法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二）政法机关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和指示非常之多，下面引述几例：

1955年7月间，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彭真在座），刘少奇说：“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

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他强调说:“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刘少奇还再三强调:“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1955年9月19日,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1957年9月4日,在中央法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罗瑞卿发言中批评“某些司法、检察、法院强调司法独立,垂直领导,不听党委的话。”会议最后由彭真做总结,要点有三:1、政法部门普遍存在着右倾思想。2、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的进攻极为猖狂,攻击我们是“以党代法,党政不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3、党委的领导。政法机关这个专政的武器必须牢固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党委应当领导政法机关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各级政法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委(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第二部分是“关于政法工作问题”,他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就召开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经过一年来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检察机关共挖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此前,检察系统的干部编制最多时为四万三千人)。”会议批判了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忽视党的领导或者把党的领导抽象化的错误路线,进一步强调:“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会议认为党的领导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问题。”

从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⁹。最后形成的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议认为,“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从上述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指示和有关文件的表述来看,执政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检法机关,都是由党直接掌握的用以镇压异己势力的工具,各级政法机关和所有干警,都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至于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那只是对外宣传用的,“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在内部的实际运作,则根本不承认什么审判独立,谁主张按照宪法的规定实行独立审判,谁就是反党。

党的领导人对政法部门负责人一再耳提面命以及在内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得非常清楚,由此而形成了由党委审批案件等一系列潜规

则,这些潜规则不向社会公布,但却具有强制性约束力——这便是“以党治国”或曰“党化国家”的典型运作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些观念的指引下,加上一系列潜规则的运行,在反右派运动中把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大批同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和给予各种处分,有些被送去劳改、劳教,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以致把整个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也尽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以党治国”的体制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一声令下,当年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罗瑞卿以及高层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也就毫不足奇了。到了此时此刻,刘少奇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围攻他的造反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但是,打倒刘邓彭罗难道不是“党的决定”?

(三)执行法律就是办一个手续

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在执政党领导人看来,所谓“依法办事”不过就是办一个法律手续而已。在逮捕的时候未经检察院批准,事后补办一个手续就是合法的了。所谓“程序意识”之类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宪法和法律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摆设,甚至成为掩盖“以党治国”的挡箭牌。

(四)无完备的法律更便利

1956年3月31日,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说:“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很不完备,大家全说无完备的法律很麻烦,但也有便利之处。我们办案时,只要站稳阶级立场,根据

政策,按照阶级利益来办事就可以了。……我建议大家不要死抠法律条文,主要应把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搞熟一点,当然能记住法律条文更好了。”

当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表态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进程骤然中断。随后,就开始了公安工作“大跃进”,各地完全撇开了正常的办案程序,随便捕人和胡乱判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连彭真本人也被关进了牢房。如果按照他上面所说的办案依据来看,当时对他的处理既是“站稳了阶级立场”,又符合当时的政策,还是“阶级利益的需要”,用不着“死抠法律条文”。

(五)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

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对公安部长谢富治^{注10}的报告,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批复中说,中央书记处决定:

1、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

2、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个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合署办公,并且是采取了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并到公安部的方式,实现了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和彻底的“一元化”。就党内的领导体制来看,明确规定三机关都“由公安部党组统率”,明白无误地把“两高”直接置于公安部的领导之下,成了公安部的附庸。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敏捷、高效——凡是公安部决定了的事项,由“两高”负责去执行,完全取消了法院和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 and 制约。从此确立了公安的“老大”地位,对后来三机关的关系产生了深远

影响。

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平行机构,统称“一府两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公安部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它与“两高”并不处于平级的地位。就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职权分工来说,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批捕和起诉,法院负责审判。按理说,批捕、起诉和审判,都是对侦查工作的检验和把关,如果发现侦查中有违法行为,应予纠正;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应该判决无罪,其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和避免冤假错案。然而,当时决定将三机关合而为一,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就对“一府两院”体制作了伤筋动骨的改动。采取这样的大动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说不通的。于是文件规定:“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庄严的宪法就这样被任意揉捏,弃如敝屣。这一决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为一体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建制,改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进而提出“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实际上谁还“分家”?完全搞成了“一锅煮”和“一勺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各级党政领导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而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几个罪名就判处了刑罚^{注11}——“以党治国”竟然走到了这种地步。

以上五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以党治国”的实际运作情形。

四、灾难造成后的调整与反思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强迫命令风等“五风”泛滥,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为了压制民众的反抗,又滥用专政工具,把对当时的某些做法稍有不满意而发牢骚,或者饿

极了偷青吃青的无辜民众作为专政对象,乱捕滥杀,更加重了灾难。

种种惨状冲破层层封锁反映到高层。大量饿死人和乱捕胡判的情形令人震惊,促使当权者的头脑渐趋冷静。大约从1961年起,在一些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开始出现了反思的声音。下面摘引几段对政法工作反思和纠偏的讲话,听听当时是怎么说的:

1961年6月24日,当年鼓吹三机关合署办公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中央公检法三机关碰头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一番似乎是批评别人的话:“从我们三家来说,有过‘三起三落’。这几年公安的毛病,是腿伸得太长了,把一些不属于公安的事情也拿来办了。检察、法院的腿太短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1961年7月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又说:“公检法三家的职责,这几年也搞乱了。下面有的同志说,‘公安共了检察、法院的产’。中央政法三机关搞一个党组,一个机关,是一种没有调查研究的、简单化的做法。……不能刮‘共产风’,不能把检、法当做辅助工具。过去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如‘一员顶三员’、‘一长代三长’、‘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等等,现在要很好清理一下。”

反思比较彻底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分析造成巨大困难的原因,直接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这几年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注12}

话虽不多,但画龙点睛,触及了最要害的问题。

所谓“驯服工具论”,原本是由刘少奇提出的。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就是贯彻刘少奇的指示,特别强调了“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但是,刘少奇的最大优点是勇于承认错误。到1962年5月,由他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时,他便明确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这种知错必改的态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令人感佩!然而,正是由于刘少奇在认识和提法上的这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以党治国”的正统,种下了后来他被打倒的种子。

五、能否记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刘少奇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可谓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然而,类似的冤案又何止千万!“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是“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供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等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仅此一案就株连数10万人,整死1.6万余人!将诸如此类的冤案加起来统计,全国该有多少无辜民众惨死在“对敌专政”的刀锋之下!能说这些冤案都是由于偶然的失误造成的吗?实际上,它正是推行“以党治国”致使法治荡然无存的必然结果。

笔者身经目睹了共和国60年的沧桑巨变,一方面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匪夷所思之事心有余悸。回顾刘少奇、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等等先烈的遭遇,仿佛又听到无数冤魂在悲泣呼号。不禁想起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一句千古绝唱:“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但愿国人能够惊醒,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

2010年5月27日第12次修改

注释:

注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99页。

注2 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年版,第1092页。

注3 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注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注5 “三三制”是指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大体,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注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0~14页。

注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注8 转引自张懋:《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注9 《司法部关于报送〈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的函》(司发函[2003]158号),2003年10月29日。

注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瑞卿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了公安部长。

注11 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注12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责任编辑 杨继伟)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也谈阿克顿的名言

• 许良英

《随笔》2008年第6期上林非的文章《阿克顿的一句名言》,介绍了阿克顿的生平、他这句名言的意义及其历史背景,无疑是有价值的。但遗憾的是,文中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作者没有准确地引述阿克顿这句名言的原文,而只是转引了马英九于今年6月的讲话:“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马英九并没有说明这是阿克顿的话,而它与阿克顿的原话有很大出入。阿克顿的原话十分简单明了,原文是: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译成中文,应该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这是他1887年4月5日给克莱顿(Ma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中说的。这句话无论在逻辑结构和文字含义上都超过马英九所转述的那句话。

阿克顿(Acton, 1834—1902)主编过《剑桥近代史》,发表过不少学术著作,但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却是这句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名言。这句名言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流行。可惜引述者都是辗转引述,并未直接查阅原文,未免走样。

例如李慎之1999年10月写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50年》中就引了这句名言,但被写成:“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我读到 he 寄来的文稿时,即向他指出所引用的阿克顿的名言的译文不够准确。在2003年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我也提到了这一点。

2001年出现了两个阿克顿文集的中译本。一个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与权力》,把这句名言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另一个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



阿克顿勋爵(1834—1902)

由的历史》,书中没有译阿克顿与克莱顿的通信,但《中译者序》开头第一句就是阿克顿这句名言,被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把“tends”(趋向)译成“导致”或“使人”,显然不符原意。原文的意思是:权力本身就会腐败,并不是它“导致”或“使人”腐败。腐败是指权力本身,是制度,不仅仅是掌权的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何等简洁铿锵有力!塞进“导致”或“使人”,无异画蛇添足。

2001年在《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序》中,我曾指出这种翻译的错误,可惜未引起人们注意。

此外,林非文章中介绍洛克(Locke, 1632—1704)时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说洛克是“法学家”,这样的定位是缺乏根据的。洛克没有专门学过法律,大学时学的是古典文学和哲学,后又转

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

• 尹曙生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使“四清”工作受到影响。通报要求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四清”工团、队,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四清”运动各项方针政策,保证“四清”运动健康发展(通报大意)。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法乱纪层出不

穷,屡见不鲜。在批斗会上,刑讯逼供,将人活活打死、逼死,时有发生。但是,把人打死、逼死(自杀)后,还要对尸体进行面对面的批斗,笔者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当时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巴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上世纪80年代后曾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电话通知,告诉我说中共中央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原公安部干部,后调任此职)。

学医。他虽非专业医生,但精湛的医术使他成为全欧洲的名医,并被刚成立不久的皇家学会选为会员。1669年他认识了倾向民主的辉格党创立者阿什利(Ashley)勋爵(3年后晋封为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遂被聘为家医和秘书,从此涉足政坛,逐步成为催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因此,马克思称洛克是“自由思想的始祖”。罗素称洛克“不但是认识论中经验论的奠基者,而且也是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1997年去世的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更是称颂洛克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流的哲学和政治传统之父”。

其次,林非文章中引了《政府论》中的一句话,下结论说:“为了保卫大家生命的安全,当然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使用”。似乎生命权是人的唯一权利;与洛克的原意相距甚远。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的“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是”一章中,明确提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使自己处于政府领导之下,其真正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所有物(Property)”,即“人的生命(Lives)、自由(Liberties)和财产(Estates)”。这成了1776年杰斐逊(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拉法耶特(Lafayette)在杰斐逊帮助下起草的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源泉。

谈到阿克顿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名言,不能不联想起与此异曲同工、交相辉映的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的名言。爱因斯坦终生沉浸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同时也热切地关怀人类命运和社会现实。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明晰而精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观。

他在文章中说,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有强烈的感觉,并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与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相得益彰,并可互为解读。

2008年11月22日
于北京中关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西北局撤销后,调回公安部工作)要到西宁来,详细了解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批斗已经自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我在电话上对他说,“四清”工作总团(当时湟中县“四清”运动全面铺开,设“四清”工作总团,领导全县“四清”。总团团长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下设几个分团,分别领导几个公社“四清”,分团团长的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担任。公社设“四清”工作队,队长也都是由厅、局级以上干部担任,大队设“四清”工作组,组长一般都由科、处长担任,工作队员共3000多人)已经上报西北局,西北局发了通报批评,我们已经学习了通报精神,正在贯彻执行,还要了解什么情况呢?答国栋回答说,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对“四清”运动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气愤,说上次总团的报告不详细,派张之轩同志来进一步了解。由于时间很短,你先去把情况搞清楚,等他来了之后,由你汇报,如果他要亲自下去调查,你再陪他去,这样可以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我无话可说。向分团长(民政厅长)、副团长(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即制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那个人)汇报省委政法委的电话通知精神。两位团长对我说,你去吧,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没有派人去详细了解,总团派法医检验尸体,但是也没有把全部情况搞清楚,就仓促上报。这次你一定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教训。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原组长仲××因组织群众批斗尸体,在中共西北局通报发出之前,已经被“四清”工作总团除名。我通过和“四清”工作组成员座谈了解,然后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四不清”干部座谈会,和工作队员、群众个别谈话,还找了被批斗过的大队长、会计、两个生产队长个别谈话,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只用了三天两晚,就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写了报告,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张之轩到西宁后,看了报告,认为很详细,不需要再下去调查。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

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都不是青海人,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了王昭的动员报告。通过学习,大家总的认识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不少社、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

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说,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嘛!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和马××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

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把马××叫来,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

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三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他们不愿意学习仲组长的做法。仲组长想,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

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工作组员看到这场面不知如何办,因为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怕她诉错了苦,他们看着仲组长,让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他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

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杂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杂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杂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女儿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屁。

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

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在诉苦过程中,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吆”一声,终于跪下了。

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毯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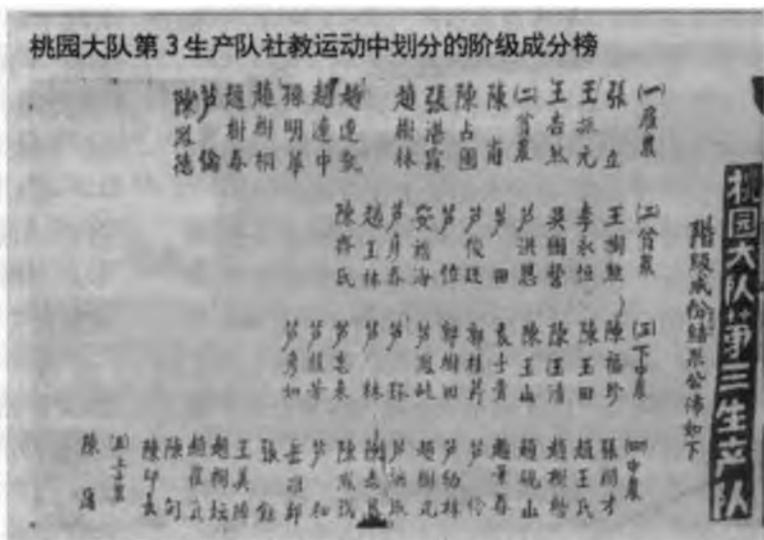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并故意大声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要求批斗他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桃园“四清”工作队张榜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仲组长这样说,其他人不好说什么,只有公社秘书明确表示赞成批斗尸体。

但是,如何批斗呢?

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

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说,找借口。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

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

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

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借口不来,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悔改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当时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没有敢看尸体。她听沈排长讲,马××死后丑陋无比,舌头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长,她接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

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死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省解放后,他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是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历史没有问题,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行的。当大队书记既不是自己篡夺的、也不是坏人混进来的、更不是拉拢腐蚀上级而得到这个位置的。

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四清”运动的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都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煞有介事,似乎中国当时真正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其实不然。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政策的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呢?尤其是广大农民,对“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还人民以公道。可这些基层干部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农村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时,老百姓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少数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为非作歹,

欺压百姓,从“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他们的恶行来看,有的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

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他们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执行中央左倾路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中央又不承担责任,群众放不过他们,“四清”工作组放不过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假如没有“大跃进”,他们会这样吗?现在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坏事、饿死人的账,都算到他们身上,是不公道的。要负责的,首先是“大跃进”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其次是地方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最后才是基层干部。毛泽东也知道在“大跃进”运动中会发生违法乱纪情况,也表示要纠正。但是,不丢掉他的乌托邦的幻想,是纠正不了的。谁要是反对“大跃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尽管他在“大跃进”时期也说过一些不要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要违法乱纪的话,但是,在根本不改变左倾路线的前提下,这些话只能是表面文章,不会起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深入,毛、刘发生分歧,毛就通过“四清”运动作为预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通过实践,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由于“大跃进”的毁灭性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农村、牧区农、牧民的生

活状况仍然非常艰难。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粑。要解决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不经过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是不行的。牧民除了勉强能活着,不被饿死外,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团要求每个工作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四清”工作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300多名队员中,一共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太左)。还有一个工作队员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结果胃扩张,因治疗不及时,被撑死。在这么贫困的农村,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左倾路线,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对犯罪的要依法处理,而不是兴师动众,人海战术,抓什么阶级斗争,搞什么反修防修。队员中有很多人理解,但是谁也不敢说,硬着头皮撑下去,反正只要能熬过那几个月,就没事了。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伟)

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 孙亚英

—

人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

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鸣放时,党校语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写,往往到散会前才问我一句:“你有什么意见?”我摇摇头,就完了。这是因为,我母亲一再教育我在政治运动中少说话。党校也把我看成个娃娃干部,没有诱导我发言。因此,我躲过了“阳谋”这一劫。

1958年,三面红旗、全民炼钢,农业上全国各地竞相吹牛,亩产过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结果是三年大饥馑,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种情况下,中央直属机关抽调了一万名干部,下放到全国各地,号称中央万名下放干部,简称“万干”。我是万干之一。

此前,中央党校撤销语文教研室,组织调我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情报所动员干部下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势,热火朝天,在此国难当头,谁能不挺身而出?我写了申请。当时并不完全是假心假意,我有我的想法。我相信我也会按时回来,轮流下放,迟早要去,那么,迟去不如早去。另外,我母亲已过世,我一身无挂碍。下放的名单公布了,果然有我,同事们都向我道贺。

名列“万干”的同志们,从1960年的11月25日,到1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听了中央七位领导的报告,这七位领导是: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安子文、习仲勋、陈毅、周恩来。这是中央万干以前下放的同志没有过的殊荣。

七个大报告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先讲形势,然后交代任务,有的领导又讲了些工作方法和下去之后的注意事项。

至于下去之后的任务,七位领导也大致讲得相同,要我们带着关于农业工作的中央十二条下去,认真宣传贯彻。宣传十二条同时,进行整风整社,解决五风不正,组织不纯的问题。所谓五风不正,是指农村干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贪污腐化风”。至于组织不纯问题,是指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到了封建主义残余势力或阶级异己分子手中。要我们通过整风整社,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讲清形势,交代任务的同时,七位领导都不同程度地讲了激励我们的话。如李先念说:“下去任务是艰苦的,但也是光荣的。”李富春说:“你们下去要把局面扭转过来。”谭震林甚至说:“你们是要去扭转乾坤的。”安子文是搞组织工作的,他特别强调了下放干部的质量,说:“这次下放的干部,要政治好、思想好、身体好的,而且要责任心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这次要做到绝对自觉自愿,有百分之一勉强都不要去,你们自愿了,我们还要审查,看够不够格。”陈毅在报告中说:“人民有苦难,你们是共赴国难去的。要有所牺牲,要准备牺牲你们的健康。”周总理在报告的最后告诉我们:“你们下放,不能带家属。”

七位中央领导的这些话,给了我们很强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但是有一点,我们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七位领导没有一位说过,你们下去了就不再回来,永远脱离了你们的专业。

在听这七个大报告同时,我们就已经不经常活动在自己的原单位了,更多的时间是和万名下放干部在一起。下放干部是从各单位抽出来的,彼此都不认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这些任队长的人曾明明白白说过:“这次下去要轻装,绝对不能带家属。”“工资关系、粮户关系,愿带下去

的就带下去，不愿带下去的可以留在原单位，每月由原单位给你们寄。”我当时十分留意，也是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确曾说过：“三年到五年，最长不超过七年，待农业过了关，工业上了马，不一定调回原单位，但有专业的，一定让你们归队。”说以上这些话的人，我至今已经说不上名字了，但有一位我能指名道姓地说出：那就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他在1960年12月一个很冷的下午，地点在北京西郊中关村“四不要礼堂”（这个礼堂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不知省缺了哪四种建筑材料，故名）给我们送行时曾清楚地说：“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欢送大家奔赴光荣的下放岗位，几年之后，我仍旧会在这个地方，欢迎大家凯旋归来。”至今言犹在耳，当时中科院下放的几百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1960年12月20日，我们整顿好了简单的行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被单位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北京火车站。当时大家热情很高，领队的人还领着大家唱“笑洒满腔青春血，一生交给党安排”，气氛十分热烈。有些家属来送行，无论是送行的人，还是被送的人，没有一个掉泪的。

二

1960年12月22日到达成都。到了成都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省委招待所。吃第一顿饭时，服务员让我们八个人一桌坐好，然后给我们端上来几盘简单的菜，最后，用和洗脸用的搪瓷盆一样的盆，端来一盆米饭。吃完了一碗之后，盆里的饭就没了，大家都感到没吃饱，就很客气地问服务员，是否能再添点饭。服务员也很客气地回答我们：“对不起，每桌只能有一盆饭，这是我们这里的定量。要用竹片片把盆里的饭平均划成八牙，每牙是二两，只有这么多，不能再添了。”大家回来之后，不免偷偷议论，在北京，我们的定量都是每月二十七斤，这里一顿只许吃二两，看来定量有可能减少，下到基层之后，还不知是多少。

在成都大约只住了两三天，下达了省委的决定，把我们下放四川的二百人，分到四个县里：即温江专区所属的彭县、新都县和内江专区所属的乐至县和简阳县。然后

念了名单，我被分在彭县。分在彭县的五十位同志，原先也都是不认识的，住到县委招待所之后，互相介绍了一下，五十位同志中大多是从农村参军后刚转业青年人，在中科院他们在治沙队、绿化队、汽车队及房管所工作；其中只有三个人是知识分子，那就是搞哲学的李风山，在中科院学部任学报编辑的李崧生，他是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此外就是搞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我。我们五十个人，一人分在一个大队，平时是不大见面的，只有到公社开会，或到县上开会时才见得到面，彼此交换一下情况。下到基层之后我们被通知，每月定量为十九斤，每顿二两粮，在哪里吃饭就交十八斤粮票，每月可剩余一斤自由支配。

下到农村之后，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说衣，四川的冬天，虽说地里看得到绿色，似乎气温比北方高，但是人身体上的感觉，却比北京冷得多，因为在京的单位都有暖气，无需穿厚的棉衣。这里却是屋里屋外一样冷，有太阳的日子，甚至屋里比外面还冷些，棉衣棉裤都上了身，还是冷得伸展不开。而且那种冷，带着很浓重的潮湿，在屋子里坐久了，觉得好像有冷水在慢慢地往衣服里浸。晚上上床时，觉得被褥似乎都是湿的，潮润润，甚至一夜脚都暖不过来。

然后说住。队里给我们找空着的房子住，没人住的茅草房，倒是哪个队都有，有些男同志是几个人住在一起，竹瓦公社只分来了我一个女同志，我是单独住的。我在各生产小队住过很多种不同的居室，有时住无人住的草房，有时让我住保管室。在这种像古庙一样的保管室里，我度过了不少一灯如豆，枭鸟夜鸣的夜晚。在北京没有



欢送下放干部

过这样的境况,有时难免害怕,但一想到我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给中央丢脸,自己就想法给自己壮胆。

吃饭,我们下放干部都在队里的公共食堂,每天交六两粮票,实际没有多少粮食可吃,大家都吃糠稀饭,一大锅,百分之八、九十是糠,只看见几粒米。情况比较好的队,还有点水煮厚皮菜(当地人叫它瓢儿菜)吃,情况不好的队,连菜都没有,只吃炒盐下糠稀饭。开始的一个阶段,大家是感到没吃饱,但还没有承受不了的感觉。原来,我们没有过长期挨饿的经验,等到顿顿如此,日日如此,到两三个月之后,就受不了。脑子里总想吃的东西,有时自己有意扭转思绪,不许这样没出息,命令自己想别的,想工作,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又想到食物上去了。同时还觉察到,饥饿不但会增加身上的寒冷感,入夜之后还会睡不着。平时我们在社员面前,硬绷着劲,不表现出来,可是,下放干部聚到一起开会时,一聊起来,才知道大家都如此。我们还互相告诫,互相鼓励,绝对不能在农民面前说吃不饱,也不能在工作中表现出无精打采,别忘了咱们是中央下放干部!只有当我们自己人聚到一块时,才忍不住要进行精神会餐。

在安排好吃、住的同时,我们毫无耽搁,就按中央领导的部署开展了工作。连续下到各个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央的农村工作十二条和四川省委制定的四十一条。然后,我就开始用开小会或个别走访的形式,向社员了解队干部的情况,准备开展整风整社。这可比宣传十二条难多了,社员们开始什么都不敢说,问我:“你们还走不走?”我回答说:“不完成任务我们决不走。”后来,我就想方设法先跟一些女社员聊天,渐渐能摸到一些情况了。公社官家齐书记曾告诉我,大队刘家富书记是可信赖的,于是我就找刘书记帮我,从他那里了解了大部分干部的底细。经过很多座谈访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所在的这个管区,不存在组织不纯的问题,因此不必换干部,这就好办多了。了解到干部中有些刮共产风、多吃多占、瞎指挥、强迫命令等作风,甚至有人打骂社员。对此,我就依靠党组织,多次找他们谈话,待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时,再开社员会,让他们自己作检查,社员提批评意见,经过这

样的几次,直到社员感到满意为止。

边整风整社,有时我也随大家一起下田劳动。由于口粮不足,出工的人不多,只不过是打打土块,压一压冬小麦,天暖一些之后,跟社员一起种过洋芋。刘家富书记说:“领导农村生产工作,你确实不行,我们开会你可以听,你先帮队干部管管各队的肿病病人,登记一下死亡人口吧!”从此我就专职干起了这项工作。

原先我已经知道,各个生产队都专门辟出了一个地方,大都是几间连通的屋子,用来容纳肿病病人,我轮流下各个队去看,把这些肿病病人都造册登记,姓名、年龄,肿的情况等等。每个队都有,少者四、五人,多者十几人,年老的年轻的,中年的都有,他们大多是腿肿脚肿,一按一个坑,有的脸上也肿了,蜡黄而且发亮。他们集中到队部来,主要是方便食堂给他们送不同于社员糠稀饭的另外一种稀饭,我看到过,只是米的比例比我们多一些,还是加了糠的。在那个普遍缺粮的年月,对他们已经算优待了。我常去看他们,问他们饱不饱,他们不说话,只轻轻摇摇头。我明白他们是在度命,其中有人有什么变化,我马上向队长汇报,看能不能给他们加些什么,大多数生产队确实没有粮食再给他们加,更没有药物给他们。其实他们的病不需要药,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他们都会好转。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却无法援救。肿病病房里,不断有人死去。于是我手里有了两种花名册,一是病人花名册,一是死人花名册。从这一册入那一册,有时变化得意外迅速。我在日记上写道:“昨暮同为人,今朝在鬼录”。虽然都是素昧平生的人,但我确实为他们悲悼。

女社员除肿病外,还有一种病,就是子宫脱垂,她们不愿集中到队部来,都住在自己家里。队上的妇女主任了解情况,我就请她领我一家家去看,大多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脸色很不好。我问她们是否有另外吃的东西?妇女主任说,由于她们不集中,食堂无法给她们送,只能由家里人给些照顾。对这部分女病人,我也作了另一册登记。奇怪的是,子宫脱垂的女病人,却比男性肿病病人的死亡率低,她们往往奄奄一息,都很少死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集中到肿病病房的青壮年,会突然死去。开始我对这种现象

是不解的,问队干部,他们说,壮劳力,正是能吃的时候,他们的亏损比老年人更严重,所以会突然死去。他们还告诉我,今年(即1961年)已经比1959、1960两年好一些了,前两年壮劳力比这死得还多,往往倒在田里就死了。我黯然,无言以对。

其中有一个肿病病人给我的印象最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姓陈,以前是队上的篾匠。他告诉我,家里有儿子和儿媳,都对他不好,嫌他没用,不想管他,只好住到队部来,看来只有在这里等死了。我非常同情他,所以常去探望、劝慰。那时,我们中央下放干部每月还由县里配售三、四块甜点心,都是县里食品厂加工的极粗糙的一种,如果在北京,恐怕没有人稀罕,可是到了这种境况之下,可就成了难求的宝物了。我每月买回来,都送给这位陈姓老人吃,他也不大推辞,都收下。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神情特别不好,已经躺着不能起来了,见我进去,从枕下抽出一双竹筷,递给我说:“我恐怕不行了,熬不了多久了,这辈子没法谢你了,给你削了一双筷子,将来你带回北京作纪念吧!”我仔细看看那双筷子,较普通的筷子略长,上端雕刻着一条龙,我知道老人费了不小的劲。我把筷子拿在手里,忍着泪说:“老人家不要乱想,困难会过去,粮食情况也会好转,您的病会好的,耐心地养着吧!”果然,没有几天,老人过世了。那双筷子我一直珍藏着,那是一颗老人的心。可惜在“文革”中抄家时丢掉了。

看到一个一个的饿殍,我头脑中忽然冒了一个问号:我们出京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听中央领导的报告,不是说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市受灾,灾情遍及九亿亩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总产量还是超过了1957年吗?既然如此,为什么1957年没有饿死人,反右还反得轰轰烈烈,何以1961年反而这样大家挨饿,而且大量饿死人呢?我们下放干部聚到一起时,三、五个人也偷偷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所看到的情况,为什么和在京时所听到的不一样?当时,我们天真地一致认为,可能是四川的干部没按中央的政策办,以致弄成这副样子。当时,中央万千中,没有我的熟朋友,我没和别人通过信,所以不了解其它省的情况。和我一起下来的义务兵们,他们的战友却是各地都有,他们告诉我,从战友们的信中得知,

其它省也有和四川相类似的情况,有的省甚至比四川还厉害!我大吃一惊,这么说,不是四川一个省出问题了,难道是全国的普遍情况?若真如此,问题岂不出在中央了?……当时不敢想,也不敢信,只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就是我当时真实想法。造成一个人如此盲从,要多强的思想禁锢力,才能锻筑出如此深的奴性啊!

我相信人们常说的人心换人心这句话,只要自己一直以诚心待人,大多数人也会以诚心待自己。在竹瓦公社各个队住了半年多以后,在农民中我已经有一些能谈真心话的朋友了。

首先是大队书记刘家富,年岁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个干脆爽快,工作很有魄力的人,我和他有过一次交心较深的谈话。那是在下了一夜雨之后,早晨,他到破草房来看我,我正坐在床板上发愁:屋里进了很多水,床下的脸盆和鞋都漂起来了,坐在床边脚就在水里。他看了看说:“你是在北京长大的,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蹲得惯啊?”我抬头看了看他,缓缓地说:“是的,刘书记!我想家,有时候很想,甚至做梦都回了北京。可是,我也想过另一个理儿,我生在北京,有这么一条退路,就有这种跑回去的想头,如果我自幼生在这儿呢?我又能怎么办?总不能生在北京就比生在这儿高一等吧?”刘家富十分动容地看了我一阵,深深地点了点头。自此之后,刘书记对我更关切了。

经我半年多的观察,真正的、贫苦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最怕三件事:火烧房子,家里有长期病号,或死猪死牛(四川大多是水牛,有的社员替队里代养)。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尽可能地倾囊以赠,并且告诉他:“这钱不是借,是给你,不要你还的。”我当时母亲已病故,没有经济负担,行政十九级(这个级别是1956年在中央党校时定的,是讲师级),工资要算高的,助人并不困难。农民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可是从他们日后的行动看来,他们是很记情分的。后来“文革”中我在彭县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之中有人走几十里路,提着竹篮给我送黄豆、酒米和鸡蛋,并对我说:“我们见过反革命是啥样子,你不是的。”

我资助人的事在农民中传得很快,很多农民都对我好起来。譬如割麦子的时候,四川不同于北方,用的是锯镰,一旦割了手,那是很厉害的,伤口是一丝一丝的。下田时往往是两个农民

把我夹在中间,随时都在注意着我的刀,只要我弯的腰稍向上一抬,他们马上提醒:“孙同志,刀口向下!”以至使我这个生手,从来没割过手。割麦时每人都是五行,可是常割过半块田时,我面前只剩三行了,我明白,两边的农民,每人替我多割了一行。农民对人的关切,往往就是这样无言的,而又实实在在的。

大约是1961年的夏末秋初,上面同意解散公共食堂。社员都回自己家里吃饭,他们都很高兴。可我们下放干部三、五个人调到一个大队,以便我们自己做饭。因为人都熟了,有时因工作回不来,也在社员家里搭伙。只要我们自己不多吃多占,把钱和粮票交足,社员也没什么不欢迎。当时买棉花和布都要票的,我因为第一年下去,不需要添置衣服,所以把棉花票、布票都给了社员,他们自然高兴。

队上常让我做各种统计,所以我常到社员家去。有一次到一个姓曾的社员家,和他闲聊起来。我早就听说土改时,他把分得的浮财,当天黑夜又送回地主家了。就提起这件事,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沉吟了一阵,两眼看着地下,慢慢说起来:“别个都说我害怕地主报复,所以给他送回去,不是的。我爸病故那会儿,我妈带着一群娃儿,我是老大,弟弟妹妹还小,硬是不得办法,没得钱安埋我爸。我妈只好找到东家,东家拿出钱买了棺材,安埋了我爸。后来我也到东家家当长工,人家对我也不错。人嘛,说话做事要凭良心。”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孙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信得过,我给你说老实话,给地主当长工那会儿,都没得现在这样饿。栽秧打谷收麦子,活路重的时候,三顿饭之外,还有腰抬。”我问他什么叫“腰抬?”他说:“就是两顿饭之间,再加一顿,垫垫肚皮。”这是我第一次从农民口中听到不同的说法。过去在政治学习和阶级教育上灌输给我的认知方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松动,我不能不重新思索,哪个说法更接近真实?更入情入理些?我觉得很难能遇到这样诚恳直率的人,于是又继续问他:“你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吗?像周扒皮那样……”不等我说完,他就把话抢过去了:“打胡乱说!弄些来扯!孙同志你想这个道理嘛,天漆墨黑,把长工赶到田头,啥子都看不到,能做啥活路嘛?还不是睡瞌睡?哪个不晓得吃饱睡足,干活

路才有力气?地主又不是瓜的(意谓‘傻子’)。”我不能说他这个话没有道理。第一次听到与过去思想教育宣传不相同的振聋发聩的,更接近真实的话,竟是在四川农村这样一间低矮的小茅草屋里。

三

下到农村八个多月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县委通知我们到县里去,说有中央慰问团来慰问我们了。于是分散在各公社的中央下放干部都急匆匆赶回县里,在县委招待所见到了慰问团的人。团长是中科院力学所的黎所长,他带来的几个人当时只作了简单的介绍,我们没能记住他们姓什么。黎所长说:“同志们下来半年多了,中央派我代表中央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下面说了些客气话,说大家在底下很辛苦等等。然后话锋一转,说:“这次我们来,除了慰问之外,还要通知几件事:一、今后你们和中央脱钩,就算地方干部了,在农村整风整社一年之后,由所在县的组织部门重新分配工作;二、工资关系,粮食户口关系留在原单位的,一律转下来;三、动员你们接家属,到当地来安置。”当时我们都愣了,不啻头上响了一个炸雷,这不明和出京之前说的太不一样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几个敢说话的同志当时就问:“不是说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让我们来改变农村面貌吗?现在不到一年时间,为什么又变了?”黎所长说:“中央说情况又有变化。”又有人问:“当时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们是中央下放干部,今后怎么算当地干部了?”黎所长说:“你们算调干下放。”我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大家脑子里似乎一时都乱了,好像再问下去,也得出更好的答复了。我们几个有专业的同志还留了个心眼,等那些原来在中科院搞行政工作的同志散了之后,我们单独找黎所长又问:“原来说,等农业过了关,工业上了马,有专业的下放干部,不一定调回原单位,但一定对口归队。这话还算不算数?”黎所长仰头哈哈笑了一阵说:“这个你们放心,决不会让你们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还在彭县。”我们只好退出来了,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黎所长的回答是耍滑头,是不负责任的。有专业的除李凤山因病调回山西

日军投降后的牡丹江

• 闫 强

1945年8月16日傍晚,苏联红军开到了金铃街(现在的爱民街)最西头,中国老百姓用黄瓜、白开水、食壶浆地喊着刚学会的俄语“乌拉”(万岁)欢迎苏军。这时从海浪路和西海林街方向都升起绿色的信号弹,这说明苏军已完全攻占了牡丹江。至此被称之苏军出兵东北日军抵抗最激烈的战斗——牡丹江之战结束。

中国老百姓互相庆贺着,日本鬼子完蛋了,我们是中国人了,不再是亡国奴了。从这时起在人们

之间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光复”。不叫“解放”。

我家住在西八条路的铁路局宅。附近有些日本仓库,欢迎完苏军,我就跑到“满洲开拓株式会社”仓库里去了。到里面一看,里面又有草包,又有木箱,还有印着“朝鲜总督府监制”的成袋大米。每袋印着“30公斤”标识。我一看,眼花缭乱,我就用钩子划开一个口子,一看是白布,心里高兴极了,这在“伪满”战时可是缺货,我就驮起一包回家了。到家里打开一看,原来是300条白裤衩。我挺扫兴

老家外,李崧生在“文革”中死得不明不白,我,一直到1980年,若不是自己遇到一个偶然的机,到大西北的科研单位归了专业队伍,恐怕到现在仍在彭县,不会有人管我。连彭县的朋友们现在都说:“你所在的医药公司,后来变成了私人企业,几易其主,你如果留在彭县,会又闷又气,恐怕很有可能已经出了东门了。”(县火葬场在东门外,当地人管死叫出东门。)

我们回到各自的队里,越想越不对:什么叫“中央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情况变化”能成为理由,那岂不是任何说话不算话的人,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黎所长来之前,所有在彭县的中央下放干部,无论多么饿,无论农村工作多么陌生,开展工作有多么困难,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过,没有一个人当过逃兵,可是黎所长来过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大家的心散了,和我同在竹瓦公社的山东的范龙潭、杜守林,贵州的郑天培,江苏的汤可兴,都要求调回自己的家乡了,这些同志的家也同样在各地的县城,他们何苦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四川彭县呢?这是他们合情合理的选择。

我们几个家在大城市——北京、南京、武汉的同志可束手无策了,要求调回去?谈何容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不经过组织私自回去,当时的条件却不同于现在,那叫“自动脱离革命队伍”,别说找工作,连户口都报不上,领不到粮票,吃饭

首先成了问题。我们不留在彭县听天由命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直到这年年底,农村未完的工作仍须做完,遇到的意外变故,自然不能和当地的农村同志说,我心里一直惶惶然,有一种被抛在异乡异地,举目无亲,不知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又求助无门,天不应地不语的心情。

即使在归队之后,彭县那二十年,仍像梦魇一样,追随着我,影响着我。评职称,1960年至1980年只能算工龄,不算专业年限,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合理,那二十年本来没搞专业嘛。长年的二十年,对我的职称评定自然有伤损。今年,我已将近八十岁了,名与利对我来说已很淡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追求,何苦非要耽搁我那最宝贵的二十年?求学时代我的几位老师,是那样无私无保留地,用心血灌溉我这棵幼苗,希望我成材,希望我对民族、对社会有用,我明白也感激老师们对我的期许。至今屈指细算,我从小学读上大学,十六年,再加上大学毕业后拜师进修将近五年,应该算是二十一年,但真正把专业用到工作中,也差不多仅仅只有十六年!有什么办法呢?“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我七十岁左右时,不少朋友问我索要条幅,我刻了一枚闲章:“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我也要问:“问苍天,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就又回仓库了，又打开一个木箱，一看是黑斜纹布，我就扛起两匹，多了扛不动，回家又回来再扛两匹，真有劲头。直到累的走不动了，到晚上10点多了，不再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这回是往家扛大米，一袋60斤，前后共扛了10匹黑布，整整一木箱，600斤大米。没有人管，苏军也不进入仓库，按理说苏联红军应该管起来。以后听说，苏军怕有地雷，所以不进入。几天后，有苏军士兵看守了。

隔了两天，两名苏军士兵不请自来闯到我家来了，翻箱倒柜，把我父亲的两套西服抢走了。他们手里拿着枪，我们家无可奈何。

几天之内，前后又来了几伙苏联士兵，照例是翻箱倒柜，不过不打骂人，看好的东西就拿走了，如布拉吉——连衣裙子，儿童服装。苏军一到牡丹江当众就把欢迎人的手表撸走，以后每看到中国人就问：“恰塞耶西？（有手表吗？）”

有一天，我和我母亲正在屋里，两个俄国兵端着冲锋枪进来，进到屋里看看转身就走了。我对我母亲说，这俩老毛子好，不抢东西。我们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出屋看，这俩俄国兵挨家走，走到第5家，把老太太和孩子撵出来。这是一个铁路职员家，他不在家，我虽然才16岁，还不懂事，不过却感到他妻子在我们这一带还是有几分姿色的。老太太叫孩子快去找他爸爸，我看到一个士兵在门口端着冲锋枪守着，即使找来他爸又有什么用？

情况和人们的情绪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青年妇女们开始剃光头了，然后用锅底灰把脸抹黑了，东躲西藏起来。

接着我又经历了两件事。

一件是我在西十条路西煤场，一对夫妇从放牛沟逃难疏散回来，一个俄国士兵，头上有点秃发，拿着手枪来拽女的，丈夫不让，于是这个兵拿着手枪对着男的。男的不敢动了，这个士兵把妇女拽到煤堆后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丈夫急的直转转，隔了一会儿，女的走过来边拍身上的土。男的埋怨妻子，叫你快走你不快走。女的嘟囔着，俄国兵扬长而去。

另一件是，我坐在铁路局宅前铁道上，俗称老火车道，原中东铁路遗址，从铁岭河火车站直通黄花站方向。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接着我看到两个俄国兵从老孟家板障子上跳出来，连着我听到“打

死人啦！打死人啦！”的喊声，我就跑到老孟家，这时先跑去的几个人，立刻用门板抬着老孟，有人喊着：“快送医院！快送医院！”我看到老孟胸前挨了一枪，淌着血，可是哪有医院，眼看着老孟咽气了。一打听，原来是两个俄国兵要他开门，他却赶快把后门开开让他老婆跑了，俄国兵一怒之下开枪把老孟打死了。

人们“光复”后的欢乐气氛没有了。人们议论着，还不如不“光复”呢！

苏军已占领牡丹江了，要恢复秩序特别是恢复铁路交通。街里成立了维持会，铁路局宅在市郊。苏军急需中国铁路员工。找到“伪满”铁道局中国职员中职位最高的陈章，他是日本留学生，苏方任命他为中方的铁路局长。并且说，根据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合办（原中东铁路）。让他组织中国铁路员工。

陈章把这些日子发生的情况和苏军驻牡丹江司令部说了，苏军派纠察队进驻铁路局宅。铁路员工们也组织起来，白天、晚上打更放哨，一有俄国士兵闯入民宅，立刻敲锣，我也参加了打更放哨的行列。还真有效果，俄国士兵再闯入民宅，一敲锣纠察队赶来，赶走俄国士兵。

这种无政府、无法律混乱状态，有半个多月。苏军建立了牡丹江城防司令部，司令官是伊万诺夫少校，市里也成立了维持会，会长是谷怀贵，“伪满”他是牡丹江南区区长。“伪满”牡丹江市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中国人主要住在南区、东区。西区是朝鲜人，日本人住在中区和北区，中区是日本商业区，北区是日本住宅区和省公署、市公署（政府）。日本溃败时，包括火车站在内，大部放火烧毁，施行了焦土战。日本人全撤退了。

维持会很快就改成市政府，谷怀贵当了市长。但这不是共产党领导，还不是解放。党中央决定派十万军队和二万干部赴东北才刚出山海关。其中有一部分新四军从山东半岛跨渤海到辽东半岛。

因为苏联承认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签定中苏同盟条约、中国长春铁路和旅大的协定。这些条约协定中规定东北（苏联称之为“满洲”）是苏联军事行动区。行政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但不得妨碍苏联军事行动，中国人内政事务苏联不干涉。

随着谷怀贵市政府的成立，又冒出两个国民

党来,人们称之为“土国民党”,都是地方人。一个叫“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牡丹江办事处”,简称“党专”,专员是孙廷奇;一个叫“中国国民党牡丹江市党部”,简称“党部”,书记是张福山。都说自己是蒋委员长的真国民党,互相攻讦,“党部”说“党专”是地痞流氓,“党专”说“党部”是土豪劣绅。共产党来了以后把他们“一锅端”了,他们作鸟兽散,各跑东西,有的转入地下活动。



日军修建的东宁要塞

国民党的公开活动有

两个多月。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十月十日“双十节”的国庆活动,发展国民党员。“党部”创办了《国民日报》,“党专”创办了《大众报》,他们发布的都是中央社消息。报纸内容在我记忆中只剩下两条,一条是“任命朱、毛为国府上将”;一条是答读者信,“问:是狗屁臭呢?还是狗屁臭?答:人屁臭。”无聊得很!

不过他们都抓学校工作。进入九月份后,学校开始复课。以“伪满”牡丹江国民高等学校(4年制中学,简称“牡高”)为基础在立新小学校址成立了牡丹江市中学,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党专”在初中部建立“爱国青年团”,全体学生都得参加。我们班主任老师是原牡高的,他戴着“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蓝地白字袖标,一个学生发一张“爱青团”登记表。每个人还发一个印着“爱青”白字蓝地布制的“爱国青年团”胸徽。有一天和小学生的“爱青团”一同在圆明小学(前一中位置)举行入团式并且和孙廷奇一一握手。看样子有500~1000人。

在高中部则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由市党部领导。共产党来了以后,参加“爱青团”的不算历史问题,参加“三青团”的就算有历史问题。以后和共产党对比,很鲜明地感到政党的阶级性了。国民党发展党员是有钱人和比较有钱人。如职员、士绅、财主、官员;共产党发展党员则是工人、城市贫民、贫苦农民等穷人。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争取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国民党公开讲,参加国民党

能升官发财,有个人前途,而共产党则讲为人民服务,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革命勇于牺牲。

1945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在这天苏军在牡丹江虹云桥南端举行了苏军胜利纪念碑落成揭幕式。所以说是胜利纪念碑而不是烈士纪念碑是因为碑文上是:把东北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苏联红军光荣!而不是烈士永垂不朽。碑文用中、俄两种文字,而俄文中把“东北”说成是“满洲”。

是苏联炫耀自己武功的。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碑是由日本人给修建的。我亲眼目睹了苏军士兵押着日本俘虏建造的。日本“皇军武运长久”荡然无存。日本是战败国,无话可说。而中国是战胜国,却把旅顺、大连租给苏联,苏军对中国老百姓又怎样呢?所以日本人也挖苦说:日本是惨败国,中国是惨胜国。

我们市立中学学生参加了揭幕式。整个揭幕式上也就几百人。按照苏联的仪式举行的,分别由苏联军官和中方代表讲话,每讲完话奏苏联国歌和国民党的“党国歌”,由苏军乐队演奏。

市立中学成立后除了国文数理化外,再就是国民党党化教育。每周必开一次“总理纪念周”(国民党把孙中山奉为总理,蒋介石是总裁),在会上要唱国民党党歌,而国民党把党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称之为“党国歌”,公民课讲国民党“三民主义”,在纪念周上还要背诵总理遗嘱,唱总理纪念歌。国民党就是这样教育学生。完全是“党化”教育。

1945年11月10日我照常上学,一位同学和我说:你还不把那玩意儿撕下来!八路来了。他伸着大拇指和食指做着手势。我一愣,莫名其妙。原来指的是我胸前缝着的印有“爱青”字样“青天白日”的胸徽。确实班级气氛变了。戴有中国国民党袖标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同学说他跑了。学校走廊里换上了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写的标语:“废除国

民党一党专政”“东北人民要自治”“释放政治犯张学良”“东北是东北人民的东北”“反对内战”。我们学生也就糊涂起来，怎么回事？那时老百姓把共产党称呼为“八路”。

学校新来了三位老师，他们是张一明、王裕民、刘正。他们都挎着盒子炮，上课也挎着。我们学生有些害怕，甚至有时教室玻璃上“啪”的一声打了个枪眼。语文课、历史课、公民课都改成政治课。他们给讲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我听的是一塌糊涂。这三位老师可能是行伍出身，缺少老师、知识分子风度。看来他们把我们学生都看成是国民党。因为我们都参加了国民党的“爱国青年团”。

市面上也出现了“国民军”，说“国民军”进驻牡丹江，司令员是李荆璞。可是我们没看到部队，看到的人说国民军的人却穿着日本军大衣。

多少年后才明白，八路军、新四军是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编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驻原地待命不得接受日军投降。共产党不听他的，把军队挺进东北。开始称之为“国民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

在国民军进驻之前还有一批军队，是中国人但戴着苏联军衔穿着苏联军装。其中一人，人们称之为邢司令，在铁路西局宅给铁路工人讲话，动员他们帮助苏军装卸火车，讲完之后他高呼：朱德、毛泽东万岁！朱德、毛泽东是何许人？人们不知道。

多少年后，我才搞明白。原来他们是退到苏联的抗日联军的人。苏联出兵东北以后，不许以中国军队名义——抗日联军对日作战，而把抗日联军官兵完全编到苏联军队中去。金日成、金光侠也是抗日联军，他们都是经牡丹江回朝鲜的。金光侠留下先任中共牡丹江市委首任书记，以后回朝鲜任朝鲜人民军大将。曾经担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1945年时是苏联中尉军衔。1995年纪念日本投降50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授予陈雷等抗日联军战士“苏联卫国战争纪念章”，而不是抗日战争纪念章。

现在再回到学校里来。“民主大同盟”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共产党不公开，谁是党员也不知道。而国民党转入地下。我们上完课就在走廊看到：“中央挺进军不日进驻牡丹江”“国军进驻锦州”等标语、小报，我们学生还是五里雾不明白

怎么回事。原来所谓中央挺进军就是谢文东、马喜山等国民党收编委任的地方武装，我们称之为“中央胡子”。他们也想进驻牡丹江市。但苏军不许可，他们就在东京城、林口、板院一带活动。

1945年12月19日共产党领导的《牡丹江日报》出版了。说明共产党已掌握了牡丹江市政权，李荆璞担任市长。共产党也掌握了中小学。

1946年1月下旬我看到从关内开过来的正规的八路军——人们这样称呼。从海林方向列队开进牡丹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非常严明，所住之处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说话和气。总是大爷、大娘称呼着老百姓。官兵们都穿着“二尺半”棉袄，没有大衣，条件很是艰苦，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武器则是“三八大盖”、“九九”步枪和手榴弹，别说是和苏军相比，就是连日军也赶不上。苏军战士有冲锋枪，部队有十轮大卡车、大炮、坦克，而日军都没有，八路军使用的武器都是缴获日本的，可是士气却很高涨。

我们学生一方面佩服八路军的亲民作风，一方面又议论：这样部队能打过美式装备的中央军吗？因为国民党宣传中央军如何强大。而《牡丹江日报》报纸宣传，在关内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的进攻。

1946年3月冰雪还没融化，苏军宣布从牡丹江市撤退，市政府组织了市民举行欢送。苏联军队也事先准备好，全是步兵从市里列队开出，经过西三条路到海浪路，再过海浪公路桥（海浪公路桥、铁路桥，日军撤退时准备用的，所以没炸毁，而铁岭河、桦林铁路公路桥，日军为阻止苏军进攻全炸毁了。）乘上十轮大卡车往铁岭河方向开去。我们市立中学学生站在西三条路两旁欢送着，市民也欢送着：你们可走了！

战后的日子结束。妇女们不再躲躲藏藏了。

苏联留下了大量“红军票”——苏军印刷的纸币。买走了大量的粮食，苏军撤走后纸币停止流通，也没有人给兑换。持币的人自认倒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旅顺、大连、中长铁路退还中国，苏联政府承担了红军票的责任，按苏联发行的总值给了中国政府。

（作者为前牡丹江军马场中学离休教师，剥离“企业办社会后”转到牡丹江市第九中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中国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

• 杨汝岱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了，四川是改革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1978年起，对农村到城市的各项改革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邓小平同志对此多次作过肯定的评价。1987年6月12日他同外国客人谈到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时，就指出：“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这里，从我所经历的情况，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四川对各方面改革所作的探索。

从“文革”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

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重灾区，以动乱时间长、反复多、武斗严重而闻名全国。为什么能够一跃而为改革的重要发祥地呢？

一是“物极必反”，巴蜀儿女又自古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文革”中四川农业生产十年徘徊，“天府之国”的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1976年不得不从省外净调进50万吨粮食，有的玉米粮袋上写着“四川懒汉，吃了大干”，四川人不能不深受刺激，沉痛反思。粉碎“四人帮”后，全省人民迸发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人心思治，人心思改，人心思上。经历深重灾难后解放出来的大批干部也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是人民群众当时的生存状况逼着大家寻找改革之路，是人民群众思改思上的心气、劲头推着干部非改革不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二是邓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小平同志对家乡十分关心，他同巴蜀人民的心是相通的。1975年7月他主持工作时，同当时四川省委负

责同志谈话就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同年9月又在山西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农业人均产值，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就在这次会议闭幕前，赵紫阳同志受命到四川主持工作，行前小平同志要他抓紧时机反派性，大刀阔斧地干。但因不久后风云突变，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第一”和“批派性”的指示没法贯彻下去，但这些指示无疑为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川工作指明了方向。1977年7月小平同志复出，12月10日在北京对赵紫阳讲，政策才能管得长、管得宽。凡是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就要恢复。农业的路子要宽些，思想要解放，事事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思路。对外国经验要善学善用，所有制不动，怕什么。还讲到工业企业权力要加大，地方财政要扩大。1978年2月小平同志到成都，又同赵紫阳谈抓政策、抓班子，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其后，小平同志还曾三次回四川，对四川工作做过很多重要的指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四川省委正是深入领会和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意见，才成功地迈开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三是当时以赵紫阳为班长的四川省委，在抓“拨乱反正”和改革上有胆略、有智慧。四川打击“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十分坚决，同时强调纳入法制轨道，对帮派头头不是以他们的言论治罪，而是根据他们打砸抢烧、贪污盗窃等罪行，由法院审理判决，避免了以往政治运动翻烧饼、留下后遗症的问题；全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发挥老干部作用，选拔年轻干部，搞好班子建设，因此就能

较早地排除派性干扰，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改革事业清理了地基。省委狠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长期“左”的东西留下的精神枷锁和阴影。赵紫阳同志十分重视和支持胡耀邦等同志发起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多次讲，这些年来“左”的指导思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严重灾难，要改变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再也不能按照“左”的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了。在1978年的县委书记会和1979年初的省第三次党代会上，都着力克服“左”的影响，解决干部中最大的思想障碍——“恐右病”、“宁左勿右”的问题，激发起四川干部敢于率先改革的勇气，为改革开放打下了比较牢靠的思想基础。正如1979年12月邓小平对奉调来川接替赵紫阳工作的谭启龙同志所说：四川的形势发展很好，发展很快。讲经验有两条：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的领导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制定了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这两条，是对当时四川省委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四川为何从“文革”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的深刻总结。

农村改革先行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闸门

四川的改革是农村先行，从农村发展到城市的。我原来长期担任四川仁寿县委书记，1977年先到地委，后到省上分管农业，曾任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常委、书记等职，对当时四川农村的改革是亲历、亲为的。我认为农村改革在四川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 敢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在长期“左”的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没有自主权。四川大部分农村（除了长江沿岸一些地方外），当地气温本来不宜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尤其不宜把水田行之有效的每年稻、麦（或油菜）两熟改为两季水稻加一季旱作。但当时却不看具体条件，盲目地硬性推广双季稻，“文革”中还上纲为“革命稻”、“路线稻”，农民意见很大。赵紫阳从1975年10月调任

四川省委书记起，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76年他到仁寿农村调研时问我对双季稻的看法，我举出事实对他讲：双季稻费工费投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他又派李子元书记来仁寿调查，了解到有4个区的中稻亩产上800斤，加上一季冬小麦300来斤，共1100斤；而种双季稻的社队，早稻亩产400多斤，晚稻只有200多斤，小春也种迟了，产量降低，加起来只有900来斤。掌握大量事实后，赵紫阳在1976年12月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向全省县委书记明确提出：选择耕作制度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全省范围看，中稻是四川的优势，要主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77年，全省中稻的面积由3700万亩增加到4100多万亩，双季稻面积由1500万亩降到700多万亩。尽管因干旱全省水稻面积减少了381万亩，总产量却增加了143万吨，单产提高了47公斤。同时，四川积极试种并逐步推广杂交稻，我在1978年就出席过在温江召开的全省杂交稻制种会议。杂交稻越来越显示出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省委还在川北地区和川东地区分别总结和推广了“水路不通走旱路”的经验和适时早种、适当套种、躲过伏旱的经验，都收到了趋利避害、吹糠见米的效果。

2. 最早提出并落实“放宽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1977年，四川农村经济仍凋敝不堪，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必须减轻农民负担，于是在粮食分配上采取了“保两头、挤中间”的措施，规定了人均口粮不足180公斤的生产队不留储备粮，同时调减征购基数，不征过头粮，人均口粮不足260公斤稻谷或210公斤杂粮的生产队一律免购，解决过去这些生产队先征购、后返销，粮食挑去挑来的问题，使农民得到实惠。1978年2月，当小平同志在成都指示要清理农村、城市政策之后，省委随即发布了12条农村经济政策，主要是把被错误批判过而确实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起来，除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外，还有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等内容。其中，扩大自留地可谓一项特色。当时有一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访问四川农村后，在成都问赵紫阳：“为什么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那么好，集体庄稼却长得那么孬？”其实对这个差别，大家

都心知肚明。省委一反那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做法,明确宣布: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后来又明确规定,扩大自留地,连同增划小块包产地,可以由原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增加到百分之十五(全省共划出耕地330万亩),田坎也可以包到户经营。从此,自留地上绣花,田坎上见缝插针,挖掘出土地的潜力,也对大田上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 率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包产到组到包干到户。联产承包是农民的创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农村曾经或明或暗地采取过这一类作法。1977年,广汉西高公社金光大队农民暗中把田地分到作业组,干活不再是“一窝蜂”,小麦、油菜都增了产。县委书记发现后,总结为“定产到组(回避那个“包”字),在地委开会时介绍。赵紫阳在会上肯定这种作法,并派出省委工作组、选择广汉金鱼公社进行包产到组的试点。1978年该公社116个生产队,队队增产,全社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2.5%,每亩增产近150公斤。赵紫阳对我们讲,现阶段中国农业主要靠精耕细作,农民联了产,责任心就强了,优越性比“一大二公”要大得多。他在县委书记会上指出,广汉金鱼公社这个办法,方向路线没有问题,优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提高。当1979年3月《人民日报》头条刊登张浩来信质疑洛阳农村包产到组并配发编者按后第三天,省委就发出通知,再次肯定金鱼公社的办法,稳定群众情绪,增强改革信心。这就突破了长时期在责任制上“谈虎色变”的禁区,包产到组在全省农村迅速地广泛推行。同时,对部分贫困山区的穷队和居住极为分散的吊脚户允许实行包产到户。正是由于采取了调整耕作制度、让农民休养生息、实行联产承包、扩大自留地等措施,三年粮食总产量步步登高,1979年就比1976年增加了819.5万吨,而且三年的增量基本上留给了农民,1977年、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口粮比1976年分别增长17.9%和33.6%。这就是当年流传“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首民谣的由来。

1980年2月,赵紫阳即将去中央工作前,在当时全国对包产到户争论很大的情况下,曾经讲过大田包产到组已经到边的话,1981年2月他

出国途经成都,特地找我们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指出:“包产到户只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涉及所有制问题。我在离开四川时曾说过‘到此为止’,可能束缚住你们。现在不要受这个束缚了。”于是,四川在推行包产到组两年多以后,省委在这年春天又作出新的部署,强调支持群众的自愿选择。当时少数市、地领导对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采取硬纠的办法,我作为省委分管农业的领导曾去做工作,改变了那种错误做法。据1981年11月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77.8%,包产到组的还有7.2%,另外则是水统旱包、包口粮田、专业承包等形式,是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较早较快的省区之一。

4. 发展乡镇企业,带头探索农工商综合经营。赵紫阳认为,农民不能只种粮食,要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走工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路子,才能大大增加财富,让农民富裕起来。1978年8月,他陪同华国锋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特地去学习贝尔格莱德农工联合企业(简称“PKB”,戏称“背靠背”)的经验,还争取到了在四川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试验的允诺。同年9月,又带领全省200多位地、县委书记赴苏南考察,学习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回省后,成立省社队企业局,由省长鲁大东同志兼任局长,在四川掀起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首轮高潮,为后来全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了个好头。赵紫阳亲自过问几个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如:重庆市郊区以26家国营小农场为基础办起长江农工商联合企业,同47个水果队、13个茶叶队联营加工、销售,大部分利润返还生产队和农民。又如:若尔盖牧工商联合企业,壮大了牦牛产业,牦牛肉远销甘肃、青海,建立牛奶加工厂,返利给牧民。这些做法对农牧民、企业、国家都有利,而且有助于解决原料价格过低、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问题,可以看到后来农业产业化中普遍推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雏形。

5. 广汉向阳第一个“撤社复乡”,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走向解体。人民公社是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一平二调”、大锅饭、瞎指挥等弊端与生俱来。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社无疑是釜底抽薪。作为省委农村改革试点单位,广汉县向阳公社又在1979年相

继成立了工、商、农三个公司,工业公司在社队兴办的砖厂、酒厂、铁厂等五小工业企业基础上组成,商业公司在社队兴办的贸易货栈、合作商店等流通企业基础上组成,农业技术服务公司改行政指挥为向农民提供有偿服务,由乡政府搞农业的干部和聘请的农技员组成,这三个公司独立核算,后又共同组成乡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筹协调农、工、商各业的发展,党务和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出来,由乡党委和乡公所分别承担,这就把“政社合一”翻了个个儿,成了党、政、企分开,取掉人民公社这块招牌已经水到渠成。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在1972年宪法的,改变它毕竟要有很大的勇气,承担较大的风险。赵紫阳同志离川前,在1980年3月30日听取了广汉的汇报,明确表示:要允许、支持广汉这项改革,但不要普遍搞,只能试点,万一搞得不成功,改过来就是了。不久,广汉向阳乡就实行了“撤社复乡”,在挂出乡人民政府牌子的同时,摘去了人民公社牌子。随后广汉全县和新都、邛崃也进行了这样的试验。这一改革得到彭真、万里等同志的认可,但直到1982年12月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乡、民族乡、镇;1983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这项合理的改革才同时具有了合法性;而人民公社体制则一直到1984年底才完全退出全国的历史舞台。

6. 从广汉、新都、邛崃开始的县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赵紫阳同志在川工作时,经常到省会附近的这三个县调研,农村改革多从这里开始试点。1980年首先对广汉实行了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三项包干。1981年春,在谭启龙同志主持下,这三个县正式确定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改革的内容大体包括:(1)从农村到县城,各战线、各方面逐步全面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2)在粮食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调整结构,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3)随着生产全面发展和商品率提高,开始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体制,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逐步建立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的农村商业体制;(4)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把某些生产环节、技术服务项目分离出来,逐步引向生产

专业化、经营社会化、管理企业化。(5)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按党、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公社到县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广汉县调整、精简县级机构和人员,在经委下设农、工、商三个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邛崃把有关经济局改为5个专业公司,上设总公司。(6)省对三县以不同办法实行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三项包干,变“竭泽而渔”为“放水养鱼”,使县经济有了较多的自主权,增强了活力。1985年与1980年相比,广汉、邛崃、新都三县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25倍、1.69倍、1.5倍,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15倍、1.08倍、70%,农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16倍、2.86倍、2.25倍。这样的县域综合改革走在全国前头,万里、一波同志进行考察后都充分肯定,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沿海省市的参观交流队伍络绎不绝。在我和杨析综同志主持工作时,又把这一改革试点扩大到全省40个不同类型的县,为县域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继续探路。

国企扩权试点 引发管理体制的渐进改革

农村改革的迅猛发展,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县处于“农头城尾”的位置,县的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就已进入城市改革的领域。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但城市的情况远比农村复杂,笼统讲“包”字进城,不能解决城市的问题,还要根据城市的实际去试点、去探索。我当时没有分工抓城市经济工作,但也参加过省委多次研究、讨论城市改革的会议。从1978年起,就在考虑城市改革从哪里改起,有的主张从改革计划体制入手,有的主张从改革所有制结构入手,还有的主张从组织专业化协作入手,而赵紫阳和省委主持城市经济工作的杜星垣等同志则主张,从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像农村改革那样,首先调动直接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后来看,这样从下面入手改到上面,比自上而下地从政府某些管理体制入手要好。因为企业改革可以从少到多地选择单位来试点,既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不会影响面上的生产;同时,企业处于经济体制网络的中心环节,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

身”,由此可以找准各方面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在,逼着上面的管理体制非改不可。

按照当时流行的经济学观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而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货色,城市国有企业一切都听命于上级计划,生产经营与市场几乎不发生关系。为了给改革作好理论准备,1978年5月,省委邀请长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分子”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来蓉讲学,赵紫阳等省领导虚心求教,口问手记,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新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79年2月,省计划、物价部门和社科院联合召开了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13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价值规律讨论会,会上一些学者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论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客观必然性”。赵紫阳在四川省价值规律讨论会期间听取了汇报,同学们交流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个会上的主流意见,对于有的学者不同意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赵紫阳引导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实质性问题的研究上,强调生产发展快,才叫社会主义优越性;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要从那些人为附加的条条框框里解放出来。这样的理论探讨对于开展企业改革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四川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是在全国最早展开的,由杜星垣等同志具体指导和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10月,开展了重钢、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个工业企业的扩权试点,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显示出职工劳动积极性高,产值、利润的增长速度高于同类企业的优越性。1979年2月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简称“十四条”),扩大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进行试点。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1979年7月来川,在国内对企业扩权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召开带有现场会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肯定四川的基本经验,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扩权试点。国务院同月发出了《关于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四川在改革的道路上边探索、边改进。“十四

条”为企业松了松绑,取得了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成效,但它以计划利润留成和超计划利润分成作为特点,出现了“鞭打快牛”和定基数时“讨价还价”的缺陷。于是,省委又在1979年12月制定了以全额利润分成作为特点的“十二条”,分成比例一定三年不变,这个新的办法在59户工业企业试行,第二年扩大到412户企业,商业则实行全行业利润留成的办法。为了探索新的企业运行机制,使责、权、利更加紧密结合,省委又选择少量的国有工业企业进行“国家征税、企业自负盈亏”的试点,为此1979年9月制定了“二十条”政策措施,在川棉、重庆钟表公司等5户企业(“老五户”)试验。这是对“利改税”的初次尝试,企业职工工资也从税后利润开支。由于企业效益有高有低,出现“苦乐不均”的问题,且一户一率征收所得税不合规范,又于1980年8月对宁江机床厂、内江棉纺厂等5户企业(“新五户”)进行新的试点,试行所得税统一税率并征收调节税的办法,工资总额仍进入成本,再按利润总额增减与工资总额挂钩来定奖惩。

到1981年下半年,全省对国有工商企业普遍推行了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营责任制。企业以扩大财权为突破口,生产经营、产品销售、劳动工资、人事、外贸等各方面的权力都逐步扩大,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自我发展的一定经济条件,启动了内在的发展动力,调动了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全省403户工业试点企业1981年与1978年相比,年平均产值增长了29.9%,劳动生产率增长12.72%,利润增长29.2%,上缴税收增长23.34%,企业用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开发新产品的资金2亿多元,企业用自有资金兴建职工宿舍150多万平方米。企业开始冲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的界限,走上专业化协作和改组、联合之路。

企业扩权呼唤企业管理体制随之进行改革。企业扩权解决的是企业有权无权的问题,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有权以后谁来行使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强调,扩权要落到企业的民主管理上。一是改变过去党委包揽过多的状况,建立对现代生产集中、统一指挥的厂长负责制;二是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企业职工当家做主、民主监督,同时解决好职代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

国有企业的扩权,尽管还是并未改变产权制度的小改小革,却像一块试金石,检验出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触动了各方面管理体制的要害,对计划、物资、商业、价格、信贷、财政、税收及行政机构体制,引发了一系列的冲击和突破,开始了“撞击反射式”的渐进改革。

——计划体制的改革。原来那种自上而下、包罗万象、指令性的计划体制,与千变万化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企业扩权后,区分开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计划结合起来。允许企业敞开订货、“找米下锅”,推销产品,不仅弥补了国家计划任务的不足,有些企业还从“吃不饱”变为“吃不了”。

——物资体制的改革。原来按照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只能由物资部门统一收购、调拨,造成供需脱节和“拉郎配”等问题。企业扩权后,对生产资料有了一定的自销权和选购权。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全省在温江召开生产资料订货会,还有应运而生的物资交易中心、服务部等新事物,都曾经轰动一时。多种物资流通渠道开拓后,物资部门由行政性分配机关逐步变为经营生产资料的商贸企业,对按需生产、搞活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

——商业体制的改革。原来对大部分工业品和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统购统销,以致质量、品种、花色多年一贯和画地为牢的地区保护等成为顽症。工业企业在扩权后有了部分商品自销权,基层商店也有了自主权,出现了统购、选购、议购、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促使商业三级批发体制进行改革,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局面逐步形成。

——价格体系的改革。随着物资和商业购销体制搞活,原有单一的计划价格体系解体,采取了固定价、浮动价、协议价、自由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双轨”价格也在一些领域出现。以往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为后来全面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开辟了道路。

——金融信贷的改革。原来国有企业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权力,银行只能按计划贷给企业流动资金,不贷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宜宾天原化工

厂在1979年进行扩权试点,为了提高生产能力,使烧碱产量翻番,需要进行技术改造,除了国家拨款和企业自筹外,还差300万元。当时请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同意,作为特殊情况,由省行发放了全国第一笔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这是信贷资金进入固定资产领域的突破。接着,总行正式下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指标,把这项信贷扩大到全国;1980年又在四川进行改革信贷管理体制的试点,改统收统支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基层银行有权运用多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各项贷款指标之间可以调剂使用。

——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实行的基本上是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包括省市在内,地方的机动余地很小。企业扩权后,给企业让利一小步,国家得利一大步,国家财政有了较大的增长空间。在此前提下,四川等省市积极倡议,改中央对省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也就是“分灶吃饭”。后来,省对市、县也逐步实行了收入增长分成的财政包干体制,调动起各级开源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是后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税收体制的改革。在企业扩权中,突破了国有企业只能向国家上缴利润而不缴纳所得税的禁区,开始了在“利改税”前提下让企业相对地自负盈亏的试验,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后来全国第一步、第二步“利改税”。企业扩权还触及了单一税制如何向复合税制转变,对后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由行政性分权变为经济性分权不能说没有关系。

——行政领导机关的改革。原来国有企业都归政府的各个职能厅局管理和控制,弄很多绳索把企业捆得死死的,企业扩权后,再用这套办法不灵了,要求经济领导机关的主要职能变为服务、统筹、协调、监督,把捆牛、抓牛毛改为执牛耳、牵牛鼻的办法。这就要求领导机关自觉革命,“只有当好改革的对象,才能当好改革的动力”,这当然是一个充满着思想阻力、并不轻松的过程。

——中心城市的改革。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城市看成专区一样,城市的性质、功能、定位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解放初期曾是直辖市的重庆市,只被视为工业基地,经济管理权利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 孙言诚

二王、八司马是唐朝的事。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王叔文集团便垮台了。为首的二王：王叔文赐死，王伾遭贬后亦中风死去。麾下的八名干将：韦执谊、柳宗元等，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1957-1958年发生在中办秘书室整风“反右”中的事件，恰巧牵涉到了八名科级干部，而支持八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二人，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对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又称“黑旗事件”），“文革”前后有着绝然不同的话语。“文革”前，“八司马”被树为正面典型，中直机关党委被称为“扶右反左、插黑旗”。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事，告诫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文革”后，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事件中被打成右派的何载、王文等人彻底平反，对此事件的叙述，也有了180度的转变。由于“八司马”中的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八司马事件”遂

被描述为以戚本禹为首的造反派攻击中直党委和中办领导。

50多年过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笔者阅读了叙述此事的不同版本，也采访过有关当事人，很想作一客观的记述。但正如林克所说：“整个事件的经过是颇为复杂的”，局外人要想把事情说准确，恐怕也难。好在不少当事人还健在，抛砖引玉，如能引起大家反思的兴趣，也就不胜欣慰了。

中密室的大鸣大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决心发动整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大鸣大放。

中密室的整风是5月4日启动的。对于身边的中密室，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注意，“他说，要把秘书室做个点，摸摸如何进行整风，党风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经验”。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密室的整风，开始也比较沉闷。但

很受限制，难以协调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条块矛盾，难以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在国有企业扩权过程中，这些问题更显突出。赵紫阳赞同部分学者专家提出的“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概念，离川前专门去重庆一趟，明确表示凡是省里有的经济管理权利，重庆市都应当有。在重庆市与永川地区合并，成都市与温江地区合并，采取市带县的办法之后不久，国务院确定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为后来一些中心城市计划单列提供了经验。

赵紫阳在1980年春夏之交离川赴京时，曾

找搞企业改革的同志们座谈。他强调，改革要坚定，步子要稳妥，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要改而不乱，我们国家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不能把企业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让利、分权，也不只是为了解决企业自身的问题，重要的是从试点中探索出一套新的体制。看来，从企业扩权入手的改革，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探索作用。

（本文从共同回忆到整理成文，得到章玉钧同志的协助）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四川省原省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杜导正）

万马齐喑并不表示港湾平静，激流在暗中涌动，矛盾集中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载身上。容全堂说，是何载对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所以结下了思想疙瘩。其实，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在任何一个单位，矛盾总是会集中到管事人身上的。有一件事，激化了中秘书室的矛盾，也打破了中秘书室的平静。据说，何载向中办汇报，说中秘书室的人对秘书室的整风没兴趣，感兴趣的是社会上的整风。此事，容全堂说子虚乌有，林克却言之凿凿，并认为这是何载企图转移视线。整风会上此事揭露出来，群情哗然，纷纷给何载写大字报，中秘书室的鸣放由此展开了。

关于大字报的内容，容全堂和林克总结得大体一致。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50年代，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杨家岭一位姓杨的老农，怀念延安生活，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

二、棘手问题绕道避开。有一次，一批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高级干部的问题，不宜由我们处理，领导应该出面。可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

三、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何载派王文参加，林得意地说中办支持她。那次演讲，毛泽东也让林克去了，林克回来汇报后，毛泽东说：“林希翎是右派。”

要命的是第三条。林克也讲到此事，说法略有不同：“在反右派运动中，何载、王文（秘书室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林希翎翻案，何载、王文对其表示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如获至宝，回人民大学后，气焰更嚣张，便把何、王同她的谈话公之于众，在人民大学掀起轩然大波。何、王闻讯后，便悄悄去人民大学看了这张大字报。但何、王二人回机关后，却对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和全体工作人员秘不宣布。”（林文）

戚和林说的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有待考证，但何、王的致命伤是支持林希翎，殆无可疑。容全堂说：“戚本禹等人以‘拖观点’的方式对王文进行批斗，王文如实谈了对林希翎的看法”，“他的发言被篡改为反动言论，变成被大字报批判的材料，也成为后来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据。”

此时的中秘书室，“大鸣大放一浪高过一浪……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

面对这种形势，何载请示杨尚昆怎么办，杨答复：“认真听取意见，虚心接受。”从六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反省材料。作为中秘书室主任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他已经难以正常地开展工作了。

扑朔迷离的中秘书室“反右”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中秘书室自不例外。但是，在中秘书室谁是右派，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容全堂说：“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书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容文）如果从最后的结局来看，容的说法无疑是事实，但在1957年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是要由党组织来定的，定右派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即对各级党组织是支持（听党的话），还是反对（提意见）。在中秘书室，容全堂讲，支持党组织的是一部分“从各地、各部门选拔的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而林克、戚本禹等“从高等院校选调的青年学生”，却是反对党组织的。由于“中直党委、中办、中南海党总支对（林、戚等人）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容文）。显而易见，尽管林克等人在大字报上说何载是右派，但定谁是右派却不是林克

他们所能左右的。据杨尚昆回忆,中直党委对何载问题的定性是:“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1957年何载没有定为右派。

相反的,戚本禹却这样回忆:

“六月份全国开始反右,中直机关党委欲将八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焯、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整成反党右派,说我们给领导提意见是向党进攻。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田家英和彭达璋也遭到连累,彭达璋已决定调出。我们不服,认为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王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定八个人为反党右派,符合“反右”的形势。在1957年,给任何一个支部提意见,都被视为向党进攻,都可定为右派,何况是把矛头指向中直党委。据林克讲,何载曾秘密写了《建议书》,建议定他们反党。杨尚昆还讲到这样一件事:“(戚本禹)曾和刘华峰(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苏文)种种迹象表明,党委欲定八人为反党,似非空穴来风。

但中秘室毕竟不是一般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很可靠。所以在1957年,何载没有打成右派,“八司马”也没打成右派,“四平八稳”的杨尚昆书记说:“中直机关在右派定案工作中还是比较谨慎的。”(苏文)

1957年9月,“反右”告一段落,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办派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秘室工作。

“双反”运动和“整风补课”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全国又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双反”很自然地 and 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当时叫“整风补课”。在全国,不少右派就是“整风补课”时补进去的。

王刚接手中秘室工作后,中秘室关于谁是右派的辩论仍在持续:一方面是八个科级干部见何载下放,认为斗争取得成绩,继续写大字报;另一方面是一些老同志在党委支持下反击向党进攻的人。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刘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容文)

戚本禹讲:“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大会、小会残酷斗争。秘书室的同志都不敢跟我们接近了,我们成了比右派还要反动的反党分子。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因为在给我们定性之前,王光美那里一直退给我的文件,不退给我了。”

其实,反党小集团的头子不是戚本禹,是林克和李公焯。林克说,“双反”运动中的大字报就不是自由鸣放了,是王刚有组织写的。他们批判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个人反右派,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从个人历史中抓问题,说李公焯做过日本人的通讯员,说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王刚甚至以中直党委的名义整了一份林克的材料,托叶子龙交给了毛泽东。

那段时间的中秘室,林克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工作组甚至布置人盯梢,盯的对象是支持“八司马”的领导:田家英和彭达璋。

杨尚昆如是说:

“据说有人发现晓岚在盯田家英、戚本禹的梢,绘声绘色地说,几次在静谷(就是田家英住的地方)看见晓岚,于是质问晓岚为什么盯梢,晓岚就否认有这件事。”(苏文)

戚本禹这样回忆:

“为了监视我们,他们甚至从公安部门调人来。有个叫方世郁的,就是从青岛市公安局调来的,负责监视彭达璋。宣布我们是反党集团的那天,我去彭家,出来时方世郁从黑影里跳出来,扭送我到领导处。我抗议非法监视,晓岚也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

菊香书屋会上,关于盯梢还有一段对话:

毛泽东:王刚同志,监视盯梢都是你布置的吧?

(王刚站起来说:没有监视盯梢之事)

毛:为什么人家田家你们要监视,几个人在一起吃汤圆,你们也要监视呢?一片白色恐怖。

(毛泽东又面向杨尚昆)尚昆同志,这些事你知道不知道?

杨:我不知道,主席提出来,值得我们注意,我还需要查一查。

毛:是应该好好查一查。

4月23日,何载又写了第二封《建议书》,托人转给王刚。到四月末,反党小集团的宣布已是箭在弦上,林克回忆:“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林文)恰在此时,毛泽东要身边的秘书打电话给林克,叫林立即去广州。

林克走后,反党小集团就宣布了,戚本禹说:“对我们的结论已经作好了。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去新疆劳动改造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在外地的毛泽东,从林克那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派徐业夫来中秘室抄大字报。知道主席关心,双方都沉寂下来,批斗会也停止了,大家都紧张地等待主席表态。”

毛泽东广州表态

1958年4月27日,林克飞抵广州。一位中南海党总支负责人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容文)好像毛泽东是在林克哭诉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事实并非如此,据林克讲,毛泽东一见林克便明确表态:“有人就是要吃掉你,但是,他们吃不掉。”表态之后,才让林克汇报。汇报之后毛泽东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那次会,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都在场,毛泽东当众表态: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

“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可见‘天子脚下’也不那么太平哪!……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林文)

关于广州表态,杨尚昆是这样回忆的:

“1958年4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就打电话叫我马上去他那里。第二天我一到广州,田家英就对我说,主席发现一个情况很生气,说你们中直党委整人。他说毛泽东可能要狠狠地骂我一顿,先给我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他还声明绝不是他向毛泽东告的状。毛泽东把我找去谈话时,江青也在场。毛泽东说,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他还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江青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八司马’都是好同志,你们整他们,要作检讨,向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要我和江青去找小平同志,把这件事说清楚。小平同志听了江青和我的汇报后说:‘江青同志,你不是有意见吗?你们两边口说无凭,江青,你写一份材料给我,尚昆,你们中直党委也写一份材料给我,我们回北京以后再解决。’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江青给挡回去了。”“春耦斋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说,主席从广州回来以后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乐得不管了。”(苏文)

毛泽东没有再找邓小平,是因为他决定自己管了。5月1日毛泽东由广州飞武昌,是夜和林克彻底长谈。5月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

菊香书屋会议

参加菊香书屋会议的人,林克讲有:中直机

北大附中 “文革”初期纪事

• 陈 兵

学校,神圣纯洁的知识殿堂。校园,美丽欢乐的知识乐园。看到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渴望知识的中学生、胸怀大志的大学生在校园里孜孜不倦的努力,为实现宏伟的理想而奋斗,真真感到了宽慰。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后半年,那触目惊心的校园三月,共和国十年的厄运从此开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笔者用文字将它记载下来,以示后人。科学、文明、民主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愚昧、邪恶、落后只会带来灾难。

一、疯狂的六月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附中,位于海淀区中关村附近。上世纪60年代,它的周围是大片的农田,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校园里矗立着高中、初中、学生宿舍三座大楼,篮球场、足球场、大礼堂、图书室,是当时北京众多中学校中上乘的。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一些

思。“八司马”在毛泽东支持下,把一些同志打成右派、右倾,当然不对,是极“左”,但是,因为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甚至反对党组织的结论,就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阎草曾致信杨尚昆,要求为“黑旗事件”平反,中办领导几经研究,没有这么做,应该说处理是审慎的、稳妥的。为打成右派、右倾的同志平反,完全应该,但为事件平反,就意味着当年打反党集团是对的,这就有失公允了,尽管里边有个戚本禹。

容志堂说“黑旗事件”是“文革”的预演和试验,这话倒颇有道理。不单是黑旗事件,整个的“反右”斗争都和“文革”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

研究所的所在地,北大附中的很多学生就是这些研究所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国家部委、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也慕名考入这所中学。甚至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美国黑人领袖的儿子及来自五大洲一些国家在华工作专家的子女都在此学习,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学校学风严谨,制度严格,校园里鲜花绿草,欢歌笑语,朝气蓬勃,令人向往。

但是,善良的人们,天真的学生们,谁能想到,一股黑色的疯狂在悄悄地袭来,这座圣洁的殿堂将被砍得七零八碎,倒在血泊中呻吟。

1966年5月底,从附中的上级单位北京大学传来消息:一张揭发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内部说就像1956年右派攻击共产党的大字报,后来才知是聂元梓等人贴的,成了十年浩劫的导火线,但当时很少人知道聂氏为何人。学生中特别是高中生在悄悄议论,校党支部赶紧做工作,要学生们安心学习,不要受北

系。“文革”初起,先是各级党组织把起来造反的学生打成“游鱼”、“扒手”、“假左派、真右派”,然后是毛泽东支持造反学生把“走资派”们打翻在地,“搅得周天寒彻”,其情其景和“八司马”事件何其相似!于今反思“文革”,“不管是干部、保守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都声称自己是这场持久运动的受害者”,说起来,这也是事实,“然而,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也是事实。”恰恰是后边这个事实,被反思“文革”的人有意识地忽略甚至忘却了。反思“八司马事件”,希望不要落入这种窠臼。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大事件的影响。

6月2日清晨,当学生们进入教室上课时,从高中教学楼传来了学生的叫喊声,校园不得安宁了。正当不知何因时,教室里的小喇叭响了,传来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颤抖的声音:“同学们,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今天不上课了,大家可以到北大看大字报,对校党支部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大字报。”

一时学校大乱。各班都贴出了揭发本班班主任或各科老师的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什么在课堂上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啦、穿衣发型特别啦、家庭出身不好啦、乱搞男女关系啦等等,甚至名字也成了揭发的材料。如“刘美德”被说成崇拜美国的品德,“贾世起”就是假的世界起义,不让世界人民起来革命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学生说话语气也变了,平时温文尔雅的学生几天内就学会“他妈的”骂人了,好像这样才革命。这也难怪,当时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思想简单,思维方式也简单。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组织(以下简称“红旗小组”或“红旗”)贴出了揭发校党支部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的最高领导,一看就有来头。这个组织吸收的人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当时就这么叫)、革命烈士或血统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只要所谓出身好就可以加入,表现好不好无所谓,以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打、砸、抢的暴徒。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的父母大都是当时国家党、政、军较上层的领导人,处于位高权重的位置,所以他们知道的内部消息很多,当人们还未搞清“文革”为何物时,他们就打听到下步运动的步骤了,斗争的方向自然是正确的。这样“红旗小组”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得越发有名,成为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齐名的全国中学生“文革”初期造反组织的先驱,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肯定,在“文革”史上也留下重重的一笔。在此不妨把他们的主要核心人物简介一下:牛××,男,高三学生,平时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特长值得别人注意,“文革”一来拉起队伍造了反才被人所认识。宫××,男,初三学生,“文革”前有些名气,主要

是他在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换得五分的秘诀》,痛斥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学生,讽刺为学好文化知识而刻苦学习同学,赢得了一些平时学习成绩差、家庭有些背景人的赞扬,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得到一些上层人物的肯定。彭××,女,高一学生,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文革”开始立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了造反先锋不说,还在天安门上对着百万人讲话,毛泽东就站在她身边看她讲,还与她在下面谈了二十多分钟话,这使她瞬间身价百倍,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及全国中学生的崇拜者。

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学校领导机构一下被冲垮了,“红旗小组”逐渐成了校园主宰。昔日的师道尊严威风扫地,学生开始发号施令。“红旗小组”控制了学校的广播站,通过高音喇叭命令老师们打扫厕所、楼道、校园。老师们哪敢惹“革命小将”,立即出来干活,正值吃饭时候,学生们端着饭盆,吃着饭看热闹,有的还把饭盆敲的叮当乱响,漫骂取笑着老师。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历史跟人们开了个大玩笑,叫今天的学生们听起来不可思议。

这样乱下去总不行,党中央(二十多年后才知这个党中央是刘少奇为首的,毛泽东在外地静观形势发展)决定向各校派驻工作组维持秩序。北大附中和北大同时进驻了工作组替代了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后很快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工作组领导人、出身好的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前面说的“红旗小组”头面人物牛、宫、彭名列其中。

于是,情况稍有安定,工作组召开了几次全校师生大会,组织学习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各班继续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追随者。昔日干净整洁的教学楼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塞满,一片狼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师被点名批判,几乎每个老师都有罪行,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新中国出了那么多罪人,国家不早就玩儿完了吗?那时人们怎么就那么幼稚愚昧呢?

但是,就这种形势也没维持多长时间。“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又从上头得到消息: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错误,当然,一般人是听不到的。

于是“红旗”开始找工作组的茬。散布什么“工作组不斗走资派啦”“工作组排斥革命组织啦”“工作组是运动的绊脚石啦”等等,双方矛盾露出端倪。消息传出,一般学生对“红旗”不满,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纷纷贴大字报斥责。一位名叫沉默的初二学生写道:谁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小心他的臭狗头!言辞激烈,实际是发泄对“红旗”的不满,可这位幼稚的学生哪里知道工作组根本不是毛主席派的,而“红旗”早从上层得到了消息。就是这句话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把沉默同学置于死地。

6月的疯狂在6月30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晚会上达到高潮。操场上坐满全校师生,利用面对操场的锅炉房平顶房顶做舞台,“红旗小组”借歌颂共产党的机会,喧嚣了自己的声威,同时也发泄了对工作组、对与他们有意见分歧学生的愤恨,风靡一时的《造反歌》就是在这天出笼的,它的词曲作者都是“红旗小组”的成员。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

声嘶力竭,杀气腾腾,此首歌很快传遍了全中国,成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歌曲。到处杀声震天,人们唱着它失去了理智,像得了神经病,疯狂起来了,建立不到二十年的新中国滚进了动乱的旋涡。

二、分裂的七月

7月流火,大火升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红旗小组”凭借内部消息造了校领导的反,也造了工作组的反,双方矛盾日趋激化。说实在的,工作组从进校开始就没慢怠“红旗”,“红旗”的头面人物凭着自己的家庭出身没把工作组放在眼里,工作组也尽量叫他们满意,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就把他们拉进去,在全校师生面前一一介绍他们,使这些原来学校中的无名之辈出尽了风头。其实,这些人反工作组,只不过是经某些上层人物的暗示,被当枪用罢了。可怜的倒是工作组,灰溜溜地撤走了,学校大权

落到了“红旗”手里。

“红旗”一掌权,就以家庭出身画线,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红五类”出身的都是好人,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的学生统统是坏人,拼命鼓吹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心谬论,并以这个标准贯彻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形成学生斗学生、学生打学生的混乱局面,学生之间的分裂从此开始了。至今,虽已过三十多年了,但当时形成的裂痕也没完全弥合,造成了一代人的创伤。在此笔者以一个初中班为例,揭示当时的一些情景。

初二(五)班,一直是个优秀班集体,四十多名学生中近一半是“红五类”出身,其中有国家部长、军队将军的子女,剩下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有著名作家、画家、科学家、普通职员子女,当然也有出身不好的,像“摘帽”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出身的。以前大家对此不太在意,团结融洽,选班队干部也不以出身做唯一标准,甚至出身反革命家庭的学生也当上了班干部,出身高官的人因道德、学习不好,能力不强也不被大家拥戴。这本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本来嘛,出身不由己,表现在自己。可在贯彻“阶级路线”时,上述情况就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现,是校领导、班主任的罪状,是压制“红五类”子女的根据。

一天,“红旗”总部召集大会,班里“红旗”成员全去了,回来后,个个脸色变了,话声硬了,见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绷紧脸,实在过不去的尴尬笑一声,像是演戏。原来,他们开会部署在各班打击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一位“红旗”头面人物在会上进行“动员”,大意是:过去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重用的都是学习好,但出身不好的人,班干部都是他们当,我们不少工农革干子弟因学习差被小瞧,现在我们要翻身!出身好的要团结起来,与出身不好的作斗争,揭发他们的罪行云云。

于是,学生斗学生掀起了高潮。初二(五)班“红旗小组”的成员组织召开全班学生会,名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揭发批判非‘红五类’出身学生的罪行”。首先矛头对准班长许国庆,他的

父亲是三十年代著名剧作家许幸之，曾与聂耳创作歌曲《铁蹄下的歌女》，“文革”开始被当做黑线人物揪出。班里“红旗”的头头凶狠地呵斥许国庆：“许国庆，你这个‘黑帮’子弟，当班长时和班主任一起打击出身好的班干部，散布他们的坏话，罪恶滔天！今天你要老实交代是如何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的！”许答：“我从来没歧视出身好的同学，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红旗”中有人喊：“许国庆，你态度不老实就等着瞧吧！”还有一位秀丽的女同学叫彭小清，其父是从美国回来的高级火箭技术专家，为七机部一研究所所长，后在“文革”武斗中惨死。只因其父是美国回来的，彭被当做资产阶级臭小姐批判。只抓住其在一次吃饭时见一革干子弟将菜与粥和在一起吃，无意说了句：“这样把菜和粥拌起来像农村喂猪的食一样。”这成了她的罪状。一位“红旗”的人拍着课桌吼道：“彭小清，你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胆敢骂革干子弟吃的是猪食，对无产阶级这么仇恨！不对你们这些人专政，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就翻不了身！”彭辩解道：“我说那话不是那意思，更不是骂出身好的同学，你们怎能断章取义呢？”立刻遭到“红旗”一些人的凶狠驳斥：“彭小清态度不老实，资产阶级狗崽子想变天！”因此，彭在8月的恐怖中几乎被打死，这在下文中将提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点名揭发批判，家庭出身成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这样以出身画线的学生之间争斗在每个班展开，校园里又贴满了揭批出身不好学生罪状的大字报。一位叫朱同的高中女生，其父是著名大右派葛佩奇（朱为与父亲划清界限，故姓其母朱姓，葛佩奇后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平反。）出身坏，又对“红旗”不满，遭重点批判，被贴大字报数量最多。

学生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再说一下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学校最高领导刘美德被认为是北大校长陆平的红人，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早被“红旗”监禁起来。其他领导及员工也按出身画线，接受批判。由于“红旗”忙着斗学生，对他们多少放松了一些。

什么是当时“党的阶级路线”，据说是这样的：重视家庭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红旗”他们却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老子

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奉若神明，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一些人的父母也被揪出成了“黑帮”“叛徒”，自己瞬间由“好汉”变成了“混蛋”了。

三、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7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8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1966年8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

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

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8月，恐怖也令人心悸。

自“红旗小组”掌权以后，其头面人物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特别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表示了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彭××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听了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广场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讲话。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问她的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时，随口说了句“要武嘛”。伟大领袖的一句话被红卫兵们理解要用武力进行“文化革命”。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文斗升级到武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应立起四个新。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毁于一旦，打、砸、抢、抄成了时髦，中国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浩劫。

“红旗”自然又是急先锋。他们个个穿上父母替换下的旧军装，扎上宽皮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先辈的传统。彭××带头到社会上去抄家，抄得大量现金、黄金、衣物。宫××还怀抱一大地球仪，瞪大眼睛，伸长舌头照了张相片，好像当年希特勒，想一口吞并全世界。

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

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激进分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撞,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

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像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8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落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

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做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像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文革”残害了一代人,难道不该好好总结吗?

再看看校园里发生的其它事。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大右派的儿子朱同惨遭“红旗”人的毒打,肋骨被打断几根,长期被关在没有窗户的屋里。“红旗”打狗队的杨某与李某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一个他们称为“地主婆”的老太太,把她打得半死,扔在校园的柏油路上,然后杨骑着摩托车从她身上飞快压过去,老太太惨叫一声气绝身亡!惨啊惨!不知这是谁家的母亲,就这样惨死。草菅人命,随便杀人,这与当年日本鬼子、国民党匪徒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文革”中的一幕。

打人、抄家日益严重,报纸上连篇累牍发文章表示赞扬,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一点保证,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恨,当红卫兵抄家时,他们组织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红卫兵被打。这下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名曰斗争小流氓,把一些与他们斗争的、被他们称作流氓的人带到会场当场打死。这种会已开了两次,打死了若干人。又准备开第三次,“红旗”点名要朱同、沉默(上文提到的,说谁反对工作组就小心臭狗头的那位学生)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大会。如果这个会真开了,这十几个学生甭想活着回来,早被当场活活打死,是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及时制止开会,挽救了这些同学,至今,他们还念念不忘周总理的恩情。

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这些曾一时穷凶极恶的红卫兵当时只是中学生,大都十几岁,虽然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但没有像聂元梓、蒯大富等大学造反领袖那样被送入监牢。把当时的史实记载叙说,使人们记住野蛮、落后、愚昧教训,对历史是一种负责。

(作者为北京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

• 崔增印

傅作义兄弟十人,排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都以“作”字为名首,作义排行老二。他八弟作恭从小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幼年跟随二嫂张金强在太原上学,人说“从小看大”,傅作义就看上八弟是个人才,十分喜爱,精心教诲,希望他将来能够学有所成,能为国家建设作些有益的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恭正上高中,随学校迁到成都。而后入金陵大学,学的是森林园艺专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毕业,回到西安,1946年回到山西老家考察,就看望姑母(笔者祖母)。笔者陪同他到邻村屈村黄河滩头吃杏子,他壮志满怀地说:“咱家这个地方多好呀!河滩可以种植庄稼果树,东面梯田种庄稼,沟里植树造林,这么好的条件,水又能灌溉,完全可以建成山川秀丽的农业风景区。”

刚由学校毕业的傅作恭,抱着满腔报国热情,接上姑母到了西安,与亲人团聚,分别八年后重聚,自然是格外亲热。

随后作恭去到绥远,见二哥作义谈起他的想法。无奈二哥正在忙于军务,全国内战风起云涌。傅作义很是赞称八弟学成有志。可就是国无宁日,内战烽起,哪有和平建国的条件,只好安排八弟到河套经营一个农场,为发展那里农业生产做点事情。

1949年以后,政府任命傅作恭为农场场长,他的许多想法,有些地方不合上级领导人的意图。他对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内行意见有些看法,对于一切必须听党的话的政治化的环境很不习惯,因而心情不舒畅,告诉二哥。遂于1952年把他调到甘肃,很可能是通过邓宝珊(甘肃省长),安排到甘肃省农林厅工作。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仍然不适应那里的政治环境,对1958年“大跃进”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很是反感,说了一些维护科学,得罪领导人的话,被划定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

养,实际上是进了无期劳改的集中营,

傅作义知道了以后很是伤心,很是为难,他又不好回信给带着几个孩子的八弟妹潘翠竹,也深知她在兰州没有工作,生活肯定困难,却又不便多汇钱资助。

那年代傅作义十分担心他的亲属,也担心我这个表侄子内侄婿是不是被打成右派。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刚做完手术,趁手术后休养之际,去北京看望表伯傅作义,他深怕我是逃亡“右派”却又不好直问,便巧妙地让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要我在家吃饭交粮票。我领悟到这是表伯的授意,随即掏出二斤半北京粮票交给段清文,并说明我此次前来,完全是为了看望表伯的,不多停留,还要回老家去。接着我又明确说明我不但不是“右派”还是给别人划“右派”核心组成员呢。当时我正在交大上学,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反右结论是“反右初期认识模糊,后经组织帮助,能够站稳立场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我把这些全部讲给段清文听。

果然第二天清早吃完早点以后,在客厅里傅作义对我说:“其实你们来都吃我的粮,再困难国家对我还是很照顾的。让你们交粮票主要是体现国家政策,咱们应该模范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你看人家毛主席,都让孩子在学校与大家同甘共苦。”

我立即掏出五斤一张全国通用粮票说:“我打算明天就走,这几斤粮票留给你们用吧!”他摆摆手,会意而放心地一转话题。

对于“鸣放”、“反右”,傅作义心里明白得很,不“鸣”吧说不过去,“鸣”吧该说什么话,他十分慎言。曾记得他在一次人代会上发言提到:“我以人民代表身份去到各地视察,发现有些地方对抗日烈士纪念碑保护的不够好……”有人回应说:“你所指的抗日烈士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只好屈在心里任人家瞎说去吧!

黄绍竑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被划成“右派”以后还去傅作义家里走动。傅作义婉言劝阻说:“我们都年纪大了,以后就少走动吧。”

傅作恭在劳教期间给他二哥去信没有我不知道,但给我来过信,让我给他寄上15元。我以匿名“石修”的名义给他汇了15元,不知收到与否,未见回音。他妻子潘翠竹前往去看他的时候,刚一见面他怒气没处发,打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后抱头痛哭。

潘翠竹回来,她又没有工作,带上五个孩子,生活已经到了断炊之时,只好上京求二哥帮助,给出个主意往后日子该怎么过呀?

傅作义对八弟妹一直印象很好,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女人,如今八弟出了事好歹也得管,他很伤心地对八弟妹说:“老八打你耳光不是打你哩,那是打我哩”,由言有衷,自责无能为力。只好给了八弟妹一些钱,让他们回山西老家,自食其力在生产队劳动度生。

傅作义知道八弟妹一个文弱女人,带上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力不够生活肯定困难!时而寄一点钱回去。有一次我去北京,傅对我说“老八女人和孩子在农村就是要让人同情哩,我不好多寄钱给他们,绝不能显得一个右派家里比别人强。”

潘翠竹在老家再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她盼望

丈夫早日能够释放,她哪里知道那儿是个无期劳改集中营,一天一天饿死许多人,她丈夫也在苦苦挣扎,期望二哥能够救他。不料她等到的却是一张丈夫死亡通知书。傅作恭活活饿死在夹边沟,通知书却说是“患病死亡”。

潘翠竹绝望了,她来信告诉二哥,刚巧我在北京,那天我从外边回来时,看见了表伯坐在秘书办公室里,我推门进去表伯手里拿着信说:“增印,老家来信了,老八不在了……”我走近坐在表伯旁边,只见表伯激动伤心地对我说:“……你说老八就这么不争气,两位老先生(指坐在办公室里的杨格非、赵伯纯秘书)为他动了多少笔墨,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可他……他就连这几天都没能等到,真是……”

傅作义悲痛已极,我又能说什么好呢?只淡淡地顺口说“凡事要争取主动哩”,没想到这句话恰恰说到了他的心上,他立刻说:“增印你再把刚才说的话给两位老先生听听,你说的是对的”。

对于八弟的死,傅作义不单是难受兄弟之情,他何尝不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啊!他只好写信劝慰八弟妹“……老八已经走了,命已如此,再不叫你牵肠挂肚了,希望你保重身体,把孩子照顾好。”

(责任编辑 杨继伟)

穿“尿素裤”的特权

• 陈世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农村基层的区委工作,那时,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用品,极为缺乏。粮食、食油、棉花、布匹等许多日用生活用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国家从日本进口化肥,都是“尿素”,都是用化纤布袋子装的。当时中国城里人,一人一年只有一丈五尺五寸布票,农村人更是少得可怜,城乡居民衣服都不够穿,城镇居民有穿打补丁的衣服,乡村农民更是衣衫褴褛,困难得没有裤子穿。所以,用完后的尿素袋子就成了当时农村的宝物,染一染,正好做一条裤子,就是“日本”“尿素”这几个汉字任凭你怎样

染,总是染不掉。

就是这种尿素袋子,也只有社队干部才能享受到,穿着这种裤子,前面是“尿素”、后面是“日本株式会社”制造。那时,农村流行有一首讽刺农村干部的顺口溜,提到了中国农民最早知道的日本产品:“来个社干部,穿的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这种尿素袋子,社队干部开后门才能弄到,为此,农民群众意见很大,说社队干部搞特权,意见反映到了区委,区委领导批评了开后门的事,并跟供销社黄主任讲,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

此事已过去几十年了,至今想起,心中仍然一阵酸楚。

都是日记惹的祸

● 韩振国

我于1946年上小学五年级时,因看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甜甜日记》,受到感染开始写日记,后来慢慢养成习惯,至今已六十余载了。不料在这期间多次因“日记”惹出祸端。

1955年报纸上连篇登载“胡风分子的反革命密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单位开始组织学习这些材料,拉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当时我在洛阳步校文化系任教员。突然有一天午睡起床后紧急集合到大操场,整队完毕,训练部副部长训话说:“今天进行一次保密大检查,现在把你们身上带的写着字的本子纸片立即掏出来接受检查,然后有人同你们一起到宿舍,办公室去检查,日记和书信要收上来慢慢检查,不许反抗”。于是按他的布置拿走了我的日记和别人寄给我的信件。随着运动的深入,从学习文件,联系个人实际交代历史问题和反革命言行,并且是人人过关式的。一天“肃反组长”说我发言避重就轻,态度极不老实,责令我交代变天思想和现行反革命活动,并说你肯定隐瞒了年龄,隐瞒了年龄,就是隐瞒了历史,按你自己说的1937年出生,1951年入伍时初中毕业,你5岁就上学了?在我老家5岁的孩子还没有断奶呐。我们已经掌握材料,赶快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对年龄的质疑心中觉得有点可笑并不当回事,未加申辩,群众也未就此穷追不舍。至于令我交代“变天思想和现行反革命活动”真是弄得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交代。既然组长声称已掌握材料,群众当然气势汹汹穷追猛打,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警告“顽固对抗,死路一条”,真可谓万炮齐发。但我就是交代不出任何有关变天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顽抗到底”,大有“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架势。猛攻了几个回合看看毫无进展,或许主持人觉得掌握的材料也不够充分,就停止威逼,挂了起来。最后才弄明白所谓变天思想是根据1954年的一篇日记分析出来的,当时洛阳连续下了二十多天雨,道路泥泞,诸多不便,以至发生过我们系一位教员的家属因路滑跌倒而丧命的惨剧(她在附近谷水镇小学上班,当时怀有身孕,已近临产,在回家路上

因下雨路滑跌倒引起大出血又无条件抢救)。于是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洛阳洛阳,落了的太阳,什么时候晴天呢!”这被看做“变天思想”了。“现行反革命行动”是由于一封信,这封信是运动开始以后才寄来的,被组织截留了,我并没有看到。写信的人原来也是我们系的教员,他1954年复员了,正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他知道我也有上大学的打算,所以在1955年6月给我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已经做好准备,并已开始行动,知道你也在积极准备行动”。这封信被当做特务机关发给我的行动指令,据此责令我交代“现行反革命行动”,运动结束我才看到这封信,上面有政委红笔批示“严加看管,令其交代”。我很庆幸,幸亏这封信发自青岛,并且写信的人原来也是我们单位复员的,大家认识他,事情的真相很容易查清。如果信来自海外,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即使不打成特务分子,遭逮捕关押,至少档案中也会有“特嫌”的记载,永世不得翻身了。在肃反运动中,就是因为一篇日记,一封书信被误解,白白挨了一闷棍。心中很委屈,有不满情绪。结果就是因为有不满情绪,所以“不适合在部队服役”了,组织决定对我作复员处理。回家后到一所小学当教师。

第二次因日记而大祸临头是1960年。当时在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这一年7月份临近期末考试了,雨季来临,在建的尼山水库拦洪坝急需加固,工地缺少劳力,向校方求援,学校就立即从各班抽调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去支援,我也在列。等到劳动结束回校时,一个同学就告诉我:你的同位偷看了你的日记(我的日记就放在课桌里),还抄了一些。顿时不觉打了一个寒战,她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出卖”我?我的同位是个女同学,她是团支部委员,我是班委会委员,并且都爱好体育,她是院女篮队员,我是院男排队员,平日相处得很好,根本没有发生过矛盾,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恩怨。她的做法当时显然是被认为忠于党、积极靠拢组织思想进步的表现。冷静下来以后就赶快审视一下日记,看看究竟有什么内容值得抄下来拿去告密,会造成什么后果。经过一番梳理能上纲上线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说曲阜城市建设和交通落后。我曾在上海青岛这样的城市生活,对曲阜的落后现状有所评论,这本来是很普通很自然的事,但我知道1957年“反右”时(那时我还未入校),曲师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大多因为说曲阜闭塞落后,主张迁校至青岛。所以“曲阜落后论”是曲师“反右”时一条主要的“右派言论”,我的日记中说曲阜落后,岂不和右派观点一致了。二是流露对粮食不够吃,经常饥肠辘辘的不满情绪。这本来是实情,但当时正是高举“三面红旗”反“右倾”的时候,说“吃不饱”岂不是恶意攻击“大跃进”给社会主义抹黑?但我想根据这些内容不可能专门开我的批判会,更不会扣上什么帽子,但也不会“平安无事”,只好内心惴惴然等待组织处理。期末考试完毕,放暑假的前夕,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这个暑假你就别回家了,留在学校参加基建劳动,(学校在建一座新教学楼,砖都是学生轮流义务劳动到砖厂运回来的,现在放假了,仍要有人运)。另外有人揭发你写“反动日记”,我分辩说,我写日记,但我不反动。他说人家已经把你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摘抄下来了做了揭发,反动算不上,但有错误,比如你对“吃不饱”就有不满情绪,你要就“错误思想”写个检查,要深挖思想根源认真检查,就不要别人帮助你提高认识了。我明白最后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你老实点做检查,否则开你的批判会。”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就我梳理的两个问题上线地自我批判一番,并请求组织宽恕云云。

第三次因写日记险些酿成大祸是“文革”中,1967

年的一天开完最后一个会,已是将近晚上10点了,回到家中下意识地掀开了日记本,写道:“一天即将过去了,算起来全天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共13次之多。除早请示,晚汇报,及每次开会必唱,必喊外,今天中午家中没有现成的饭了,到饭店去买馒头,走到饭店门口,饭店未开门,已围着一群人,过一会饭店的门打开了,人们一拥而入,都围在卖饭的窗口,这时出来一个手持红宝书的服务员,先领顾客唱《东方红》,继而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身体健康,又领着念了几段语录,才开始卖饭。下午到四方去办事,回来时从1路车始发站上车,乘客都上车了,车门也关了,但不开车,又是售票员手持红宝书领大家先高唱《东方红》,再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再祝副统帅身体健康,再念几段语录,然后才开车。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写完因墨迹未干,日记本摊开在桌上,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清晨被一阵愤怒的责骂声惊醒,“你活够啦,找死啊!看你写的什么!”我睁开眼一看,我爱人拿着我的日记本,指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瞪着眼看着我,我顿时冷汗淋漓,闯大祸了,这样的日记倘被揭发,我的好日子真到头了!唉,都是日记惹的祸啊!

以上是本人的真实经历,或许对年青一代认识那一段社会历史的真面目有帮助,写出来供参考。

(作者为原青岛教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层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80150号

淮海战役日记摘抄

• 庄 重

引 言

抗日战争中,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报。日本投降后,在江苏淮阴任《新华日报》(华中版)通讯部主任,同时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通讯部主任。1946年9月6日,接替范长江任社长的恽逸群通知,我与陈笑雨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不久,我与陈笑雨又被分别任命为新华社华东总分社通讯部主任和副主任。1946年深秋,宿北战役胜利后,我奉命上前线,常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由粟裕副司令亲自领导,与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起,负责华野前线军事报道。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豫东(开封、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负责协助前线分社组织新闻报道,采写我军胜利消息和战役述评,完成总社、总分社和华野前委交与的任务。

在那极度紧张的战争岁月里,我除了采写新闻,向总社、总分社发稿以外,还随身携带着大大小小的本子,坚持天天写日记、随时随地做笔记。其中一本淮海战役时期的日记,是我用上等的“道林纸”亲手制作的硬皮“精装本”。道林纸,是我华野解放军在开封战役中从敌人司令部缴获的战利品,我视为珍宝。为了节约纸张,我用比“蝇头小楷”还要小的字来写日记,从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部署淮海战役前后写起,一直写到淮海战役结束,一天也没有遗漏。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全靠笔记。许多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随笔记下。

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四次被抄家,图书资料几乎损失殆尽。这个淮海战役日记连同几个小小笔记本和手稿等,却被幸运地保存下来了,我这个九死一生的跨世纪老者也活了下来,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济南战役快要胜利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虽然他已被任命为“代司令员”),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他为司令员)就在思考下一仗在哪里打和如何打的问题。他与参谋长张震(参谋长陈士榘。张震为副参谋长,因过去他长期任参谋长,人们也习惯地称他为参谋长)商量后决定,乘胜立即举行淮海战役,于1948年9月24日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建议立即举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主席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9日,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和部署淮海战役。10月11日,毛主席来电对举行淮海战役作了重要指示(即《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中野”一部收复郑州、开封,并继续东进,华野3纵和两广纵队归中野指挥,出鲁西南,从西面侧击徐州,拖住商丘、砀山之敌。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中野一部在平汉路南段,牵制敌张淦、黄维两兵团。粟裕考虑到此次战役规模大,又是中原、华野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作战,于10月31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刘、陈、邓统一指挥。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全歼黄百韬兵团

11月16日,淮海战役开始。首战重点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即第7兵团)。我军迅猛进攻,黄百韬率部从陇海路新安镇西逃。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部到第一线,直接指挥部队追击。第三天,黄百韬兵团即被我华野各路大军包围于运河站西北面碾庄圩为中心的一个狭小地区内。

11月8日,国民党冯治安部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军长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率部起义,我军迅即兵临徐州城下,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11月10日午后我邯郸广播电台广播:徐州

地区现有敌军 4 个兵团、22 个军、46 个师，共 35 万人。蒋介石慌忙调兵增援黄百韬。黄维兵团 4 个军东来，敌之 55 军 181 师也自商丘向东，汉口地区有几军正向徐州地区开进中。这样，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就集中 8 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总兵力 80 万人，我军出动兵员 60 万，在豫皖苏边区，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战场西起商丘，东到黄海，南抵淮河，北到临城，纵横千余方里。

11 月 11 日 曲阜 我军发起淮海战役不久，即已取得重大胜利。黄百韬兵团在运河站附近碾庄圩正被我军围歼中，增援的邱清泉兵团被我打退。我军还在前数日解放了南阳、唐河、泌阳、商丘、海州、新浦、临城，收复了郟城。在商丘以东地区歼灭了敌 55 军之 181 师全部（包括师长米文和在內），在郟城歼灭了王洪九部两千余人。在窑湾包围敌两个师，一部分敌人突围，我大军正在追击中。南京下令戒严，戒严区域南到杭州，北到蚌埠，西至安庆，东至上海。

11 月 12 日 曲阜 今天听广播“国内一周”，谓 2 日我“东野”解放沈阳，从而解放了全东北，这是我军一次伟大的胜利。自 9 月 12 日至本月 7 日，我已在各条战线上歼敌 60 多万，加上 7、8 月份，则已歼敌 95 万人。现在敌人恐慌万状，美国大使馆已通知平、津、沪的美国侨民迅速撤退，并认为华北、华东将很快成为东北第二。

11 月 13 日 曲阜 淮海前线消息，黄百韬兵团部及其 25 军、100 军、44 军、64 军都被我军包围歼灭中。黄百韬兵团之 64 军两个师和 100 军之 44 师已被我歼灭。

11 月 14 日 曲阜 总社广播一条好消息：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战局说，我军已获得优势。从现在起再过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敌军现有 290 万左右，我军则已有 300 多万了，在最近 4 个月中，我军歼敌 85 个师，其中包括 63 个整旅。故战争的进程大为缩短。

11 月 16 日 中野攻克徐州以南的宿县城，歼敌 25 军一个师，封死徐州南大门，徐州成了一座孤城。孙元良之 16 兵团被我军包围在徐州南之符离集和夹沟地区。邱清泉之 2 兵团、李弥之 13 兵团也被我包围。黄百韬兵团大都被歼灭，剩下不足 20 个团。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总前委统筹一切，统一领导。

今天重要消息有：我军收复连云港，歼敌徐继泰部 7000 多人，收复睢宁，歼灭逃敌孙良诚 207 军大部。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拼命增援黄百韬，在 30 里正面以 5 个师作集团冲锋，以大量坦克、火炮、空军配合。我击毁和缴获敌坦克 5 辆，击落敌飞机两架。黄百韬兵团之 44 军、100 军都被全歼了，25 军、64 军已半数被歼。

11 月 22 日 曲阜 昨天华野政治部钟期光副主任自前方来电，黄百韬兵团剩下不到 3 个团，不久即可全部解决。蒋介石命令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增援黄百韬，限期与黄会师。邱清泉害怕被消灭，撒谎说已击溃我军，与黄百韬兵团会师，共军已向东南逃。蒋介石、刘峙十分高兴，遂颁发奖章，并命令邱清泉兵团追击，一直追到宿迁附近。黄百韬大叫并没有会师，他的部队快被歼灭干净，要求蒋介石快增援。中共中央就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美国武装保护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国民党实行任何军事保护，都是对我国武装侵略，我党我军为保护中国领土完整不受任何侵犯，一定要坚决地抵抗到底，一切后果都将由美国政府负责。

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派兵保护，上海市长吴国桢正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商讨由美军接管上海。美军拟接管青岛。

11 月 23 日 曲阜 黄百韬兵团 4 个军、10 个师已于 22 日 5 时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全部覆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自 6 日到 22 日国民党在徐州地区已损失 18 个整师，即黄百韬 10 个师，孙元良兵团 1 个师，孙良诚兵团两个师，刘汝明兵团 1 个师，冯治安部 4 个师（一部分被歼，大部分起义）。此外，还有 9 军 1 个团，74 军 1 个营及 5 军千余人，王洪九部 7000 多人，徐继泰部 3000 多人，收复县城 10 多座。真是战果辉煌。

现在徐州地区尚有李弥、邱清泉、孙元良、李延年 4 个兵团和自中原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共 5 个兵团，敌自华北继续调兵到华中来，华中敌军

各部统一由白崇禧指挥,可能还要歼灭他们两三个兵团,才能打下徐州,迫使敌人退守淮河以南。明年5月以前大概可以基本上解决中原问题。钟期光、陈其五20日来信(他们已到邳县旧城以南)说,敌黄百韬兵团之64军、25军相当顽强,逐村逐屋与我争夺。攻打一个村子,敌往往反冲锋四、五次。那里地形与我不利,村庄都在高台子上,四周筑土墙和壕沟,水深约1米,沟外是开阔地,我军不好运动接近敌人。敌空军空前疯狂地轰炸扫射,我部队伤亡不少,但士气空前旺盛,我俘敌甚多,仅6纵即俘敌万余,真是发了“大洋财”。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全歼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

11月28日,东来增援的敌人又一精锐主力兵团黄维兵团(辖18军、10军、14军、85军)进入我预伏的口袋阵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南坪集、白沙地区,被我军紧紧包围。敌85军的一个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起义加入我军。

12月1日,我军解放徐州。守敌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和党政机关人员及家属等共约30万人,向西逃跑,极为混乱,我军正追击和堵截中。

中共中央决定:我中原、华野两军要连续扩展攻势,不惜以伤亡15万人之代价,继全歼黄百韬兵团之后,全歼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于长江以北地区,不让敌人逃过长江,取得淮海战略决战的胜利。

我与华野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文轩等同志乘专车(中吉普)开赴淮海前线。12月9日,我到达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驻地于庄,与分社战友见面后,立即前往华野前线司令部向粟裕司令员报到领受指示和任务。

12月11日,早饭后,我一个人去襄王城。在此战役期间,我的任务是常驻华野前线司令部参谋处,负责发战报,写战役述评,领受前委的指示完成部队首长交给的任务,了解战局情况,及时组织报道。任务很艰巨,但我有信心完成任务。下午,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召开了直属机关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动员后备力量充实到前线作战

部队各连队,粟裕司令员亲自指示。他指出淮海战役的重要性,不仅要解决江北问题,而且要基本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决心连续持久作战,打得敌人没有喘息机会。如果把黄维、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都歼灭了,再歼灭可能来援的李延年兵团和宋希濂兵团,那么,在长江以北就没有仗可打了,一直到广东才有一场战役,故淮海战役是一场战略决战,我军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现在最需要的是干部。如果领导机关抽出大批干部下连队,则对部队是个很大的鼓励。部队有领导,打仗更加有决心、有信心。机关中的老成分抽出来到前方可以提升使用。机关经抽调以后,人少了,要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要提高工作效率。抽调了人要补充的,由政治部补充70%俘虏;另外30%,自己抓俘虏补充。各部门在动员时,要克服右倾保命思想。采取打通思想,与组织决定和群众推荐的办法。粟裕还指示:前方直属队抽调1000人,定于12月18日以前集中。野政钟期光副主任也讲了话,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领导权问题。

12月12日 襄王城 今天我发了两条新闻:

被包围在永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自2日到12日,已经被我军消灭8万多人,其中包括孙元良第16兵团两个军的全部。孙兵团7日突围时,即被歼灭大部,孙元良率残部往西奔逃,经解放军的追击和豫皖苏、冀鲁豫两区地方武装的截击,已全部捕获,共有4600多名,仅孙元良本人逃脱。我军对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继续紧缩包围圈,将其压缩在青龙集、李石林、左寨等村庄,东西不到20里、南北不到10里的狭小地区内。

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杜聿明部邱、李两个兵团,现正面临着饥饿的严重威胁,每天只靠飞机投掷数量极少的粮食。每个村庄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士兵,平均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山芋。在将居民的牛、驴、猪、羊、狗、鸡、鸭等宰食干净以后,9日起他们开始杀战马充饥。有的村庄连井水都喝干了。

12月13日 襄王城 今日我综合昨天消息,发出战报:我军对杜聿明部之大围歼战续有进展。12日下午,我军经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于9



淮海战役双堆集歼灭战的指挥员们

时攻占李石林东北之吴庄、李杨庄,歼敌第8军237师之709团、40军39师之117团及39师一个工兵连,同时攻占王花园、苗家、魏家楼等村庄。李弥之13兵团已被歼过半,邱清泉之2兵团伤亡异常惨重。中原与华东两解放军司令部已再次发出劝降书,劝告被围之敌从速向我解放军投降。

12月14日 襄王城 今日我又发出战报如下:

我军于13日黄昏攻克被围敌军杜聿明部固守的最大据点李石林(萧县以西)。并占领于庄、望庄、刘小窑、周庄、重姓庄等村庄。近日来,敌仍妄图突围,以第70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继续侵犯豆凹、鲁楼、李楼。采用“人海”与“肉弹”战术,反复冲锋,我军集中炮火予以极大杀伤。敌在我阵地前沿遗尸遍地。

我军为顺利歼敌,于昨日下午前先后撤出豆凹、鲁楼、李楼。昨日午后,敌第70军96师两个团犯我郭楼阵地,激战至今晨4时半,我将敌全部击溃。该敌被我炮火打死打伤极多,我军俘敌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

很多俘虏痛哭流涕诉说,敌军以“督战队”督战。当敌每次冲锋被我军打退时,“督战队”即以机枪向溃退之敌扫射,并将带队的军官杀死。仅进犯至豆凹、鲁楼、李楼三村,即有营连长数名被“督战队”枪毙。俘虏哭诉道:“我们被包围的官兵,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冲锋也是死,后退也

是死,不起义,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由于敌连续攻击我10纵阵地(鲁楼、豆凹、李楼),企图突围,我10纵任务艰巨。张震参谋长指示,要多表扬阻击战的范例,同时强调在战斗作风上要忍耐、要迅速、要顽强。因为我是《人民前线报》编委。我当即写信将张震的意见告诉《人民前线报》编辑部,谁知在半夜里,他们来了信要求我根据张震的意见,为该报

写一篇社论,而且要求明天午前交卷,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手边没有材料,时间又太短促。

12月15日 襄王城 早饭后开始看材料找范例,动手写社论,到10时许写成,约2500字。抄一遍可费时了,到下午两点才抄好。请粟裕、张震、刘瑞龙三位首长审改,他们改的很好。社论题目是《继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攻击,全歼当面蒋匪军!》

下午,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来此向粟裕司令员请示作战任务。袁谈了些徐州情况,谓敌退出徐州时太仓皇,来不及破坏。我收缴的重要物资有汽油约两万桶,火车头60多个,车厢无数,弹药甚多,飞机场及空军俱乐部尚完好。敌人遗弃的造桥器材也很多,大大有利于铁路交通之恢复。

12月16日 张家寨 拂晓,我一个人踏着晨霜去李凹,到庄西头的一个独立屋内,这便是作战室。袁参谋告诉我一个大大的捷报:“敌黄维兵团于昨晚6时突围,至12时被我军全歼。”据说:黄维改穿便服乘104号坦克(共17辆坦克)逃跑,谁知104号坦克开到双堆集西南倾倒在河沟里,黄维等人下坦克逃走,估计逃不出我军的手中。这是伟大的胜利!黄维兵团覆没,预示着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将全部覆没,来增援的李延年兵团(辖54军、52军、39军、20军)可能逃回蚌埠。

黄维兵团即12兵团,除直属队外,共辖4个军、11个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是蒋

介石最精锐的兵团之一。番号是：18军（辖11师、118师、49师），85军（辖32师、110师、216师），汤恩伯系；10军（辖18师、75师、114师），属李仙洲旧部；14军（辖10师、85师），为卫立煌旧部，曾担任重庆卫戍部队，第4快速纵队。其中，110师两个团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起义，23师两个团残部及军属野炮营在师长黄子华率领下投降，其余全部被歼灭。

我又发了一个战报：昨夜敌在我永城东北之夏寨与刘集放毒气，我有一个连的指导员中毒。在夏寨与夏庄之间，我攻克了3个无名庄，歼敌一部，缴获敌人破坏遗弃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共20门。

听说陈毅司令员今夜回来了，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的几个纵队也回来了。

午时到前线分社去了一趟。分社驻地刘楼被敌机轰炸了，只余下一角。我们昨天的驻地襄王城，今晨遭敌机集中轰炸。

两天前，12月14日11时毛主席给粟裕的电报称：“你们围歼杜、邱、李各部，提议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

12月17日 蔡凹 今晚，华野前委在蔡凹开前委扩大会议，每个纵队来一位纵队首长，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指示，部署作战和休整问题。粟裕司令员来信让我去参加会。

谭震林副政委在会上说：现在敌人比较大的集团是北平，可能有10个师。北平已被我军完全包围，天津两天内也可能被我完全包围。华北敌军四五十个师，将被我军各个包围歼灭。除此之外，敌人尚有南京、汉口、西安三个小集团。黄维兵团被歼之后，蒋介石也可能再集中10个军来赌一宝，但可能性不大。道理是敌军缺少骨干。只有桂系的张淦兵团，但白崇禧未必愿意拿来拼掉。现在，我们丝毫不怕敌人来增援，相反，欢迎敌人来增援。再过10天，我们有本钱歼灭敌人援军10个军，而杜聿明部再过10天可能饿死。我如果能再歼敌10个援军，则我军过长江以后，可能没有仗可打，因为敌人要打，部队分散，一时集中不了。彼时，敌军剩下不到100个师。最后决战战场在两广。杜聿明部一定要突围，一定被歼灭。我军究竟放好？还是打好？一放，敌人溃乱，像一

窝蜂，就不成部队，容易歼灭。敌人企图向南突围，即使向西，也要向南。敌人的建制被打烂了，没有一个完整的连。突围也逃不出南边几条河。因此，我们可以休整10天。

前委扩大会议散会以后，将军们纷纷乘车回去。粟裕司令员把我和宣传部的两个部长留下，研究如何对敌人加强政治攻势。粟把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主席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10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三）对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对杜聿明的口语广播词起草任务，我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表示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了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了吧！”这篇劝降书，当天夜里新华社总社就全文广播了，题目改成《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边的署名也改了，内容有几处也做了技术性的修改。这是毛主席为我修改审发的第一篇稿子，他改的好。也是我写的最快、审发最快、总社广播最快的一篇稿子，所以我很高兴。

12月17日晚上蔡凹 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在蔡凹华野司令部举行。由于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已胜利在握，会议着重讨论了未来渡江作战和队伍整编问题，并决定由粟裕、张震起草渡江作战计划。会议于12月18日结束。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去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邓小平返回中野司令部。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最后全歼杜聿明集团

12月18日 徐楼 据前线司令部今日统计，自淮海战役开始至前天作战40天中，敌人共损失34个整师，即黄百韬兵团10个师，黄维兵团11个师，孙元良兵团4个师，冯治安部4个师，孙良诚部两个师，刘汝明兵团1个师，宿县1个师，灵璧1个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3

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1个师起义,孙良诚率1个师投诚,赵璧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27个半师全部被歼灭。

昨日消息,敌在陈官庄附近修了一个临时飞机场,昨天降下一架运输机,运走一部分人员。杜聿明仍企图突围,据说在等待空投给养,给养充实了即行突围。

12月19日 徐楼 下午,到后勤司令部刘瑞龙司令处,适逢他与万金培、周伯萍二同志谈支前工作,我旁听了许久。得知支前概况。此次山东、华中、豫皖苏区和冀鲁豫区共动员民工40万人。前线我军所需的粮食及油盐均已不成问题,3200万斤大米正自苏中区络绎运来,小米、白面也很多。现在要解决吃菜问题,要采办大批蔬菜、肥猪及纸烟。要争取少吃粗粮,多吃大米。随着战事向前发展,粮食要跟上去。口号是:“哪里打炮向哪里运粮”。部队每人带3天口粮,米袋装满。各支前办事处运输4天粮食,共7天。

陇海路新安镇到洛阳间的火车通了。明天,津浦路宿县至济南也将通车。这是件大事情。苏中的大米由运河站装火车运来前线,将节省多少民力,多么便捷!

中央决定,发给此次参战部队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进行慰劳。

有23个常备民工团(胶东10个团、渤海区8个团、鲁中南3个团,另参加35军的还有两个团),于本月底以前分批参加我军各部服务,限期6个月,每个常备民工团配500副担架、500个挑子,共3500人。部队准备欢迎,同时欢送复员的民工。

12月20日 徐楼 今天我发了3条消息。解放军总部今天公布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总战绩,共歼敌17万多。

敌人第四次放毒气。据俘虏称,天晴时,准备来100架飞机放毒。

12月23日 徐楼 黄昏以后,突然降落鹅毛大雪,半小时后遍地皆白。在大雪的攻击下,将加速敌军杜聿明部的覆没。自19日起,敌人即断绝空投了,将何以充饥?何以取暖?再下几天大雪,该部敌军不需我军攻击,也要饿死冻死。但敌人死到临头还不知死。据前线来说,敌在所占村庄,不让老百姓逃出,将十五岁到四五十岁的

男子补充部队,青壮年妇女悉数被强奸。老百姓被集中起来看押。敌人到处抢劫钱财及粮食,把房子拆毁将棺材劈了当燃料做饭和取暖。敌人仍妄图在天晴时突围,组织“敢死队”冲锋,提出口号:“谁参加‘敢死队’给他一碗白米饭吃。”

12月25日 徐楼 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于22日下午4时起修复通车。

被围杜聿明部有空投时,一天吃一顿稀粥。19日每个人发两个馒头,后来每人只发3两米。没有空投已是第7天了,据说连树皮草根也吃完了,敌人已临绝境,向我投降者甚多。有情报说,天晴时将有100架飞机来放毒,掩护杜部突围。

据陈士榘参谋长谈,敌军在双堆集投下的是炒过的高粱米和盐水煮过的豆子。

黄维于15日夜间被我军生俘。

12月26日 徐楼 今天踏雪回前线分社一趟,看到几份总社广播的电讯。(一)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人包括杜聿明在内为头等战争罪犯。(二)淮海战役第一、第二两阶段的综合战绩,共消灭敌军黄百韬、黄维、孙元良3个兵团,重创打垮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重创并正在围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敌在11月6日至12月16日共40天中,损失3个兵团、1个快速纵队,共40万人,解放徐州、海州、淮阴、商丘等城市30多处。此次胜利对国民党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打击,加速中国革命战争达到最后胜利。(三)淮海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警告杜聿明停止放毒。前线司令部公报和发言稿都是粟裕指定我写的。

今天华野前委决定要我起草两个署名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唐亮、钟期光的文件,一为《新年告全体指战员书》,一为《告全体伤病员书》;下午,我去请示粟裕司令员。

12月26日 徐楼 华野政治部发出《关于大力抓紧时机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

12月28日 徐楼 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谭震林:现在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用各种名义写信给敌方各级长官。中央军委指出三种可能性:(一)强攻解决敌人;(二)半瓦解半强攻地解决敌人;(三)敌人由瓦解发展到集体投降。

据统计,16到24日,敌人来降者共有2516名(内有尉级军官15名),携来战防炮1门、迫击

炮 8 门、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30 多挺、步枪 500 多支及其他武器甚多。

12 月 28 日 徐楼 上午 10 时,敌机又来了。敌统帅部准备向杜聿明部空投 18 万只防毒面具,以飞机洒汽油再投燃烧弹和毒气弹,用毒气用火攻,助杜聿明部突围。

敌将放弃蚌埠。徐州“剿总”已自蚌埠移至滁县,55 军、68 军开往合肥、寿县地区,54 军、39 军开赴南京地区,99 军、96 军在蚌埠东西地区,21 军、4 军、51 军在高邮、江都、兴化、东台以南。看样子,敌人将放弃守淮河,而去加强江防了。

现在除阎锡山、傅作义、杜聿明三个集团外,国民党在全国还剩下 55 个军,可能以其中的 20 个军守南京、上海,8 个军守汉口,还有西安胡宗南的 10 个军,其余都散在江南各省及边疆地区。蒋介石只有 100 多万军队,他还能打什么仗?国民党统治最后覆没的日子确快到了!

在前线分社摄影组取了刘、邓半身相片,是 12 月 17 日刘、邓来华野司令部时照的。

12 月 29 日 徐楼 上午开始落雪,敌飞机仍不断地来,多在云雾中飞行,据悉,空投的大米,有一部分落到我军阵地上,为我们送来了新年礼物。

今天,华东前线分社讨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报道工作。参加会的除我外,有邓岗、李扬、丁九、陈冰、包小白、顾耕初、季音、叶家林、毛履鄂、陆仁生等。苏北兵团前线分社编辑部主任陈羽章也来参加。他住在永城东南铁佛寺西北,离此约 90 里,星夜赶来。

12 月 31 日 徐楼 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清晨地上积雪厚约 3 寸。

昨晚敌 70 军 32 师一个营在营长及 32 军司令部二科科长率领下向我投降。一夜投降之敌共 824 名,造成新纪录。自 12 月 16 日到月终,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投降的官兵已达 6000 人,相当于敌军一个师的兵力。

因为过新年,中午吃大米饭(自 12 月 11 日以来,顿顿吃大米饭),肉烧栗子、红烧刀鱼、黄花草炒猪肝。而包围圈里的敌人,被包围将近一个月,连麦苗树皮都吃光了,柴也烧尽了。今天,我写了两篇关于敌人投降的综合报道稿,请粟司令审查发表。

1949 年 1 月 1 日 萧县 徐楼 早晨,我到粟司令那里拜年,他很愉快。桌子上堆了不少花生,他请我饮茶、吃花生。他要我再写一篇供总社广播的劝降书,也就是我写的第四封《劝杜聿明投降书》。我随即动手写几百个字,很快就写好了,署名陈毅、粟裕,由粟审改签发。

晚上,读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大家读了同声叫好,一致认为它可能是毛主席写的。社论的中心是揭露和打击敌人的“和平阴谋”。社论提出:1949 年向长江以南进军,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1 月 2 日 徐楼 天晴 敌机从早到晚不断向杜聿明部投掷粮食。在敌 2 兵团司令部驻地陈官庄的飞机场上,上午 8 时敌人为抢大米,相互开枪打仗,兵力由 1 个营增加到 3 个团,步枪和机枪打个不停,直到下午 2 时才平息。

我军将于 1 月 6 日发起攻击,拟以 1、4、7、10、11 纵队五个纵队加上冀纵,分割歼灭敌 8、9、72 三个军,以 8、9 纵队歼灭敌 12 军。估计这样一打,邱清泉兵团可能向西向南突围。

1 月 3 日徐楼 我军决定于 6 日下午 3 时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先分割歼灭李弥兵团之 8 军、9 军与邱清泉之 72 军和 59 军。

晚上,野政召集各直属单位 60 多人开会,野政唐亮主任讲话,他要求我们一切工作要为即将过江发展的形势作充分打算。我军一过江,部队即分散,以完成战略展开,在一亿以上人口的广大地区,追歼敌人与发动群众。故一切工作组织宜短小精悍,重质不重量。到半夜才散会。

1 月 4 日 徐楼 根据昨日收缴到的两箱毒气弹,我又写了一条消息,以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口气,警告杜聿明立即下令停止放毒,停止抵抗,向我军投降。

1 月 5 日 徐楼 今天我连发两条总结性的消息(一)自 12 月 17 日到本月 5 日 20 天中,敌杜聿明部降我官兵 14000 多人,内有江苏省保安二旅旅长耿继武等军官多人。(二)杜聿明一部从徐州西逃时带出来的 24 万人,至今已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约 10 万 4 千人(包括投降的 14000 在内)。

我军决定于明日下午 3 时,发起对杜聿明残

部之攻击,先解决李弥兵团。我各部完成攻击准备。

1月6日 徐楼 我军各部于下午3时开始炮击,对敌军进行攻击。到深夜12时,已攻克豆凹、小阎庄、小辛庄、何庄、夏庄、郭营、魏小窑、李明庄、范庄、徐小凹、李楼,歼灭敌人约9个团,进展甚为迅速。

1月7日(徐楼) 我军又克复刘园、吴楼、陈阁、万庄、孔楼、王庄、夏寨、左寨,连同5日收复的鲁老家、臧凹,共克复24个村庄据点,歼敌10多个团,左寨敌12军1个团投降。下午7时,攻克王庄,歼敌军另一个团。敌邱清泉之2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陈官庄,李弥之13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均已暴露在我军的直接攻击之下。粟司令下令猛攻,迅速全歼邱、李两个兵团部。

1月8日 徐楼 半夜,参谋处作战股长秦叔瑾来叫门喊我,说青龙集等地敌13兵团全部西逃。我立即前往作战室。天气阴黑,北风刺骨,奇寒,没有灯火,看不见路,我只得摸索着走路。核实情况后,我当即写了一个战报。这时候已拂晓,但还有一阵黎明前的黑暗。我摸进粟裕司令员的住处,他已睡,我请他审查了稿件,将它拿回来拍发了。

由于敌13兵团的溃退,今天凌晨1时的敌我态势是:敌已后退到刘楼、穆楼、鲁楼、张庄、崔庄、胡庄、朱楼、朱小庄、丁枣园、刘庄、周庄、李庄、刘集、刘小楼、宋小窑一个小圈圈内。我军的包围圈比两天前缩小了一半以上。敌人十几万人挤在一起,极度混乱。

敌机昨天下午和今天下午2时在大回村附近我2纵、8纵阵地上大肆轰炸,并投下大量毒气弹。据可靠情报:敌人准备明天向西及西北方向突围。我军已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地,让他突围,在他运动中歼灭他。另悉,敌军70军军长高吉人6日被我军炮弹打伤了胸口。

我军各部队进行土工作业,继续攻击敌人侧后,压迫敌人向我口袋阵地里钻。今天大战,9纵攻下寇庄,歼敌5军200师600团1个营和1个骑兵连。骑兵已无马,因为马已被吃掉了。

1月9日 徐楼 今天是最紧张的一天了。敌人纷纷向西集中,大举犯我左寨、王花园阵地,占了我左寨,这是敌人突围的行动。炸弹和炮声

很密。我军准备下午2时从敌人侧后方一齐猛攻,压迫敌人非向西逃不可。粟司令、陈参谋长都亲自打电话传达命令,指挥作战。到夜间10时许,我攻击部队又克复了朱楼、朱小庄、胡庄、贾庄、崔庄、张庄、陆菜园、刘庄、王刘庄、陈楼、鲁楼、邓楼、竹安楼、罗庄、李庄等10多个村庄。至此,我3天来已攻克54个村庄,歼敌(连投降在内)20多个团。我4纵、10纵像猛虎一样楔入敌人心腹阵地黄庄户,距敌人两个兵团司令部及杜聿明指挥所之陈庄、陈官庄极近。我各路大军即以陈庄为中心猛烈攻击前进,行动速如闪电,横扫敌成千成万个地堡、散兵坑及蛛网式交通沟。预计作战数日内可全部结束。因此,粟裕、陈士榘、张震等首长已在讨论徐州休整的事情了。作战室的气氛极为紧张,大家的情绪极其兴奋,作战参谋快忙死了!

1月10日 徐楼 战事发展出乎意外的快速。今晨7时我到作战室时,敌我态势已大变。我军于夜间12时总攻,迅速发展,已歼敌4个军,陈庄、陈官庄、黄庄户均已打下,残敌被我军压缩在王庄、郭庄、宋窑、谢庄、赵庄、刘庄、大王庄、杨寨、宋小窑、刘小楼13个村庄内。我军以赵庄为作战目标的中心,各路大军趁胜猛攻,敌军已全部崩溃。我军遍地捉俘虏,一个人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缴了枪,即叫俘虏卧在交通沟内不准动。敌军70军军部投降了,5军54师师长也率部投降了(昨晚敌42师副师长在崔庄率3个团投降),李楼32师师长率部野炮营、辎重营投降了,带来了12门野炮、3门美式山炮。杜聿明已在10日早晨被我军生俘了!我马上发了一条消息。敌人是土崩瓦解了。粟司令对我说:“中午12时,你可以发一个战报,说战争已接近最后解决。”我回前线分社传达情况,8点多钟我重到作战室,情况又变了:敌人的阵地只剩下6个村庄了,我军已在赵庄会师,正在捕捉大批俘虏。9点半钟,从最前线打来电话说,敌人只剩下两个村子了,大部分敌人已被解决,整个淮海战役基本上结束了。我说不出作战室的人们是如何热烈欢呼、紧张和高兴!陈士榘参谋长第一个跳起来把帽子抛得高高的呼喊:“乌拉,我们胜利了!乌拉,我们胜利了!”紧接着每个人都跳起来,大声呼喊:淮海战役,我们全胜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大饥荒年代迫害上访者史料

• 赵宗礼

“大跃进”以后，635 万人口的南阳专区非正常死亡和外逃人数多达 100.9 万（根据南阳地区志 221 页等各种地方文献资料测算出来的）。仅 1960 年全区就锐减 69.8 万人，为上年底总人数 638.7 万人的 10.92%。正由于此，1960 年 11 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南阳是仅次于信阳的“重灾”地区，除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坐镇南阳指挥抓运动外，国务院也下派到南阳 43 个得力干部，协助河南主抓南阳的“整风整社”。丁乃光和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及一位叫霍幼方的人是国务院下派工作组的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丁乃光还兼任了南阳地委书记，名列第一书记林晓之后，实为中央的“钦差大臣”。

丁乃光来了以后，给习仲勋、安子文、张苏并国务院机关党委写了“关于淅川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严重违法乱纪、欺上瞒下等问题的报告”、“淅川县县、社、队反、坏分子残害劳动人民的种种刑罚报告”、“南阳专区缺柴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在今天看来虽然在个别政治术语上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略有以“左”反“右”的味道，但仍不失之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下面原文抄录丁乃光给中央几个权威部门的信及附件：“淅川县人民向中央写信遭反、坏分子打击报复的 4 个例子”：

信的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

我随国务院机关下放干部到淅川县已经十多天了。这个县是封建势力复辟的三类县，据说被称之为南阳专区的“光山县”。

工作中发现了原县委书记梁宏江打击报复，封锁消息的一些问题，我顺便查了几封中央有关部门转到县里责成查处的几封人民来信。因我没有到县人委去查，对国务院秘书厅转来查处的信件还不了解。

看了这几封信后，我感到 1957 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召开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以及随后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指示中，所提出的对省以下人民来信来访“多办少转”的原则，仍然是需要坚持贯彻执行的。中央监委关于“不要把群众控告信转给被告人手里”的规定，对我们办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人来说，仍然是必须严肃执行的。中央秘书室豫甲（59）字第 2031 号转给淅川的匿名信，是一封极为重要的来信。不知怎么搞的，这封信竟落到被控告的人手里，这几件案子，如果我们在检查总结来信来访工作时，结合研究一下，找出经验教训，我想这对改进今后的工作，是会有教益的。

即致

敬礼

丁乃光

1961 年 1 月 27 日于南阳

附：淅川县人民向中央写信遭受反、坏分子打击报复的 4 个例子：

第一封来信是，1959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豫甲（59）字第 2031 号，转淅川县匿名信件。

主要反映：1、本县人民为生活所迫到处外逃，思想混乱，人心不定；本县公安部门干部手持手枪，威胁人民。2、社员饿死很多，清泉村一带在 13 天之中就死亡 30 多人，有一个小孩饿死了，被别人拾去蒸熟卖。3、本县有坏分子集团，破坏全县的生产生活。

此件淅川县收到以后，原县委书记梁宏江指令县公安局副局长姚忠清去了解调查写匿名信的人。姚立即安排了 3 个公安人员下去调查，经过查对笔迹，认定是滔河公社朱家山村一个叫朱定远（男，37 岁，中农）的人写的，便定性为：“写反动匿名信”。他们假造朱的历史：说朱 1946 年至 1947 年当伪保长 2 年（实际是朱的祖

父当过国民党时期的保长)。还说朱：“向中央写反动匿名信，诬蔑淅川县生活不好饿死了人，骂县委是坏分子集团”。当时朱定远在青海，梁宏江令县公安局把朱从青海逮回来，两次向地委请示，要判朱的刑，地委没有批准。后梁宏江、姚忠清私自把朱定远判管制劳动3年。

此案一直拖到这次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1960年12月15日淅川县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撤销原判，宣布朱定远无罪，予以平反。

附注：朱定远为复员军人，因为淅川县党、政领导被反动分子篡夺，封建势力复辟，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和破坏，他在本县本乡生活不下去了，才被迫外流到青海。去青海途中，朱定远向党中央写了这封匿名信，揭发坏分子，揭露真相。从现在淅川县民主革命补课中所揭露的问题看来，朱定远所反映的问题完全真实，当时就看出了县里有坏分子集团、公安局向人民专政这个本质的问题。可惜这封信我们仅当一般信件看待，又转到坏分子手中。结果朱定远本人遭到报复，更重要的是淅川县的问题也未能及时发觉。此后一年之中，全县在反坏分子继续统治下，又死去了三、四万人民，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丁乃光

1961年元月23日

第2封信是，196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60)字第592号，转给淅川县委的一件人民来信。

主要反映：1、原来县委书记段秀廷在这里时人们生活还好，现在的梁宏江书记来了以后，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下降，甚至两个多月人们都吃不到五谷，至今饿死的人很多。2、双河镇饿死些人就无人埋，社员温自强5个孩子全部饿死。3、淅川县的人死有一半，外逃的人有三分之一，若不早些挽救，后果不可设想。

此件转来后，县长李磊石说：“得下去调查，这里头有敌人破坏”。当时组织县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干部王成业等4人，到双河镇调查。调查结果，这个大队3000多人死了430人，占总人数的14%。向李磊石汇报后，李大发脾气说：“这不是真实的，死人数字过大，再去调查！”这一次，当时正在淅川工作的地监委宋科长（宋希琨）、县委来信来访办公室干部王成业、县监委干

部彭星三等4人组成调查组，前往双河镇进行了前后8天的调查。经过详细调查发现：该大队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共死亡486人（实际是487人），占原有人数的12.6%，患浮肿病412人，其中严重的215人，死亡177人。粮食供应情况是，1959年11月每人每天吃一斤红薯（折合16两秤为4两粮食）；12月前半月每人每天吃半斤红薯，往下去便没有粮食，中间每人曾发1斤粮让吃6天，到元月下旬才开始吃返销粮。复查结果向县委作了汇报，县长李磊石、组织部副部长黄福田俩人商量后说：“死人没那么多！”并怒气冲冲地质问说：“你们是咋调查的？为啥给人家弄些假材料？把未死的也统计在死人数中（实际上没有），1岁以下的小孩谁叫你们统计的？重新调查！”（宋希琨等第二次调查时，县里还派常委宣传部长杨芳馨等人参加。又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因时间改为从1959年12月份算起，比上次少1个月、4个月时间死亡427人，笔者依据南阳地委(60)479号红头文件注）。二次调查后黄福田说：“一、浮肿病根本没那个病，不能说是浮肿病死的；二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要认识到这是阶级斗争，不能仅说是生活问题。三是1岁以下的小孩死不能按人统计。”最后说这材料县委研究后再决定是否上报。把直接和生活有关的浮肿病问题都划没了，4月份调查结束后一直拖到9月份才上报。事后对调查者进行打击报复，将彭星三调出县监委会，下放到农村不叫回机关工作，将王成业抽调下乡，不让其做来信来访工作。

第3封信是1960年4月9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60)诉字第651号，王定川反映河南淅川县大湾村群众缺粮情况的来信。

信中说：“我在河北省曲周县监委会工作，家里的父亲来信说，淅川县大湾人民生活苦，因缺粮造成人口死亡，问题严重，他们同住的一个院里的3户人家，就死5人。”

此件转到淅川后，县委即派监委秘书王喜才，城关公安员王信去到大湾村，了解王定川父亲有啥问题，为啥向上反映情况？王信先找到王定川的父亲王新昌，追问他去信的目的动机，并叫王新昌写出书面检查，纠正原来的说法。大队支书胡保仓在包产队社员代表大会上批判王新

昌说：“王新昌的儿子是干部，女婿是军官，他二儿子在上学，他还说破坏话，还告党支部！”把王戴上历史不清的帽子，不准王参加社里的会议，还不准他二儿子上学。

实际王定川反映的问题最属实。该队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上半月，每人只吃1斤到1.5斤红薯，干部多吃多占严重，社员吃到的很少。因此造成全队死亡155人。占总人口1851的8.3%，严重的第二包产队死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

第4封信是1960年5月中央监委批转的长春市监委干部靳平宇给中央监委的信，让淅川县调查处理。

主要反映：老家淅川县上集公社水田大队靳家沟包产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全村原250多人，现仅剩180多人，除外逃20多人外，其余的人都死了。全村过去180多个劳动力，现只有三四十人只能做些不重的活了。

此信转到淅川后，县委第一书记梁宏江即指示叫面向上级写假报告，谎称：“该村原来230人，去冬今春（即1959冬，1960年春）只死14人。大多数是常年有病体弱死的，外流的只有5人，且属于干部家属和不安心农业生产而外出的。另一方面派人了解向靳平雨反映情况的人，在知道是其弟靳平清去信说的情况后，即捏造假材料，把靳平清砍小树20棵，说成是砍树320棵，还将村人丢的30斤红薯说成是靳平清偷红薯450斤、青菜500斤，将其交群众大会斗争。斗争中，追逼他说出给其哥写信的动机，并叫承认自己是睁着两个大眼说鬼话，斗争后交群众对其管制。

实际是：靳沟村250人，死亡31人，占总人口的12%，外流8人，主要原因是：①、干部作风粗暴，捆、绑、吊、打社员。②、群众生活不好。1959年11月每人每月只吃粮3.12斤，红薯60斤。12月份，每人发红薯24斤。1960年元月，每人每天定量6两（16两秤），实际上根本没粮。

追根溯源发现，南阳境内为了封锁消息，粉饰太平，从1957年“反右”以后就开始了给中央写信的人进行了各种不应有的政治迫害。这里另举3个给中央写信的党员因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不好，两个被打成“右派”，一个被打成“潘复生

式的右倾机会分子”的典型例子，算是对丁乃光所反映情况的一些印证：

1956年12月20日，“南阳县何庙中心乡饥饿的群众”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该乡“有的户粮食仅够年内吃，有的年内也不够，明春各家都没饭吃，大官寺村已逃荒50多人，挑着孩子，背着行李，到外边讨饭。有的因病没钱治，又没有好吃的，很快就死了”。“希望挽救我们的饥饿，叫我们活下去”。还说了句牢骚话：“我们也是中国人，而且还是生产粮食的人，可什么不让我们吃粮食呢？”

1957年元月22日，南阳地委在收到省委办公厅批转的这封给中央的匿名信件后，下批给南阳县委，责成其“了解群众，弄清情况，妥善处理，告知地委”。南阳县在查出写匿名信的是转业军人、何庙中心乡党支部副书记范伟正所为后，立即把范撤职辩论（实际就是批斗）。到今年8月河南全省批判“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范伟正又成了批斗的重点人物，反复批斗，直到1961年秋，经“甄别”后，才得以平反纠正。

第二日个例子是时唐河县桂章乡李汉章村（现社旗县兴隆镇桂章行政村李汉章村民小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少尉军医张培养1957年4月12日给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信中反映该村“开春到4月上旬，要饭人数已达40%以上，牲口死20%以上，卧倒不能干活40%以上。80%农户已经断粮”等严重缺粮情况。5月3日南阳地委收到了省委办公室转来的此信后，虽然立即责令县里对严重缺粮的农民进行了及时地救济，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便借着“反击右派进攻”的政治大气候，给张扣了顶“诬蔑合作化运动”、“反对粮食政策”的“右派帽子”。张培养本来已安置在方城县郝庙区卫生院且当了副院长，是位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因之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发配到原籍生产大队当了一位卫生所医生。

如果说前两个例子是下边县里的领导们对上书中央者施展的打击报复的话，对一位叫邱文华的人打击报复那可是南阳地委的直接责任了。1957年5月20日，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干部邱文华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写了一封控告信，反映时南阳境内的泌阳县饶良区建设农业社淡庄村（今社旗县饶良镇黄桥行政村淡庄村村民组，邱文

华家乡), 农业社搞得不好, “入春以来 99% 农户的食物都是红薯干、野菜、树干、菜根……。关庄等区不少村的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要饭去了。” “各村的牲口死亡的情况更加惊人, 普遍是死亡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严重的几乎死光。我村东北角马砦合大社到现在牲口死的只剩 4、5 头了”。还反映地方干部违法乱纪严重: “现在谁要说外边好, 或者说饿得没劲干活, 马上就会给你扣上个‘破坏分子’、‘坏蛋’的帽子, 并把你列入被驱逐村的名单。乡社干部和村干可以随便辱骂群众, 捆绑群众, 甚至自己制定法律, 社办公室墙上挂满了流氓、游民游街的牌子……”。这封信是邱文华 1957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4 日在家乡探亲期间, 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诸多第一手资料写成的。邱文华临走时还把村里农民们吃的食物如野菜、树花、树皮等带给接收他信件的全国人大信访部门的同志。

邱文华所反映的情况经两年多来我查阅有关资料认定, 可以说都是完全属实的, 都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 由于此信全国人大在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后, 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大权威领导机构联名分别给河南省委和南阳地委发来了要求对此信所反映的情况给予答复的信件。南阳地委认为邱文华给他们“捅了大娄子”, 惹了大麻烦, 因而借用 6 月底即开始的“反击右派”的大气候, 于 1957 年 7 月 20 日, 分别给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委、河南省人委和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发去了“对邱宗华(实际应为邱文华)所反映情况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避重就轻, 文过饰非, 在否定主要实质性问题, 即农业社没有搞好, 农民缺吃少穿严重, 逃荒要饭情况在不少地方都有发生的核心问题后, 反诬陷邱文华是“阶级报复”(实际邱文华家里是中农成分, 是当时团结的对象), “片面地听取家庭与个别富裕农民的反映, 既不深入调查, 又缺乏以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可以说在这以前他就对合作化和粮食政策存有成见, 所以对新农村情况那样的认识和结论。”1957 年 9 月 18 日, 南阳地委授意泌阳县委宣传部给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写了封“强烈要求对邱文华进行组织处理的三点建议信”, 对邱进行落井下石。1957 年 9 月开始, 中国农业工会便开始邱文华进行车轮战般的轮番批

斗, 达几个月之久, 给邱文华扣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 年 4 月, 邱文华被撤掉行政职务, 开除党籍, 工资由行政 20 级降为 23 级, 月薪由 75 元降为 40 元, 发配到河北省唐海县柏阁庄农场劳动改造, 直到 1962 年秋“甄别摘帽”。

可见,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 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 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 只是到了 1959 年下半年后, 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 开始到处饿死后, 这样的事越来越多, 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但这从根源上追究, 还不全是南阳地委的责任, 河南省委应负主要的责任。有个老干部回忆录中说: “1959 年下半年时,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曾下过这样的指示: ‘不能让那些有损于河南形象的信件出省’。根据这一指示, 信阳专区第一书记路宪文曾指令信阳邮电局检查扣发了 1、2 万封给中央部门的告状信件。”

(本文作者系南阳日报社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伟)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 凡转载本刊文章, 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 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 肖林 电话: 010-68525374

启 事

2008 年精装合订本 85 元, 简装 80 元
2009 年精装合订本 100 元, 简装 95 元
2009 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 元
免费挂号邮寄, 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 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电话: 1361115938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小区 528 信箱
收款人: 崔秀岭 邮编: 102488

罗隆基和他的法哲学

• 喻 中

在 20 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 30、40 年代,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言论之一,因而颇有回顾与评论的价值。^{注 1}

罗隆基生于 1898 年,江西安福县人。1912 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 年到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25 年,罗隆基离开美国,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师从费边社的代表人物拉斯基。^{注 2}

1928 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回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的主任与教授,1930 年 11 月 4 日下午 1 时,罗隆基正在中国公学的教员休息室里翻阅演讲笔记,几个警察把他抓走了,并把他带到上海市公安局,理由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幸运的是,当天傍晚,他就被释放出来了。积极营救他的,正是校长胡适。

1931 年,罗隆基从上海迁到天津,就任《益世报》的主笔。稍后,又做了南开大学的讲师与《北平晨报》社的社长。由于罗隆基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比较激烈,他主持的《益世报》遭遇过停止发行的处分。

上世纪 50 年代,他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委员。1956 年,出任新成立的森林工业部部长。1957 年,他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受到了批判,从此沉默下来。1965 年 12 月 7 日,他死于北京寓所。直至 1986 年,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罗隆基诞生 90 周年的大会上,^{注 3}才算是给他正式恢复了名誉。

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政论性质的文章中。本文以这些文献作为资料,把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分为人权思想、法治思想、宪政思想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分别予以述论。

人权思想

罗隆基说:“人权,简单说,是一些做人的权。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有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注 4}

这段话,从四个方面讲了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揭示了人权的四个层次。首先,是维持自然生命的物质条件,这是最低层次的人权。譬如工作权,通过工作获得报酬,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一种人权。这样的条件,主要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排除别人侵害的条件,它满足了人对于安全的需要。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再次,是个性与人格发展的条件。它针对的是身与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有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一种人权。最后,是个体向群体作出贡献的条件。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或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人是一种类的存在,人要通过为人类作出贡献的方式,来实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融合。这种条件的实质,是个体在群体中获得承认、获得尊重的权利。这几种条件层层递进,让人联想到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五层次说”。

在阐述自己的人权概念的同时,罗隆基还批评了若干经典作家关于人权的看法。譬如 17 世纪的霍布斯,“认人权是满足一切欲望的东西”。但罗隆基认为,人有许多欲望,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满足,“许多自命的大伟人有专制欲,有多妻

欲,我们就不能根据人权的理论,说这种欲望,应该满足”。再譬如18世纪的卢梭,“认人权是天赋的,说我们要归真返朴,到自然的环境里去自由发展我们的本性。”但罗隆基的观点是,“我始终相信一九二九的上海没有法再变成五百年前的原野。”这就是说,彻底的归真返朴也是不可能的。还有19世纪的边沁主张“人权依赖法律根据。”对此罗隆基也不赞同,他说:“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注5}这种实证意义上的法律,显然也不可能为人权提供根据。

罗隆基认为,人权是要争取的,中国争取人权的运动也一定会成功。至于“争回人权的手段,原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纸笔墨水,可以订定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枪弹鲜血,才能换到法国一七八九年的人权宣言。在不同的环境下,争人权的手段亦随之而不同,这是历史的事实。”^{注6}这两句话,在不经意之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权传统:第一,英国式的,或经验主义的、渐进主义的人权传统;第二,法国式的,或理性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人权传统。他对这两种不同的人权取得方式,是有比较的,也是有自觉的。

人权与法律既有联系,也有显著的区别。他说:“法律与正义公道是两件东西,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通病。从法律上我最多可以知道我现在有些什么权利,找不到我应有什么权利。”他还说:“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这是人权的原则之一。法律的目的在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本身知道他们本身的幸福是什么,才肯为他们本身谋幸福。谋取本身的幸福,这又是人权之一。所以说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权。所以说法律是人权的产物。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我的结论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注7}

这段话表达了罗隆基关于法律与人权的基本观点:法律规定了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绝不限



罗隆基(1896~1965)

于法律的具体规定;法律也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人权——这是就两者的形式关系而言。在实质上,法律与人权还有更深层的联系:“法律为保障人权产生的。法律为人权所产生的。第一项,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项,指法律的来源。”所谓法律的功能,是指“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注8}所谓法律的来源,是指法律产生的源头与缘由,也是为了保障人权;若不是为了人权,就不会出现法律这个事物——这层关系表明,人权是法律的根据,法律为人权而存在。法律应当保障人权,人权应当作为评判法律

的尺度。

罗隆基还进一步认为,“法律,用简便的话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宪法,一为宪法以外的普通法。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法。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统治人民,人民同时统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人民统治政府,非有宪法不可。”他说,“在蹂躏人权方面,所谓个人或私人团体,其为害实小。……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虽然干的是‘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勾当,其影响所及,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这才是对于人权的更大的威胁。更可怕的是,“宪法有时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人权,且为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的蹂躏人权的工具。这又非历史上统无的事,这也是争法治的人所应顾虑之点。”因此,“谈人权者固然要谈宪法,但在宪法上必要附带着宪法的来源的条件”^{注9}——罗隆基所说的这个条件,其实就是卢梭所说的: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如果取消这个条件,宪法与法律就可能异化为某些强势者蹂躏人权的工具。

如果说,法律是为人权服务的,那么,国家与人权的关系又当如何理解?对此,罗隆基一语道

破：“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注 10}

这句话表达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国家的正当性在于保障人权，一个不能保障人权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无效的国家，或不具有正当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上看，国家必须履行保障人权的义务，否则，国家就不能得到个体的承认。第二，国家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以换取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而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就是以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作为前提的。

1930年4月9日，劳动大学的章渊若院长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约法刍议”的文章，认为人权已经过时，应当提倡民权。对此，罗隆基给予了批评，他认为，以民权否认人权是错误的。因为，人权与民权含义不同。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是在政治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政治国家是人类许多组织中的一种，有不是国民的人，没有不是人的国民。因此，人权范围比民权范围更大、更基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偏重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既做国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注 11}换言之，人的义务，要在社会上做人，不只是在国家做民，因此，国家的职权不是万能的。国家承认我们在社会上做人的必须的条件，就是承认人权。^{注 12}

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还论述了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生活诉求，因此，人权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法治思想

罗隆基理解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呢？他从法治的对立面说起：“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它野蛮退化，它的执政者模暴专制到什么地步，它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而且，“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

的权力是不相并立。”^{注 13}这就是说，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百姓守法，也不是法治。按照这样的标准，秦始皇时代，就绝不能称为法治时代。法家学派的主张，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称其为“法治主义”。^{注 14}

以罗隆基的标准来判断，梁启超理解的“法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更具体地说，“法治的重要原则，是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员和普通的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我们不认识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个人，我们只认识法律，我们犯了法，他们只有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可以用法律来制裁我们；政府的官吏犯了法，我们亦可以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用法律制裁官吏。这才是法治。”^{注 15}

虽然法治的真义，就是政府守法。但在罗隆基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反映法治的全貌。他说：“国家有特殊阶级特殊地位的人具备了守法的精神，这固然是走上了法治轨道的初步，然而人民有否法治的实质，又另为问题。……要达到法治的目的，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保障人民权利上一切细则的整理。”譬如，“英国法治出人头的地方，不在原则的树立，而在对各个原则，它有缜密周到的施行的细则。承认人民的权利是一件事，防止人们权利的被侵犯，侵犯后补救的方法，又为一件事。前者是宪法的责任，后者是普通司法制度的责任。英国法治的长处，就在‘防止侵犯’与‘侵犯后补救的方法’这两点。”^{注 16}罗隆基在此强调的，是法治的另一个支点：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宪法提供原则性的规定，还需要普通法提供具体的路径与方法。

罗隆基认为，“世界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法治上的障碍，总在有权力有地位者的专横独裁。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法治演进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到了主权在国会，代替了主权在君主，法治的原则才算真实成立了。主权在国会，就是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就是法律处最高的地位的真义。”^{注 17}

什么是法治？按照罗隆基自己的总结，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是执政者与人民平等守法的地位，他们一举一动，要以法律为准则。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法治要注重‘法定的手续’。”^{注 18} 这就是说，法治的第一要求是执政者守法；法治的第二要求是法律要承认、保障人民权利。前者针对法律的运行，后者针对法律本身的内容。

宪政思想

罗隆基的宪政思想，由“破”与“立”两个方面构成。“破”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立”的一面，体现在他对于宪政的期待和呼吁。我们先看他对于训政约法的批评。

消解“主权在民”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一。罗隆基说：“宪法或约法最重要的功能是规定国家主权之所属及其行使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对这次政府所提出，国民会议所通过的约法，绝对不满意。”因为这部约法的第二条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十条却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第三十一条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在罗隆基看来，有了后面这几条之后，第二条规定的“主权在民”就“成了骗人的空话”，“是绝无意义的虚文”，它表明，“主权在民”原则，被全面消解了。

在罗隆基看来，承认主权在民，“就应该知道并且承认‘主权是不能委托给人的’。”因为它是20世纪欧战后一切新宪法的一致的新趋势。“主权是人民最后的取决权。代议制是民主政治上不得已的便利办法。人民委托某人，在某时期内，办理某事，所付托的是有范围的职权，不是无限制的主权。在‘人民的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上，就在人民的代议机关，都不能行使国民的主权，一

部分人民所组织的团体，更无论了。因为主权失了，政治上主仆的位置就颠倒了。国民失却主权，国民就失掉法律上国民的地位，民主的真义就根本丧失。”在这里，罗隆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这部约法把人民的主权委托给了国民大会，因为它违反了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至于国民大会自己都没有主权，还要把主权再委托给国民党的机构，就更不对了。按照这样的规定，“政府是国民党产生的政府，立法是国民党主持的立法，若然，人民即能选举，何选何举？人民即能罢免，何罢何免？创制者何从创制？复决者何所复决？”换言之，人民享有的几项主权，转瞬之间就已化为乌有。因此，这样的训政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注 19}

消解人民权利：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二。训政约法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规定人民的权利。“照约法的表面说，如今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通信，通电，居住，迁徙的自由，有一切一切的自由。究其实质，言论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出版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集会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结社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一切一切的自由‘依法律都得停止或限制之’。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掩眼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注 20}

训政约法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不仅存在着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遗漏，那就是没有规定政治信仰自由。罗隆基质问道：“如今一班领袖们在宗教上可以离开中国的孔老夫子，去祈祷耶稣基督，小民在政治上何以不可离开孙中山去信仰别的政治思想家？强调儒教徒做礼拜，强调基督徒拜祖先，精神痛苦，固为相等。宗教信仰，政府信仰，易地皆然。”^{注 21} 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分离的时代，政治信仰的自由空间相对较大，因为思想权威还可能引导政治权威；但是，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二为一的时代，政治信仰自由的空间就会急剧缩小，因为政治权威宣告的信仰将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信仰。

除此之外，罗隆基还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理论，批评训政约法只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拒绝规定人民监督财政的权利，因而，在“我们要财政管理权”一文中，罗隆基提出：“我们如

今不埋怨政府的苛捐杂税，只问政府的一切收入，得到了人民同意了没有？不责备政府的虚耗白费，只问政府的一切开支，得到人民的同意了没有？如今政府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故无论账目怎样，法律上根据在哪里？所以关于财政整理一层，我个人的主张，先谈法律，后谈经济。”^{注 22} 在罗隆基看来，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宪政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经济问题。罗隆基为我们揭示了宪政的两个关节点：征税由人民决定；财政支出也由人民决定。

消解分权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三。训政约法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政府组织的不当：没有实质的分权，只有实质的专制。罗隆基说：“根据如今的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掌握一切的治权。名义上虽有所谓五权，实际上只有一权。实际上只有委员会的全权。同时，根据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会已经万能，主席，又为万能委员会中的万能的领袖。如今国民政府的组织照约法的规定，只有两个结果：成一个独夫专制的政府，或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这种办法，绝对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所标榜的五权分立说，将来的结果，只能保存五院的空名，托庇在一个全权的主席或全权的委员会之下。”不仅如此，训政约法没有给立法权应有的地位，“如今南京的立法院，等于一个法制局。”此外，“国民政府委员依法兼任五院院长。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五院院长。结果，法律上的结果，院长自任自免，自免自任了。天下制度之可以令人发笑者，有于是者欤？”^{注 23}

对于这样的训政制度，罗隆基认为，“应该结束了”。他说，结束训政制度，至少有助于实现三大目标：维持政府的信用，统一全国的人心，提高行政效率。^{注 24}

结束训政，目标是要走向宪政。罗隆基以一篇建设性的言论：“期成宪政的我见”，阐述了在抗战条件下实施宪政的基本思想。

首先，宪政可以改变国民心理。“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在人民心理上可以造成重大的影响，



罗隆基与张澜在 1949 年

国人知道国家是全国人的国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党的国家。御侮抗敌的牺牲，是为国家而牺牲，不是为任何一人或任何一党而牺牲。这心理很重要。……宪政并没有什么神秘。宪政只是从法律制度上建筑一种‘团结人心，集中力量’的正常轨道罢了！”^{注 25}

其次，是宪政与民权的关系。宪政承认民权，但宪政高于民权，是“现代式国家”的保障。罗隆基说：“宪政尊重民权，宪政不止于尊重民权而已矣。实行宪政，等于说，政府的组织制度化，公务人员及全体国民的行动法律化。宪法不止规定人民的权利，更规定国家组织上的基本制度以及人民与政府的一切关系。……中国既然要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且须在抗战中奠定这新的现代式国家的基础，那么，今日自然要从事制定宪法，开始实行宪政。”^{注 26} 可见，在罗隆基的视野中，民权仅仅是宪政的一个要素。有民权，但不一定有宪政，如果建立了宪政，那就一定有民权。

再次，宪政的实施，取决于当政者。他说：“谈到中国宪法公布后，国人能否遵循宪法轨道，依序求进。这点，不应追问民众，而应追问国家之少数知识领导分子，不应追问在野者，而应追问当权在位者。国家法律有宪法，有普通法。大体说

来,宪法是人民约束当权在位者的法律;普通法是当权在位者统治人民的法律。世界从有宪政历史以来,小百姓违犯宪法之事实极少。小百姓其地位与权力尚不够违宪之资格。……宪政危机,不在窃钩者,而在窃国者。……故国家能否实施宪政,宪政能否成功,当求诸有权有势者的诚意,不应求诸普通人民之知识。”^{注 27} 罗隆基把当政者的诚意作为宪政的前提条件,虽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找准治疗病症的药方。因为,宪政的核心在于约束当政者的权力;当政者实行宪政的诚意,就是当政者约束自己、主动取消特权的诚意。在通常情况下,当政者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诚意。从实践中看,宪政的实行,尤其是要实现对于权力的约束,根本原因还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抗衡,销蚀了某种势力独尊、独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宪政体制,至于宪法文本,不过是对这种体制的文字记载而已。

结论

罗隆基法哲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人权、法治、宪政,虽然可以从学理的角度分别加以论述,但实际上是联成一体的。三者之中,人权是基础,人权标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条件。为了让人成为超越于动物、区别于动物的人,人类社会创造了人权这个概念。国家与法律的功能,就在于维护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的正当性、法律的正当性的依据。什么叫好法律?就是能够保障人权的法律;什么叫好国家?就是能够保障人权的国家。因此,人权定义了法律,描绘了法律的理想图景,构成了评价法律的标尺。至于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但是,法治的重心在于政府守法,所以,法治是法律对于政府的约束,核心在于政府守法、官吏守法。当然,法治也必然要求维护人民的权利,因为法律本身,就应当蕴含着保障人权的品质。至于宪政,则可以理解为保障人权、实行法治的制度框架。它通过宪法来表达,是“现代式国家”的条件,它的核心要素包括:主权在民,自由为本,分权政体,等等。至于宪政的实施,则主要依赖于当政者的诚意。可见,在罗隆基的眼里,人权、法治、宪政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

注释:

注 1 关于罗隆基的身世,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并不少,很多材料都是出自于与罗隆基有交往的人。譬如,冯克熙:《不堪回首,又应当回首——我所知道的罗隆基》,《同舟共进》2000年第12期;章诒和:《一片青山了此生——罗隆基素描》,《全国新书目》2004年第3期;闵良臣:《胡适说罗隆基》,《同舟共进》2005年第11期;骆驼刺:《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读书》1999年第12期,等等。此外,还有谢泳的长篇传记《罗隆基评传》(载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勾画出罗隆基的简要生平。

注 2 我有一个印象,现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都与拉斯基发生了密切的渊源关系。倘若收集资料,写一本《拉斯基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想必是很有意义的。

注 3 袁建达:“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第三版。

注 4~注 10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期。

注 11 罗隆基:《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新月》第三卷第七期。

注 12 罗隆基:《“人权”释疑》,《新月》第三卷第十期。

注 13 罗隆基:《什么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 14 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注 15~注 18 罗隆基:《什么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 19~注 21、注 23 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第三卷第八期。

注 22 罗隆基:《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新月》第三卷第二期。

注 24 罗隆基:《训政应该结束了》,《独立评论》第一百七十一期。

注 25~注 27 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田纪云副总理二三事

• 邱源



1989年10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深入陵水黎族苗族自治县慰问台风灾民。

题,对今后改革发展很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受到实际工作者的重视。

为供销社改革指路

中国的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组织,中央有全国供销总社,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市、县、乡镇都有供销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供销社的改革起步较早,比较早地提出“改官办为民办”,“摘掉二国营”的帽子。但由于整个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未变,供销社

的改革遇到种种困难。

那是在1984年2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负责经济工作的省、市、自治区政府领导,以及各省、市、区负责粮食、商业、供销社的局长、主任参加。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与几位同志负责会议的报道工作。我们得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要来会上讲话,又听说他正在河南武陟县调查,何时回来,尚不知道。

大体是会议闭幕的前几天,突然听说田纪云刚回到北京,下午来参加会议并讲话。还听说他有一个讲话稿,记者们都放心了。谁想到,刚讲完大好形势,田纪云就离开了讲话稿,讲到他在武陟调查供销社改革的情况。当时记者还没有配备录音机,赶紧记录。田纪云说,当前供销社的改革,关键是要变官办为民办,要真正为农民服务,要不然就萎缩,最终被农民自己的组织替代,丧失独立存在的意义。他提出当前供销社要从五个方面突破。一、在劳动制度上要有新的突破。基层

最近几年,见田纪云同志出了文集,并频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思想十分活跃,毫无衰老的味道,十分欣喜。在读他的文章时,偶尔也回忆起和他的一些接触。

我接触田纪云,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作为新华社财贸记者,经常参加商业、粮食、供销社的全国性会议,了解报道这些方面改革发展的情况。而田纪云同志正是分管这些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因此有过一些接触。

上世纪80年代初,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在探索自己部门、系统改革的路子。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各级干部、特别是一些中央部门的领导干部,思想框框严重。1983年六届人代会上,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53岁,是几位副总理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精力充沛,头脑敏锐,经常到基层第一线调查研究,对经济工作,特别是农村经济工作十分熟悉。在大会上或在基层调研时,常常能提出一些针对当前问

供销社的干部真正由农民选举产生，能上能下，农民有罢免权。供销社的职工要能进能出。二要突破农民入股的限制。农民入股的农户占户数的比重不小，但占供销社资金的比重则很小，供销社经营的好坏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不大。如果农民的资金占供销社资金的比重更大些，农民就非管不可了。三要突破现有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的限制，使得供销社真正做到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办农民想办的事。四、必须解决按劳分配问题，真正体现多劳多得，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五、价格上要让供销社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国家规定的品种范围内，允许供销社按照产品的质量、市场供求情况，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价。

我采访供销社多年，觉得一位副总理能这样了解一个行业一个系统，讲的意见切中要害，很难得。决定单发一条消息。会后送给驻会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审，不想她不同意发，说是点上经验，没有普遍意义。结果新华社当晚没有发出这篇稿件。

当晚，我想来想去不甘心，觉得这五个突破虽然是田纪云在点上调查出来的，但他结合了全国的情况，有针对性，是改革的方向。

思想明确，第二天等田纪云又来会上听讨论。我在走廊上等他，见他走出来，立即迎上去问：田副总理，你昨日讲话中提到的供销社改革要五个突破，我想发新闻，可以吗？田纪云立即回答：可以呀！我一听立即把稿件送回新华社发稿了。

此后改革的实践证明，“五个突破”在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它的精神对国营商业的改革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现在供销社改革的核心依然是建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依然是中心任务。

支持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在采访中听有关同志讲，田纪云经常下去调查研究。有的同志告诉我，田只上过几年抗日中学和一年商业会计学校，他对经济工作的丰富知识，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他爱学习，结合实践，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和经济理论。他在四川担任财政厅厅长时，跑了全省很多县调研。

一次，我向田纪云的秘书说，田副总理再去基层调研时，我是否能跟着去了解情况，我想去看看他怎么调研，在考虑什么问题。秘书表示，一定向田转达。

1985年暮春时节，国务院田办通知我，次日随田去河北农村考察。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中南海集合地点。随同田纪云一起调研的有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及供销社总社政研室的同志，六七个人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出了北京一直向河北保定地区蠡县农村驶去。

车开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蠡县曾发生过有名的“高蠡暴动”，作家梁斌著的《红旗谱》就是写这一地区农民斗争的。蠡县当时有35万人，最著名的是它的腓纶市场。市场分散在4个村。全县有腓纶针织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户万余户，占全县农业人口的12%，占农村劳动力的5%，在专业户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有158个。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河北农村形成好几个很大的专业市场，如涿县的沙发市场，徐水的废钢铁市场，安国的药材市场，定县的轴承市场等。我想田纪云可能是通过蠡县的专业市场，了解农村专业市场的发展和问题。我们随田纪云参观了几个专业市场，到专业户家中参观访问，又找了几个购销专业户座谈，和乡村干部座谈。蠡县的腓纶推销员有4万多人，大都是妇女，她们下广州，进四川，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

田纪云了解到腓纶生产和销售，基本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有的是村干部出面组织的。而当地的供销社却没有理会蓬勃兴起的行业。有的基层供销社还把农民的购销组织看成是对手，加以限制。

田纪云在和乡镇干部座谈时一再提出乡村干部要组织农民成立购销组织，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只有农民解决了产品销售问题，才能进行再生产。他还提出在农村改革中起用能人问题，他说往往用一个能人能带动一方生产和市场。在与专业户座谈时，他强调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他说现在的产品质量档次太低，进不了城市市场。他还对参加座谈的河北省供销社主任说，供销社怎么能对农民开展起来的生产不闻不问？不支持呢？供销社要从产供销各个方面为

农民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农民的信任。供销社只有在为农民服务中才能扩大经营,壮大自己。他还对乡村干部说,部分农民富裕起来,要引导农民正确消费,要扩大再生产,要兴建一些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这些意见在当时都是很有指导性的。

到1986年12月,田纪云又在浙江温州调查时再次强调,乡镇企业一定要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跻身于国内市场。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田纪云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当时农村经济改革中和乡镇企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希望

我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曾被誉为“光辉灿烂的事业”。

大体在1978年间,一时忽然有一股风指向乡镇企业,指责乡镇企业与大工业争原料,抢市场,产品质量低,应该限制发展。有位副总理也在内部讲话中列举乡镇企业的几大危害。一时间不少乡镇企业感到岌岌可危。对这一重要问题,一时没人出来讲话澄清。

不久,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田纪云在外地调查时(他那时好像已调到人大),专门讲乡镇企业的发展,提出了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促进农业发展、调整农业结构,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提到乡镇企业是大工业的补充,应该积极引导它健康发展。我当时已不采访财贸系统,看到他的讲话,觉得他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当时的总书记因政治风波下台了,而当时很多人知道田纪云曾在四川工作过。按一般人的推理,田可能受到影响,不敢大胆发表意见了。没想到田仍然针对这位副总理的错误意见大胆阐述自己的正确意见。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证明田的意见是正确的。

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中国的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是由政府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初,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实

行双轨制。大体的思路是从双轨制逐步过渡到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五六月份。当时猪肉供给从不足到逐步增多。但价格仍由物价局管死。

有一天总编室通知我,国务院田纪云办公室叫我去田办一趟。我立即要车去中南海田办。我原以为是开会,结果不是,我去秘书办公室坐了一会,田纪云来了。他和我谈起市场猪肉、蔬菜供应情况,他问我,现在如果放开猪肉价格,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说,现在是蔬菜的旺季,猪肉供应充足,这时放开价格,不会有什么影响。从广州的经验看,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放开价格是可行的。他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又问了问群众对市场的反映。他还说,以后看到什么问题,可以向他反映,我点头同意。

以后,我在采访中发现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曾向他反映过。如烟台苹果压在火车站运不出,湖北供销社改革发展中的问题,都告诉过他。烟台苹果运不出问题,很快给解决了。湖北供销社的情况,他曾有过批示。

利改税的积极倡导者

我国的国营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向国家缴利润,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造成企业缺乏活力。利改税后,企业自负盈亏,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1981年,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利改税分两步走的具体建议。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利改税的重大作用。国务院领导采纳他的意见。1982年11月五届人大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肯定了把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金这个方向,并提出分两步走的方案,从1982年6月起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

利改税后,我国税制逐渐健全。现在,已成为调节生产、分配,调节产业结构的重要杠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税收成为政府的重要支撑。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老记者尤淇

• 刘谓福

去年，是曾任我们安徽分社社长的尤淇老90大寿。他是我们这些后生的新华社记者的老前辈，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当时我就想写点什么奉上。但忆起他为国为民而遭遇坎坷、刚正豪壮而宁折不屈、功绩卓著而平易近人的70多年征程，真是林林总总、涌满脑海，大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之感。所以，一直拖到今天。

我思索再三，也只能略记尤老几件事情，稍展其思想道德风范，聊为一篇迟到的寿文吧。

认准真理不动摇

1980年初的一天晚上，尤淇同志在办公楼前院子里看到我。他趋前对我说：“给你说一件事：今天上午，省委主要领导人把我叫去，对我和分社报道、支持大包干的事，狠狠批了一通。”此事的背景是：1978年秋后，安徽农村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旱，小麦等迟迟种不上。凤阳等县的许多农民为生产自救，自发地、悄悄地搞起了大包干。从中央来任省委书记不久的万里，支持了农民的这一大胆创举。结果是，翌年这些地方都赢得了粮食大丰收。尤淇和分社农村组记者，及时地对此作了内参、公开报道。在1980年初万里同志上调中央，接替他的新省委书记当面讲“要像自己家乡俗语‘前面乌龟爬出路，后面乌龟跟着爬’那样做”。但是，这位领导人很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声色俱厉地教训尤淇：你也是“老延安”，是多次聆听毛主席教诲的人。老人家教导我们，农村要走集体化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搞分田大包干，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搞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十年，怎么也不应该退回到小农经济的老路上去；现在省里凡是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我已命令他们必须全部退回到集体经济的轨道上来。你作为

分社社长，在报道上要把握这个大方向。最后，尤淇说：“这位领导人不让我传达他的话，只让我照此口径把好报道关。因为你是分社党组成员，所以给你打个招呼，以心中有数。我们党组过去都是支持大包干的，今后要一如既往，坚持下去。因为大包干已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是真理。于国于民有利的新生事物，为什么要否定！老路错了的，就要纠正，不然怎么改革？！我不怕什么。此事暂不向记者传达，但我们领导要带头搞好大包干报道！”在夜色中，我看着他渐去渐远的魁梧身影，似乎愈加显得高大伟岸。

接下来的是，尤淇在安排记者深入农村、工厂调查、报道的同时，自己也带领青年记者沈祖润去长江南岸的芜湖县农村采访。他们了解到，1979年秋天发生过一场全县性的罢耕事件，为的是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县委向地委报告后未获批准。农民的态度很强硬，向县委书记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保官保面子，不知道我们饿肚子。我们已经饿了20多年了。我们现在要包产是铁了心了，无论如何非包不可！你们如不同意，我们就不收割稻子，也不耕地秋种！”他们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农民过去挨饿是真实的，当前搞大包干的强烈要求是不可遏制的。于是，他们连夜写了一篇调查稿，题为《“火山”在芜湖爆发》。稿子发总社的同时，也送了一份给在芜湖市开会的那位省委领导。

过了两个月，我去与芜湖县毗邻的宣州市采访。我一位朋友、安徽日报社宣城地区记者站站长王启明，给我看了他笔记本里记录的在芜湖市会议上省委那位领导批评尤淇等的讲话。他嬉笑怒骂地批评说：有的记者好糊涂！支持、报道大包干。还说农民搞大包干的强烈要求犹如火山爆发，说什么“火山在芜湖爆发”！你们（指参加会议的县、地委书记）看到火山爆发了吗？火山爆发意味着什么？那样我们还能在这里开会吗？在座的

诸公都将化为灰烬！你们不能与他们（指记者）一样，他们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吱扭”就能转一圈儿（他举起右手比划着）！你们不行，你们领导着几十万、几百万人民呢，责任重大啊！如果转不好，不仅自己犯方向、路线错误，农民群众中还会出人命的！等等。我回分社后，把上述讲话告诉了尤淇。他说：“我早听说了，不过没有这样详细。不去管他怎么说，我们只管去实事求是地搞好报道。”他话音不高，听似寻常，想来却掷地有声。



尤淇同志近照

为民请命不避险

2004年11月，尤淇同志从南京来安徽旧地重游，并带来他新出版的作品集《“火山”在芜湖爆发》。当我翻看这本厚书“目录”时，突然一行字——致邓小平同志信《快给农民松绑》——吸引了我。马上阅看正文后，使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他于1979年6月5日在安徽时写的。这信的一开头就大声疾呼：“现在是1979年，是人民公社化后的第21年，中国农民一直被粗大的绳索紧勒着脖子，奄奄一息，难以度日，他们正等待着你的解放。”接着，他在信中说：去年安徽大旱，今年夏季小麦获得大丰收，但是，农民在卖余粮时遇到了问题——粮站收购时只给记账，不给现钱，叫“非现金结算”，说钱要等到年底“一次性结算”。农民坚决反对这样做，坚持不给现金就不卖粮。他们说：你国家这样“非现金结算”，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再种地？怎么买种子、化肥、农具？你们干部的工资能等到年底“一次性结算”吗？信的结尾恳切地说：这是我在滁县等地采访中遇到的确实实的问题，请你赶快采取措施，松开农民的捆绑吧！

这时，使我忽然想起尤淇曲折、感人的经历。他1937年上海沦陷后，即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从家乡无锡流亡到武汉，参加抗战宣传工作；翌年8月，奔赴延安“鲁艺”；1946年奉命去

东北工作；1949年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随部队入关，经武汉到两广、海南岛。1954年后，历任粤、浙、皖、苏4分社社长，1985年离休。其间，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他也多次被运动，被迫害，吃了许多苦头。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为保一位敢讲真话的青年记者“过关”，自己差一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因他曾写过几篇内参稿反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被诬为“浙江的小彭德怀”，被批判了3个多月，于次

年春被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因被折磨得患上肝炎，同时肺病复发，经医治一段后回无锡西漳乡老家休养。本来是“戴罪”之身、重病之躯，加之“经济困难时期”的营养不良，很快便身心衰弱，疲于挣扎；但是，当他发现家乡广大农民由于浮夸风、共产风以及集体食堂的弊端等，被搞得缺衣、挨饿，“人人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许多人出现浮肿，只能等死”，“不少老年人已因饥饿而死”，就心如刀绞，忍无可忍，于1960、1961年两次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反映农村真实情况。“文革”一起，把他上面三条列为“罪状”一并算，又被打倒，被定为“最最猖狂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进行了无数次批判，致使两手落下残疾；后来，上级又把他开除党籍，行政级降4级，发配到一个工厂劳改。直到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他的冤案才得到平反。

于是，我抬头笑着问尤淇：“你过去给毛泽东写信挨了整，来安徽不久又给邓小平写信了，你胆子真够大啊！”他眯着眼笑答：“没办法，本性难移啦。”是的，他数十年的阅历，已将其思想升华到视人民、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名利、生死是不足道的。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记者之道，就是要不断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实报道，无所畏惧。”这使我想起来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举重若轻乐拼搏

还有一件我难以忘怀的事,从这里很能看出尤淇同志的性格和胸怀。

此事发生在1981年5月15日。在这之前的两年间,尤淇一连写了10多篇稿子,报道小岗村及其所在的风阳县实行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出现的新情况。其中一篇《风阳县推行生产责任制两年翻身》,刊登在198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次年初,此稿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发奖金200元。尤淇非常高兴。其原因不是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而是此奖彰显了小岗村、风阳县的大包干,被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奖”评委会所肯定和褒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广泛、深刻的社会效应,这也是对他两年多来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为大包干鼓与呼的嘉奖,使他看到了中国“三农”的希望。所以,他决定拿出此稿奖金的一部分请客。

这天上午11点多,我骑自行车刚回到分社,传达室老宋就喊我:“你快去省政府招待所食堂,老尤找你!”我去后,只见尤淇笑眯眯地说:“今天我请客,也请你参加。刚才你去哪里啦?”“我到安医附院啦,”我擦着汗说,“今天老贺(时任分社副社长的贺昌华患肺癌)手术,估计手术需从10时到15时才能结束。我不知道你今天请客,其实如果安排到明天就好了。”他脸色一沉,说:“咳!你这个年轻人,太谨小慎微啦!”我自感失言,正要作点自我批评,他马上打破尴尬:“放心吧!老贺手术的事我已安排好,由安徽省第一把刀手术;还有老傅(分社办公室主任傅振欣)在那里盯着呢。”我一边连声说“好”,一边心里想,这就是尤淇的性格——举重若轻,心直口快,再大的事,办完一段落就乐观地安排其他事了。这时,他又转嗔为乐:“这不是一般的酒宴,这是庆贺大包干的胜利!让我们为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干杯!”

1980年前后,曾多次来安徽分社指导工作的杜导正同志(时任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有一次这样说:“在全国农村改革中,安徽起了带头羊的作用,其中安徽分社的报道是功不可没的。”这话无疑是对的,可安徽分社的记者还会

加上一句:在分社的这份功劳中,作为分社一把手的尤淇是功居其首的。

特别可贵的是,尤淇当时是在中央文件和有些高层领导人明确讲“不准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奋力拼搏的。除了前述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严厉批评(1981年底尤淇将调离安徽时,此领导人才向他作了道歉。这是后话),还有不少事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是许多年后才陆续听说的。比如,关于上书邓小平的事,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负责人知道(尤淇发信后送了一份给省委书记)之后,认为尤淇向中央披露了安徽的问题,“省领导岂不都成了官僚主义!”于是非常恼火,大会小会批评了多次;省委常委、秘书长“建议”尤淇写份检查“了结”此事。尤淇采取软顶硬拖的办法,坚持了半年多,直到中央文件取消“年终一次性结算”的购粮老办法,改为“随购粮付现金”的新措施,那种错批才悄然寿终正寝,但那位高官连个“句号”也懒得划。再一件事,是1981年7月尤淇采写的一篇内参稿《陈庭元说“大包干”应是我国农业的主流方向》(陈是凤阳县委书记)所引起的。当时的中宣部主要领导人看到此稿后,怒火中烧,从病床上爬起来(据他自述),立即召集在京所有新闻单位数百名负责人开会(适逢在总社开会的尤淇也参加了此会)。他大批“大包干”“包产到户”,维护“集体经济之路”,还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地要求与会不同观点者跟他展开“什么是我国农业管理方面的主流方向”的辩论。当时,虽没点陈庭元和记者的名,但尤淇心里清楚,这是因何引起,并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围绕原则认识问题的论争。因而,面对那种场合和氛围,他和所有与会者只能以沉默表示抗争。

重压之下,我从来没有看到尤淇意志消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牢骚满腹。他的态度是:“不予置理,不开口,不辩论,让他批评者一个人去自我独白,自我欣赏,自我胜利”,而他自己呢,则去扎扎实实地搞好报道,快快乐乐地面对生活。

1978年夏天尤淇从广东来安徽时,已年届花甲,但下乡采访的热情比年轻人还高。他特别爱跑农村,而且跑的大多是穷地方,一直深入到乡村、农户。3年后,他还克服手有残疾(当年在“牛棚”中致两手食指被烧伤坏死而切除)带来的不便,带领年轻记者王礼赋、徐光春骑自行车去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 吴江

2010年1月2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作者所指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体安全”。作者明确指出:“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者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们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并且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

没有其它任何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接下去,作者又指出:“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这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改革从易到难,改革的难度在增大。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最严峻的政治挑战。”

我认为,这是一篇从“有利于中共长期执政”

凤阳、肥东等县农村调查、采访,发了大量反映大包干带来大变化的文字稿和新闻图片。

当时在我分社,数尤淇官位最高、资历最深、年纪最大,但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大家都习惯地喊他老尤、尤淇、尤淇同志,我印象中从没有听到过有人喊他“尤社长”的。工作之余,他喜欢下象棋。他有时同记者、司机下棋,更多的是在传达室同临时工老宋对弈,每当此时,他便悠然自得、乐在其中了。

如今尤老已入耄耋,尚很健康,白发虽生,赤心犹存。你看,前几年他所作的人生回顾,也别开生面:古有《胡笳十八拍》,我搞新闻40年的作品,但愿能称为“胡笳一拍”;尽管有些人不爱听,以为太粗犷刺耳,却自有它悲壮、激越、清新的一面,可使中国新闻界这个交响乐团的交响乐更全面,更饱满,更坚实有力,使人心情振奋,精神昂扬,我就不胜欣慰了;所以,我以能吹胡笳而自喜。谈到今后的志趣时,尤老幽默地说:“我以胡笳手自居,愿我的悲壮、激越、清新的胡笳之音,在余年仍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鸣奏不已。”

往事历历,高山景行。谨向尤老奉一寿联:
“铁骨铮铮钦此老,东风习习寿期颐。”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不朽的“三宽”^{注1}

——痛悼朱厚泽

• 吴象

渊博谦逊朱夫子

“三宽”浩气耀神州

音容笑貌依然在

思想光辉永不朽^{注2}

注1:“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乃朱厚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倡导之理念。他任职仅一年半,而“三宽”至今流传不绝,影响越来越大。盖“三宽”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需求。朱厚泽与“三宽”浑然一体,已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心声。

注2:1987年一次研讨会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对我说:“朱厚泽是位短命而长存的中宣部部长。”我深然之,认为这位现代最受钦敬的夫子,倡导的“三宽”将永垂不朽!

愿望出发期望中国改革继续前进的高论。作者认为,“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突然爆发出来。”

要感谢这位外国朋友对于中国改革的关切。谈到执政党的政治安全,就目前来说,我以为主要依靠两条:一是切实增强党内民主,一是改进多党合作制度,就是要依靠民主党派的协助和监督。这里只谈执政党本身的改革问题,即增强党内民主问题。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执政党是一个有七八千万党员的大党,党要管理好国家,必先管理好自己。治党治国都不易,内忧外患不断。

我个人在党内生活已经七十多年了,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十分关注党的政治安全问题,尤其关注作为改革主体的党自身的改革问题,首先是民主化问题。

现在谈论党的民主化建设问题的文章已经很不少了,党自身在这方面确实也作了不少改进,如在党委集体领导制、实行领导人的退休制、反腐、扩大公民的有序参政和党内对重大政治决策的民主参与等等方面。但是,改革的速度还滞后,一些较重大的议题尚未提上日程。党内民主包括方方面面,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也算是一个倡议吧,这就是关于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建立并加强党自身的监督机制和监督力度。党愈强大,党自身和监督力量也必须大大增强,以避免党的自我削弱和自我涣散。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保证党章、党法的实施、端正党的作风,以及建立党的检察工作方面,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列宁在其晚年曾主张建立权力很大的中央检察委员会以制约党的权力运用,后因过早逝世而未曾实现。我们党在这方面也已有严重的教训,有许多值得自省的地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风有所好转,但问题仍层出不穷,许多违法乱纪事件和不正之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贪腐丛生,新的冤案继续发生。我手头保存着一份材料,早在1982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一位纪检工作同志的来信,其中谈到:“为什么不能彻底查处,因为搞不正之风的人有保护伞、关系网。这类人事关系,为查处设下了重

重障碍”,“某些调查者和办案人员,往往只向领导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生活中的许多事使他们懂得,只有‘听话’、‘照办’,才能明哲保身。他们并不是听一切领导者的话,而是只听那些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领导者的话。”“这类前车之鉴,使一些本来还有一点正义感的人在接触这类问题时,也往往要做出某种违心的选择。”这里说的还是上世纪的事,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严重化了。这直接关系到纪检工作的名实成败问题。过去党内生活不正常的遗留积习很深。要消除这种遗留积习,需要花大气力。从增强党内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原则出发,目前,制订党的纪检工作的专门法规,将纪检工作的原则、准则、制度、职权范围、办案程序等具体化、规范化,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第一,依现行党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称中央监察委员会,我认为,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称呼为好)由党代表大会产生,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地方则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确定这两者的关系。主要是要确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并非上下级关系。两者同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也同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中央委员会自然要对党的工作和政策决定负总责,在此原则下,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央纪委的工作负有宏观指导之责,但中央纪委在党代表大会授权范围内有责任独立行使职权,使之对全党包括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的工作实行监察,特别对各成员(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的不正之风特别是腐败等实行监察,有权立案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两者若发生分歧,则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讨论解决(这也需要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或上报上级纪委审理。在此种格局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重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代表大会承担的责任:

1、鉴于纪检工作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主持公道,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不附宗派,不徇私情,敢于斗争,敢于冲击各种“关系网”和黑箱操作,而不能是非不分,见风使舵,摇摆不定,只对领导负责而不知对党和人民负责,尤其不能

怀有宗派情绪和打击报复心理。为了保证党的纪检机构的用人符合党的原则和纪检工作的要求,各级纪检机构特别要严格实行选举制。由代表大会宣布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条件,自下而上推举候选人(应特别注意挑选纪检、监察、司法、公安系统中具备上述条件并有实绩的优秀执法人员进入党的纪检领导机构)经过充分的、自由的、反复的酝酿讨论,然后以不等额选举方式产生之;代表大会产生的委员会同样以民主选举办法产生自己的领导机关。

2、明确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由代表大会进行审议,进行质询(特别对重要案件),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3、重要的纪检工作的专门法规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通过后赋予纪检部门依法自主进行工作的权力。

第二,执政党不能包庇自己队伍中的违法乱纪者,特别是贪污腐败分子、挟权谋私和官商勾结有劣迹者,搞浮夸谎报成绩以取官者,严重的官僚主义者等。凡是试图对国家执法机关和人员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特别是自己亲属的罪责的人,必须从严查处。凡属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违犯国法者,一律按国家法律并依司法程序处理,党不能包揽官司(密切配合是必要的,目前的“双规”办法应只适用于党员),更不许搞“治外法权”。

中央纪委应着重查处中央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的大案、要案。省纪委要着重查处省(包括省委成员)、地、县级的大案、要案。各级纪委都不能只查下不查上。

第三,无论党或领导者个人,绝不允许拥有特权。特权与非特权(执政党和领导人应当拥有的正当权利)的界限应当分清。特权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最致命的东西,同时使党敞开腐败之门。所以建议,党应就何者为特权的问题进行全党讨论并提出处理规定。

第四,执政党的最大敌人是自身内部的贪污腐败。防止和反对贪腐是纪检工作的重中之重。纪检的专门法规应有专章规定党员的廉政纪律和道德要求。此外,应把“决不搞贪腐”作为党员入党誓言之一(旧的入党誓言应加修改)。

第五,所有共产党员在党章党法面前一律平

等。坚决保护党员的合法权利,并严格监督履行党员的义务。明确地规定处理党员违法事件的法律程序和原则:

1、为了教育全党,在党内处理党员时,必须将被处理者的主要问题和错误事实经过认真查实后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机关和支部大会陈述,被处理者也有权在支部大会及其他场合听取陈述并提出意见,组织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将有关材料向本人进行核实,作出处理决定后将决定通知本人,本人有权提出意见,并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机构提出申诉,允许有人在公开场合为被处理者进行辩护,包括澄清事实在内,把这作为党员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重大案件要在党内公开审理并采取旁听制,以确保处理之公正并扩大执法影响。凡处理党员不遵守法定程序者,应视为处理无效,被处理者有权提出申诉。

2、作出根绝整人恶习的必要规定。反对任何领导人个人对党员的问题作处理决定,反对“个人说了算”(类似于“私设公堂”)。反对“专案遗风”。党内处理,必须依党章党法进行。禁止搞突然袭击,搞秘密侦察,甚至任意剥夺同志的工作权和发言权、侵犯人身自由等行为,禁止搞“大批判”或背着本人搞“揭发批判”等等。

过去我们党要求被整者要受得起冤屈,为党的大局着想,这是对的,但这不等于可以不严肃处理无理的整人行为。特别是在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必须严防党内有人(特别是领导人)滥用权势整人。冤假错案必须及时查清、平反,不管错误是谁犯的。党的纪检法规特别要保证严肃、认真、公平地对待党员的申诉权利。尤其对于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行为,要明确立下惩处的办法,不得纵容。

3、切实保障党员在宪法党章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不允许压制党员在宪法党章范围内公开点名批评任何领导人(不管是在世的或已不在世的)的自由权利。凡若不违法而仅属错误言论,一律按内部是非问题、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处理。

以上是就增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出我个人的若干意见。这些意见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现在特写出以供商讨。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教务长,著名哲学家)

(责任编辑 杨继伟)

也谈“中国式思维”

• 苏仲湘 遗稿

在《炎黄春秋》上读到李普同志和他所引的余杰同志的文章,他们提出中国问题,我感到这确是一个值得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词约而义丰,它牵涉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想法和做法,包括一大堆社会陋习在内。清理一下一些大可置疑的思维导向,自是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中的应有之义。

所谓中国式思维,应当是指那些我们民族独有的或十分突出的心理模式和习惯观点。它其实是个中性名词,包括具有正面意义的、具有负面意义的和没有正负面意义的思维在内。

先从具有正面意义的方面说起吧,千百年来,我们民族具有的良风美俗,极其丰富,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习说的勤劳勇敢,自然是一个首选项。不过它其实是一个具有极大普遍性的品德。凡是能够自立于世界,绵延千百年的民族,是不能不具备这一品德的。那么,什么是我们民族十分突出的具有正面意义的思想意识和品德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容易,而且应当不止一个。我试答一下,也许可以把国家忧患意识作为一个答案。

谈到国家忧患意识,先秦儒墨,就有论列。孟子说:“……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以为,这种忧患意识之强烈郁积并递相绵亘,大概是起于五代两宋年代。宋代人受辽金欺凌,结成内心一个老疮疤。元代汉人就简直被全盘征服下来了。明人稍稍缓过气来,到了晚明又处于忧患之中。时间到了晚清,更遭逢亘古未有的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态势。这种愈演愈烈忧患家国意识,乃是我们民族心理中的一个千年大痛,是刺激全民族奋发自强的一剂重药。回想七十年前,我们中多少走入革命队伍的人,不就是首先在“打日本,救中国”的朴素信念下踏上征途的吗?忧患家国意识无疑是中国式思维中的一个亮点,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下去。

忧患家国意识属于爱国主义范畴,其他民族自然也都具有,但是这样浓厚的千年大痛,千年情结却未

必普遍具有。许多民族国家也许建国还不到千年呢!犹太民族的千百处哭墙情结应当是可以比美的少数佳例之一。波兰民族的复国抗争,法国女杰贞德的舍生取义,同样都是可敬爱的范例。不过,局势发展到今天,“欧洲人”、“大西洋人”的思潮不断冲刷着西欧人的心灵,忧患家国意识在不少西方人心目中是更浓了还是更淡了呢?我们还可等着看。

中国式思维中与域外文化见仁见智、各秉千秋的观念无疑很多,例子不难举,就以人们习惯上对“龙”的尊奉心态来说吧,神化呵护,其来已久,是我们民族较为特殊具有的心理沉淀物。远古《易经》典籍就建立了“飞龙在天”等壮观形象。在人们普通心目中,龙具有神圣性,能夭矫变化,不可方物,可以代表阳刚的美,可以作为国家领导者的象征,大家以作为它的子孙而自豪,如是等等。但是在西方人心目中,龙大体上是一个吃人翻船的海怪形象,辞义可引申为暴徒、魔王。我不知道我们的“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等词汇,能怎样恰当地翻译过去,让西方人心中唤起类似的美妙印象?西方人如果想到一个满天飞的怪物,神经不一定好受。在他们看来,龙之为物,“怪力乱”有之,“神”则未必。

如李、余文章所指出,我们需要大力梳理和剖析的是那些具有负面意义的中国式思维,它们大都联结着日久月深、浑然不罕的社会陋习。其实这个工作,不少先进的中国人都已作过。孙中山的“一盘散沙”著名比喻,今天还震动着人们的耳鼓。梁启超、鲁迅、胡适、柏杨,都提出过很多深见说论,鲁迅的分析和批判,无疑是最深刻的。我们应当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和深化前贤的遗业。

只谈私德,不着力建立公德范畴,普通公德意识淡淡,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古代圣人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德课,然后就跳起来,着手治国平天下,缺少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今天人们呼唤好父亲、好丈夫、好妻子,很少听见关于好公民的呼唤。不是有集

体主义思想的道德戒律吗？这是极良好极要紧的指导思想，但是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的涵蕴，就不免苍白。社会自觉性、公民品德，这应当成为现在的一条道德金律，没有这种自觉和习俗，于是，“屋内清爽爽，屋外污糟糟”的现象就丛生起来，喧哗、争抢、不拘小节等现象，就常常成为在国外（当然也在国内）的中国人的引人嗟叹的风景。

一盘散沙，或者说，一袋土豆，就陡然成为国人的一个形象代表，成为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及其他不少民族对比下感到汗颜的情景。

产生和扶植这种陋习的有其土壤，这就是几千年稳固存在的、自给自足而孤立分散、在地主家长统治下的小农经济及以此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宗法制度。

而上头的政教化则进而加强和引导这种自了汉式的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定式。人们不难记起，不到五十年前，要建设普遍的工农商学兵五行兼备、自我满足的农村经济框架，使其变成通向天堂的桥梁的大手笔，曾在神州大地纵情挥洒过。这种纵贯千百年的思想脉络是多么的又粗又长啊！

我们今天都认识到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它是一个彼此负责、联系密切、互助合作、充满主动性和尊重感的公民社会。记得过去有过教言：为了加紧争取实现世界革命成功的目标，哪怕有一场原子战争，把世界打平了，损失一半人口，也是值得的。记载教言的书今天已翻到了又一页。不过就其把革命美景和空前惨重的生灵丧失作为并列选择项，至少也可以说，公德意识在这里流掉了。

自我陶醉，风流自费，无视他人的感受，这是自大。自大总和自卑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先不去谈它。个人会自大，民族也会自大，民族自大性也是很多民族都有的，而在我们这里，受千百年来“天朝心理”的浸润，关起门做皇帝的想法常常表现出来，这也是中国式思维中的一个大头。

“东风压倒西风”，这是我们喜爱的一句名言。把它移来观测国际局势，我们格外觉得精当无比，就把它提升为分析世运的指针了。想当年，我们曾经不断在宣言、社论、文章中写，在国际会议中、国际友好前说，真是言之谆谆呵。现在时移世逝，现实在变，这一论断如果从功去身退的意义来说，不会影响它应有的妙义。不过如果回头再温习一下这句名言，尽管古诗有云：“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小加置喙也还是可以的吧。考虑到它不只是教导中国人民，而且是向世

界上争取革命的济济群众指路的卓论。国外的领悟如何呢？中国有一部《红楼梦》，书中有一位绝世才女林黛玉，她的关于西风东风的议论，中国人一听就很亲切，真正是锦心绣口，新警无比。但这个比喻在国外人头脑中却是一个僻典，千万人中恐怕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位才女，更无从联系到她的美好形象进而领悟其微言大义了。他们会以为这句绝妙好词无非是借自气象局的一条公示罢！不仅如此，这句话还涉及具体的自然环境。在东亚，东风来自海上，代表着湿润、温暖和生机，西风呢，是内陆的风，会带来枯槁和衰败。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一听，语意美妙双关，既在当时的政治地图上，表明居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又在自然界中，象征着生机凌越衰败。然而在西欧北美人心目中，风向的意义倒过来了，在那里，来自海上的湿润的风是西风，而东风却来自内陆。诗人雪莱的名诗《西风颂》就表达了他对西风的赞美。在西方人的心灵感悟中，东风压倒西风这句名言已经没有双关意义，留下的是政治地图上的意义。在上世界中叶的炽热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辩论中，有一家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党报因而发话说，气象说上的论述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以此语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施教时，看来，言者顾盼大乐，而听者一头雾水。

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有时与国外来访政要畅论中国历史，郑重论述秦始皇，阐述中国历来有两派，一派赞成秦始皇，一派否定秦始皇，而自己是赞成秦始皇的等等。这当然是高瞻远瞩，醒人耳目的言语，涵义也很丰富。可惜深知并有兴趣探讨中国历史的外国政要究竟是不多的。事实上，一般政界人士也总是熟谙本国历史而不对外国历史去操心的。不难想象，如果一个中国政界人士访问英国，英国领导人向他着力述说英国历史上有一次重要的玫瑰战争，一派以白玫瑰为象征，一派以红玫瑰为象征，而自己是赞成并愿继承白玫瑰一派的，如是等等。中国听众大概就会点头称是，出门淡忘了。这种关门自喜，漠视外情的情况，有深有浅，或浓或淡，也常和自卑情绪互相掩映，但确是消极意义上的中国式思维之一端。

成为陋习的中国式思维大都有长远的历史根源。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上头或明或暗的设立或禁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可忧陋习，或大大扩展了一些旧的可忧陋习。这种情况，很可虑，宜有大力整顿和纠正的决断。

王安石在《商鞅》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

言为重百金轻。”《吕氏春秋》也有一段话说也有一段话：“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

如果把上面诗中所说的“驱民”之道反过来作，并树立为煌煌大政，结果如何呢？

如果还加上一系列辅助措施，比如说，以“引蛇”、“上纲”、“峻罚”、“株连”，作为驱动大车的四轮，其结果又如何呢？

事实表明，这就会为中国式思维的陋习部分加上很多新内容，或者扩展很多老内容。它们很大、很深、

很广。如果看做是直勾拳，这一拳是很重的，可以致命的。

这些陋习，不难例举，比如说：很难混除的信任危机、随风转舵的百变投机、时时窥测的机会主义、落井下石的沉重出手、见死不救的冰雹冷漠……

由此可见，中国式思维的梳理内容是很丰富的，同时又是亟宜着手进行的了。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38.00	6.00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2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吴江文稿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李昌传	周士元	68.00	8.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 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 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三十年河东 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方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烙印》——“可以教育好子女”的集体记忆 1949 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他们带着屈辱和创伤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被施以暴力或遭受凌辱，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使他们因家庭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历尽坎坷……

本书分别记述了他们不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在接连遭遇了 1927 年和 1934 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以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2006 年 3 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作者阅读了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对于人们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必要的；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是必要的。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暮年的反思

• 徐 孔

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中国食品报》总编辑、本刊创办人之一徐孔同志于2010年5月22日逝世,享年83岁,发表他的遗作一篇,以资纪念。

人在走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常常会回忆往昔岁月的事情。

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我的遭遇却很不普通。从1958年4月被定性为“极端右派分子”,沦为“黑五类”,长达20年有余,直到1978年11月才得到改正。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出现如此大的波折,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不能不经常思索的问题。

我出身在农村一个普通的家庭,中农成分,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是清白的。父母望子成龙,节衣缩食供我读书。上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和我关系较好。我受他们和进步书籍的影响,投奔革命,到解放区以后,继续读书。在华北联大毕业以后,作为研究生又留校一年。1948年调华北野战部队作随军记者,在国内和朝鲜战场上,经常随战斗部队深入火线采访,无畏勤奋,发的报道较多,曾获得朝鲜内阁的解放奖章。我和其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有理想,有追求,读大学和做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文学专业,我希望通过自己对生活素材的积累,能写出一些像样的作品。但我对权力和名利一向淡泊。1950年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兵团部队



徐孔(1927~2010)

进驻天津,兵团宣传部长沈图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干部大多文化较低,以后部队要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亟须充实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政工干部。他说,他和他的原工作单位67军组织部钟部长商量过,我做了几年随军记者,对部队情况较为熟悉。如果我愿意,可以先到67军一个营担任一个时期的教导员,熟悉一下实际工作,然后到团里做政治工作,这样,发展会很快。我知道沈部长的好意,想提拔我。但我向沈部长表示,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我这个人的弱点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我

希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由于我不追逐权力和名利,对上,我执行领导分配的任务是坚定的,但从不看上级的脸色,逢迎阿谀。我对上对下或同级之间都保持正常的关系。我认为,作为一名年轻的普通新闻工作者,我一向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的职守,但1958年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不但开除党籍军籍,而且被开除公职,为什么我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

摘掉帽子以后回家探亲,路过北京的时候,见到两个分别2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对我的遭遇都很同情,但都没有感到意外。他们说,你这个人吃亏就吃在性子过直,爱管“闲事”。在一定政治气候下,讲真话是要倒大霉的。细想想,老朋友

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倒真说到了点子上。

回忆过去 20 年的艰难，从劳教农场到劳改盐场到被遣送回原籍农村，以至四年多的托钵上访，其间所经历的困苦和屈辱，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特别是家庭和子女，受到我的株连，二十多年啊，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都受到沉重的压力和痛苦，每想到这些，心里非常沉重。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过去的所为感到后悔。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因为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的行为，常常受客观的形势、特别是政治形势所左右。

在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但可以掌握自己行为的准则和对运动所持的态度。每个人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所处的政治地位特殊，他们的选择更为艰难。“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必须，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规规矩矩地遵命行事，独立思维的空间很小，即使有独立的思维也不能表达出来，否则就要大难临头，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多数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有的人脊梁骨被压弯了，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除了少数“文痞”、“恶棍”和别有用心投机分子以外，对多数文化人包括一些名人方家的软弱表现不应苛求，他们无力改变大环境，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国家的悲剧。说到底，人类历史的发展，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源于知识的创新。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民族和国家是注定要落后的。

但在那种不正常的年代，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铁骨铮铮。有的在最高层的巨大压力下，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中，匹马单枪向不以理服人、以势压人的粗暴行为进行战斗，有的为了坚持真理，维护人格的尊严，以死抗争。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但

他们高尚的品格，得到人们由衷的崇敬，历史也终于给他们作出公正的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求知若渴。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迫切需要学有专长的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对于知识分子，应该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时期，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能忘记历史的沉痛教训。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有考验。何况，历史的进程是不能一刀两断的，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丰富，都要完备，它的历史积淀也特别厚重。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斗争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很多人并不清楚，简单地把一切坏东西都纳入资产阶级思想，却忽视了反封建这个繁重的任务。

回顾我这一生，经历过顺境，也遭遇过多次挫折，曾经是人民功臣、最可爱的人，也曾被打入黑五类，经历了 20 年的艰难生涯。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正正派派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对人对事，都要无愧于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名符其实的“小人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主要是由亿万“小人物”书写的。只要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坚持做人的良知，为人做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国家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履行公民职责、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容易，甚至会遭到打击，以至残酷的打击。但这样做的人，他们心里是坦荡的，在众人面前他的腰是挺直的。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心态也会是平静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不会有负罪感，他的家人和子女也不会为他而蒙羞。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

• 张素华

近日阅读《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郭道晖先生《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其中

讲到陈友群同志在中直机关第二组的发言中说：“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郭道晖先生还特别注明，他所引用的这段发言出自当时中直机关第二组第15期简报。

过去笔者也多次见到这样的说法，说1950年毛泽东在审阅“五一口号”时，亲自加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有人甚至还由此得出结论说：“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查阅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

这份档案至今保存完好，十六开，共5页，全文竖写，字迹十分清晰。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是胡乔木的笔迹，这说明是胡乔木起草的。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拟出“五一口号”共35条。最后两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而不是郭文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胡乔木起草后，将初稿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看得很认真，用毛笔对其中的第9条、13条、16



影印件第1页和第5页

条、17条、19条、22条、25条、29条、31条、32条、33条、35条做了具体修改，并删去第34条。这里单说第33条、第35条的修改情况。刘少奇将第33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刘少奇修改后，于4月18日将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右侧写道：“毛主席：此件请审阅。如可用，请交尚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看过刘少奇送审的“五一口号”修改稿，毛泽东于4月21日对其中的三条作了修改。一是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

按照惯例，此件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方能正式发出。因此，毛泽东改完后，又在标题

刘少奇和江渭清的一场争论

• 王永华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社教中的若干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争论。刘少奇在给江渭清的回信中,公开了两人的分歧。随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其后,全国开展了对《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的讨论。结果是,各级机关、单位大力反右倾,导致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重大事情;然而,国内外迄

今甚少见到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专门叙述。笔者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试对其来龙去脉做一揭示。

一、江渭清“顶撞”了刘少奇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城乡普遍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

《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下加括号写了“草案”二字,并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上方批示:“尚昆印发。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随后,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这一页的左上方批示:“乔木同志,请印20份。”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档案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毛泽东批改用的是铅笔,因此要区分什么地方是谁修改的并不困难(见影印件)。

经查万年历,毛泽东说的“星期三”是4月26日。会议是如何讨论的,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五一口号”来看,由34条增加到38条。增加的四条是:“向全国为人民服务的知识界致敬!”、“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努力,协助人民政府救济灾荒!”、“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迅速发给土地证,巩固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努力进行春耕!”、“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笔者特别留意看了最后两条,发表时是这样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十分明显,这两条口号自刘少奇修改后直至正式发表,没有任何改动。

事实很清楚,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一条就是“毛主席万岁!”。刘少奇在审阅时,将“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郭文所谓毛泽东在1950年“五一口号”中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并不是事实。

下面说一下“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是怎样产生的。经笔者初步查证,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来延安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们深感自己过去是被人看不起的穷苦人,现在翻了身,成为光荣的劳动英雄,非常感激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于是他们纷纷给毛泽东发出献词。其中,劳动英雄吴满有、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45人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就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个献词刊登于1943年12月1日《解放日报》。中直、军直等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也有“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字句。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朱德在大会做军事报告,报告结束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在大会讲话的结尾也高呼这两句口号。这两个口号,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在党的文件中也经常使用。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后,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四清”运动。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江渭清向刘少奇汇报了江苏省社教的情况。在江渭清汇报时,刘少奇曾有许多插话。接着,刘少奇亲临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作了两次讲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他又说: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刘少奇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刘少奇说:“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江渭清说: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

渭清埋下了伏笔。

二、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

刘少奇离开南京后,在上海、郑州、武汉、长沙等地视察时继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批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蹲点。8月下旬,中央召开6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书记负责干部座谈会。座谈中,刘少奇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的问题,那里曾发生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这就是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高沟事件”,时任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曾就此事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刘少奇赞赏。7月29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这次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来的“根子”。

会议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江渭清回答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经查,在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

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了领导责任。

收到江渭清的上述信件后，刘少奇于9月30日给江渭清回信，批评江渭清给他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其实，刘少奇之所以给江渭清写这封复信，并不仅限于批评“教条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刘少奇认为，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在信中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

通过这封信，刘少奇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

些呢？”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认为“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他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在信末，刘少奇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来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15日，江苏省委发出《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0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批转江苏省委印发的《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认为，“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关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一封信，有一节历史需要补充。最初，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这封信是持赞同态度的。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写了批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批评，肯定了刘少奇“反右倾”的举动。他指出：“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还对这封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话，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1964年年底，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据江渭清回忆：1964年12月中央工作

会议期间,毛泽东问江渭清,刘少奇对他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渭清回答:开始不检讨,刘少奇给他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听后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毛泽东还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1965年11月,毛泽东来江苏视察,江渭清汇报了要按照刘少奇答复江渭清的一封信



江渭清(1910-2000)

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江渭清回答:“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泽东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的态度发生变化原因何在呢?其实,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关于“四清”矛盾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等问题上,已经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指导“四清”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基于这种背景,在江渭清与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争论中,毛泽东站在了江渭清一边。

三、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

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反右倾”的指示精神,各地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在社教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并投入到“反右倾”的斗争中去。“反右倾”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中央要求从政治局委员起一直到县以上各级党委第一把手都要选择一个公社(大队)、一个企业、一个学校去蹲点。

华东地区。据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记载,山东省共组织了5200多名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曲阜蹲点。在曲阜蹲点的还有内务部长曾山、文化部的著名

漫画家华君武、江帆等人。安徽省委书记9人,蹲点的有5人;省委常委15人,蹲点的有8人;省厅局长符合参加社教条件的248人,蹲点的占52%;地委书记蹲点的16人,县委书记蹲点的91人,地、县委第一书记除特殊情况外全部下去蹲点。

江西省地委书记蹲点的23人,县委书记蹲点的230人,占50%。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化名易强到临川蹲点。浙江省抽调厅局长级干部72人、处长级279人下乡蹲点,地委常委74人中,蹲点

的34人;县委常委共539人,蹲点的229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分别到上海综合仪器厂、协昌缝纫机厂蹲点。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化名余勉教授先后到上海宝山县扬行公社城西二大队与奉贤县胡桥公社孙桥大队蹲点。

据《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江苏省委抽调了7个常委和65个部委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下去蹲点。江渭清化名江淮,在句容县天王公社蔡巷大队蹲点。彭冲负责城市“五反”,蹲在南京307厂。此外,省级机关部、厅、局长有247人,下去蹲点的占30.7%;地委正副书记有39人,下去蹲点的占49%;县委正副书记有264人,下去蹲点的占45%。当时在江苏蹲点的著名人物颇多,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陈毅元帅夫人张茜、中央计委副主任薛暮桥、林彪夫人叶群和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

华北地区。据河北省《1964年冬至1965年春“四清”工作队计算表》:河北省各地抽调下去蹲点的领导干部数为:石家庄800人,邯郸669人,承德350人,张家口900人,唐山650人,保定792人,沧州513人,邢台822人,衡水26人,天津586人,全省共计6342人。

北京市委书记处除万里负责面上“四清”外,刘仁、郑天翔、邓拓、陈克寒都下基层蹲点。其余11个常委中,有6人下去蹲点。通县是北京市郊区“四清”的重点,在这蹲点的有中央部委厅局16位负责人,北京市25位负责人及区县19位

负责人。

山西省有 90 个县委书记、5 个地委书记下去蹲点。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副省长卫逢祺在定襄县神山公社镇安寨蹲点。

西北地区。长安县是陕西省“四清”运动的重点县。据《杨尚昆日记》披露，有 30 多名中央办公厅干部来此蹲点，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省长李启明、西北局候补书记刘刚、《红旗》杂志社副主编胡绳等人都在这蹲点。

据《王世泰回忆录》所叙，甘肃省委安排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王世泰、胡继宗、葛士英、徐国珍、丁乃光、韦明等七人去农村蹲点。据吕剑人《我的回忆》所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吕剑人负责喀什专区的社教运动，并在疏勒县洋大曼一区一公社蹲点。

东北地区。据《宋任穷回忆录》记载，1964 年秋，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东北局书记处的其他人如马明方在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在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在农村蹲点。中央机关派出了 34 位负责人和 2800 多名干部在东北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子强在大庆油田。

华南地区。据《百年激荡——20 世纪广东实录》：广东省委书记处也纷纷下乡蹲点。陶铸去花县，赵紫阳去中山，区梦觉去高要，张云去澄迈，张根生去揭阳，寇庆延去惠阳，陈德去阳江。广州市“五反”由曾志蹲点主持。海南岛的“四清”，由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蹲点指导。阳江县是广东省重点“四清”的一个县，在此蹲点的有省军区政委陈德、省委宣传部长陈越平、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省水产厅厅长舒光才等领导干部。

西南地区。贵州是全国“四清”运动的重灾区，由西南局直接指挥，并组织了由西南局常务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和中纪委书记钱英（瑛）为团长的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并从中央各部和军队选派 100 多名师局级干部和西南局各部委及全国 18 个省市抽调出的 2000 多名干部，在贵

阳各基层单位蹲点。遵义县虾子区是贵州“四清”运动的重点，在此蹲点的有劳动部副部长李正亭、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刘翼平、人民大会堂保卫处处长李舒田、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王晓棠等。

中南地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化名林震在湖南湘潭县响水公社蹲点。邵阳是湖南的重点“四清”地区，中国人民银行代行长胡立教、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王卓如、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平水、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政委顾同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启文等人带队在武冈县蹲点。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叙述，全国工交系统 18 个部委有 45 名正副部长带领 22000 多名干部蹲点。高校也开展了“四清”运动，至 1965 年 5 月，全国有 23 所高校搞了社教运动。其中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北大社教是开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包括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在北京大学蹲点。

军队也不例外，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干部参加城乡社教运动的报告》所载，到 1964 年 12 月，全军已抽调 30747 干部参加社教运动，其中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 773 人，包括 67 名将军在内。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福州军区副政委卢胜等都带头下去蹲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 1965 年 9 月到浙江嵊泗马关公社蹲点。

大批干部到基层蹲点，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有助于了解群众的呼声，洞察群众的疾苦，有助于摆脱官僚主义习气。然而，需要如实指出的是，刘少奇在答江渭清的一封信中强调的反右倾思想，以及他在此前后起草和批转的一系列文件，如“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等，对“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左”倾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永华，历史学博士，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 肖 磊

笔者读了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同志关于“特殊案件”的文章。此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披露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安徽全省因饥饿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及人相食1289起的骇人听闻事件。在那只准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年代里,安徽省公安厅能将人相食的这种“特殊案件”材料完整地保存至今,确实不容易。这是那段不寻常历史的铁证。否则,历史最悲惨的一幕将被模糊,甚至被淹没。

几年来,笔者从一些报刊上读到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人相食的事例。虽然不是完整的数字,但也说明,人相食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人相食是饥饿到了极限、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发生。这时即便有一点树皮吃(笔者在山东益都县亲眼见到树皮树头都被吃光),也不会吃人的尸体。真不敢想象那让人恐惧的可怕场面。

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三年灾害期间,笔者工作在山东。据吴玉林主编的《中国人口》山东分册记载:1959年至1961年山东非正常死亡319.9万人。人相食事件虽无全省数字,但从部分案例中,说明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事件。1960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相邻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为了情况可靠,他还亲自到事发地点作了核对。经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的事件。他将情况转告莒县领导部门。因事关政治影响,未敢向本县领导人汇报,没过几天,又相继发现人吃人事件。这时他想起在省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本县同乡陈雷。陈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

员,向他反映,一定会得到重视。这位县检察长急忙忙到省检察院向陈雷汇报了人吃人的情况。陈雷听了甚为震惊,认为如此严重的问题,应立即报告省委主要负责人。此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开会,住北京饭店。陈送走了日照县检察长,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饭店,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日照县人相食的情况。陈雷满以为会得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但出乎陈的意料,主要负责人态度冷漠,且不耐烦地问陈:“你谈的这些情况是听说的呢?还是亲眼看见的呢?”陈雷从问话的口气里听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忌讳听饿死人、人吃人的事件,涉及严重灾情、继续饿死人的情况陈未敢往下汇报,只好悻悻而返。据笔者当时得知,有许多干部向省委汇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情况,都被以“听信传言”顶回去,并告知全省各地“禁止传谣”。有传播这方面情况的,要严加追究。1960年春,济宁火车站一外流人员被劝阻站劝阻(那时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均设阻止人员外出逃荒的机构,名曰劝阻站)。这位外流人员说:“饿的人吃人了,还不让逃荒。”外流人员当即被送到车站派出所,以“污蔑大好形势”的“罪名”关押审查。也是这年的春天,胶济铁路辛店火车站挤满了外流人员,要求上车,被劝阻站阻止。其中一外流人员带着全家数口外出逃荒,被劝阻站挡住,令其全家返回原地。这个外流人员说:“要不是饿的人吃人,谁往外逃荒。”劝阻站的人员说:“你这是造谣破坏。”互相争吵起来,劝阻人员对其打骂。外流人员从携带的炊具中抽出一把菜刀相威胁。适有公安战士在此等候上车,见外流人员手中拿着菜刀,立即端起冲锋枪将这一外流人员击毙。事后政法机关为此发出简报,通报全省,要求劝阻工作不要激化矛盾,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

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批判不服,称自己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自己承担“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想不通。但又说对不起山东人民,在批判大会上,鞠躬向全省人民表示谢罪。在对其批判中,有些地、市干部揭露了大批饿死人,以及人吃人的问题。曾因向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遭到冷落的省检察长陈雷,也壮起了胆子揭露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时遭到的非难。

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顿。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审讯中一作案人供称:“二年内盗挖饿死后新埋上的尸体十多次。一具尸体能割十几斤肉。最初,因全家饿的快要死,吃了几次人肉没饿死。往后盗了尸体煮熟推倒大集上卖牛肉,每斤五元,都抢着买。”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内盗尸煮了当牛肉卖,共有七、八次。卖人肉的还有几个人,他们盗尸体卖比我多。”这两名罪犯各判徒刑四年。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莱阳县城相公社(城关公

社)两位五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们是邻居,白天他们二人还病恹恹地坐在门口石台上说话,都说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间死了一位。当夜其亲属将死者埋到莱阳城东南一里远的丘陵上。活着那位邻居饥饿难忍,在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带着铁锹和菜刀奔向城东南丘陵,掘开邻居的土坟,割下死者两条腿装进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时,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过路人发现,报告了城关派出所,经民警检验认为:盗尸人严重水肿,身体极其虚弱,加之偷尸劳累、恐惧,跌撞而死。通知了盗尸者亲属及被盗尸体亲属各自作了掩埋。

人民用生命写下的历史是无法抹掉的。

(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文革”前和检察机关重建后,任检察员38年。“文革”中停止检察业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7期目录

书屋讲坛	并非“保守”的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语言学困境 若无自由,勿论其他	弓联兵 郭宇宽 陈智俊
人物春秋	追忆沈从文 忽闻海上有仙山 鲁迅的金钱观及消费观 非常时期我的大学生活 ——陈漱渝学术自传《苦舟》中的一章 伤心人别有怀抱 ——徐枕亚的情爱小史	文洁若 李青果 古 昶 陈漱渝 张永久
灯下随笔	法西斯“溯源” 观而察之知是非 阅微杂记 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 “是我们,成了时间的粪土” ——从《摩登时代》到富士康连环跳 且说晚明的“人欲”	柳士同 陈华东 李 乔 胡松涛 曹怡平 曹亚瑟
说长论短	需要网评员吗? 政学合一: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 关于“引蛇出洞” ——与金冲及先生商榷	肖雪慧 王晓华 陈丹晨
域外传真	“交际花”的名衔 枪毙尤金娜 沙土路上的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	贺越明 赵 刚 王炳根
书屋品茗	一部可能改变你我的书 一篇张扬人性恶的宣言——对《狗镇》:一部颠覆整 个人类价值观的影片》的质疑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编后记	赵 晓 解正中 刘 芳
编读往来	与文质彬先生商榷	张 咏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 尹振环

上世纪 60 年代中苏论战,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出版了若干“灰皮书”,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 1962 年出版,内部发行)。

普列汉诺夫在过了 37 年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从 1917 年 3 月 31 日到 1918 年 5 月,普的全部演讲、文章都发表在《统一报》上。普列汉诺夫逝世后,由孟什维克辑录成书,即《在祖国的一年》。转眼之间又过了 90 多年,这 90 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绚丽多彩,有血流成河,饿殍遍地的教训,也有蒸蒸日上的经验。再读《在祖国的一年》,比照一下当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二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分别看看他们的真实目标以及热心追求着什么,他们怎样预料俄国“二月革命”后事态的发展,以及后果是什么,孰是孰非,清清楚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何只检验苏俄的实践?这里不需要别人多嘴多舌,主要引用《在祖国的一年》的一些话,再比较列宁所言所为,然后回顾一下历史实践,就一目了然。

一、《四月提纲》

1917 年 4 月 3 日夜,列宁回到了彼得格勒,4 月 4 日发表了《四月提纲》。这个提纲的主要点是:1.“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全部政权归工人(农)代表苏维埃”;2.“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3.“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4.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工资;以及“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等等。显然这个提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提纲,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纲。

1917 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上,发表了《谈谈列宁的提纲》,说“列宁的提纲是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并说:

懂得一点马克思学说的人,是不可能谈社会主义变革的。

俄国的劳动人民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

我们没有根据断言,我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它不再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阻碍它的发展。

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农民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

普列汉诺夫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一句十分正确的话: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能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

那么列宁的种种号召,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普列汉诺夫一针见血地挑明:

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着重号为普所加)

列宁的这个提纲,当时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加米涅夫、斯大林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列宁提纲只有两票赞成,十三人投了反对票,一人弃权。至于非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认为是“胡言乱语”。

二、是一个人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老问题,又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1893年时,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这本小册子中,就这样写道:

阶级的专政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集团的专政是离得像天和地那样远的。

1917年7月26日,普列汉诺夫写道:“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旦把军权抓到手中,就会为列宁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基础,然而这是迄今为止其他各派都认为这种专政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是有害的。”但列宁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普说:“革命民主派多数派一致认为‘实行这种专政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真的这种专政实现了,那将是什么样的专政呢?普列汉诺夫毫不含糊十分肯定地指出:

那时我们面前将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几个人的专政。

在当时大气候的影响下,普的话委婉多了。其实,同样的话,1875年恩格斯就说过,而且说得更肯定: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然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上述这些话,都像身经其境的真实描述,或者说是料事如神,太准确了!列宁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用列宁的话说是“几个人”的寡头专政,而斯大林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个人独裁,一个人的专政,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专政!

三、组织的只是饥饿

针对有些人号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大谈组织社会主义这种“十足的极其有害的空话”,1917年5月21日,普列汉诺夫写了篇《请有觉悟的工人们注意》,说:“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高度发展(二)国内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

主义生产方式。”否则“组织的只是饥饿”。在“残酷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号召各党派支持临时政府,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共济国难,尽快走出战乱带来的饥寒,这才是缓解燃眉之急的当务之急。普列汉诺夫谆谆告诫工人阶级:“你们应该尽力避免危机”。

过了一个月后,1917年6月29日,普又写了篇《错误的逻辑》。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当它还没有磨好这种面粉前,为了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这特别重要。要遏制列宁的策略,别走错了!不是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外,就没有别的事了?!”

请想想吧:列宁、斯大林是否“组织的只是饥饿”:1918年5月俄国两首都每月每人只有1200克粮食,在彼得格勒很少见到马,连狗和猫都被聪明人拿来充饥了。至于1918—1921年有多少饿死鬼,很难统计了。

但是,拿手边的一些材料来说吧:在“组织的只是饥饿”,还要加上“组织的还有暴政、经济的停滞、落后与人民生活贫困”。

其一,“据西方权威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64319亿元的1/10”。而不是过去官方公布的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60%。

其二,“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劳改”。

“二月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虽然在政治上沙皇专制被推翻了,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民主革命的建设尚百废待兴,这时列宁马上提出了政权要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自然受到加米涅夫等党的核心人物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更反对,更不用说资产阶级党派了。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根本反对的。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及列宁的追随者们,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力求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引起人为的危机,当革命所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制造革命……他们是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希望人为地加速历史进程,当社会主义革命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在俄国制造这种革命”,他们将使

俄国付出极高的代价,它“只能造成俄国政府和革命的灭亡”。

四、普和列两种主张的比照表

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始之争论开始。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以英、法、俄为一方和以德、奥匈、土耳其为另一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普列汉诺夫断言比利时和法国是遭进攻的国家,不仅从比利时看,而且从法国方面看,这是一场正义战争,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根据“道德和权利的通常准则”,同情他们的“自卫”。根据马克思创建第一国际的传统,要反对对比利时的奴役。列宁则力主“不随波逐流,而是把民族战争,虚伪的民族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坚决斗争”。这个不“随波逐流”,正像1937年的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要中国人民不去抗日,而要“无产阶级”发起反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一样的不顾民族大义的荒唐。自然普列汉诺夫只能置之不理。

到了1916年底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半,俄国丧失大片国土,伤亡、被俘350万人,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不少企业因缺少燃料或停电而停产,铁路运输军火军粮的任务无法完成。

城市粮食供应急剧减少。1917年1月底,彼得格勒只剩下10天的面粉储备,肉类完全无货,每天大清早,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家庭忍受饥饿折磨。经济瘫痪,军事失利,罢工不断,士兵疲惫不堪,给养经常不足,不满情绪强烈。这才引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倒了,但经济、军事依然如故。用1917年5月2日普列汉诺夫《祖国在危急中》的话说,“现在俄国遭受着致命的危险”,军事实力迅速趋于崩溃,军队正在瓦解,俄国濒临灭亡,全部事业会倒退若干年,也许俄国会被鲜血所淹没。列宁提出:

第一,立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把资产阶级的领导党——立宪民主党视为“反革命”,同时也把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党,惟独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第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第四,在所有战线上同德国士兵联欢,对革命护国主义不作丝毫让步。

第五,不给社会革命党领导的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推翻它……

普列汉诺夫极力反对,提出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治纲领。

下面我们来逐一比较一下普、列两人的主张:

普列汉诺夫的主张	列宁的主张
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在》,第279页)	列宁把普的主张斥之为“把自己卖给资产阶级”,主张“政权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列宁选集》,二版,三卷,第14、第66页)
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我国还没有到用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方式的时候。	我国已经作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准备。
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严重损害整个国家自己的利益。	我们一经掌握政权,就要制服资本家。(同上,第83页)
要知道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力。(《在》,第198页)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同上,第47页)
革命民主派应该支持自己的(由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消灭经济崩溃……必须同资产阶级各集团合作,这才能拯救俄国。(《在》,第202页,第204页)	推翻临时政府,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应给予任何支持”。与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放弃斗争。(同上,第39页)

普列汉诺夫的主张	列宁的主张
<p>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制度，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思议的。(着重点为原有，《在》，第305页)</p>	<p>建立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p>
<p>为了避免内战，巩固革命成果，“必须同资产阶级各集团合作”。“把工商阶级真正的代表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吧，这样才能真正胜利。”联合各阶级的联合，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联合。否则将“犯极端危险的政治错误”。(《在》，第367页)</p>	<p>从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建立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再到建立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同上，第107页)</p>
<p>要看哪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哪一阶段，最初阶段咒骂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服务，咒骂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参加反德战争≠违背自己的阶级利益。 我们得救之道，不在于国内战争，而在于两个阶级达成自觉的、全面考虑的、有计划的和诚恳的协议。(《在》，第284页)</p>	<p>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是对立的。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专政。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同上，第47页)</p>
<p>“俄国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是防御战争。参加防御战争是义不容辞的。”1917年在全俄国务会议上，号召阶级调和，同德国作战到胜利结束。</p>	<p>“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背叛社会主义。”“在所有战线同德国士兵联欢。”(同上，第45、第83页)使本国在战争中失败。</p>
<p>各阶级的联合，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在》，第367页)</p>	<p>“我们党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同上，第77页)</p>

如果当时俄国采纳普列汉诺夫的主张，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完善民主主义革命未竟之业，再考虑社会主义，俄国哪里会走这么多弯路？

五、普列汉诺夫的预测无一一应验

普列汉诺夫是怎样预测“二月革命”后列宁的努力的后果呢？

1917年9月3日写道：“列宁代替克伦斯基的地位，这将是俄国革命的终结的开始。列宁政策胜利会造成毁灭性的、极可怕的经济崩溃，以致国内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会离开革命者，并且将或多或少坚决地、或多或少彻底地支持反革命分子”。

1917年9月22日，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胜利了。他的事业同现代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事业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点，除了引起反革命和可怕的经济崩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1918年1月13日俄国立宪会议被武力解散之后，普列汉

诺夫预言道：“它是促使我国劳动居民发生毁灭性内讧的一个重大步骤，不是多数人专政，而是集团专政。这是巴枯宁、涅恰也夫的策略。”

果然，毁灭性的经济崩溃接二连三出现了，国内战争爆发了。一直延续了三四年。

没有沙皇的超沙皇专制与军事官僚们的专政出现了，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与极权主义形成了，它侵蚀着整个国家。知识界与商界、农界、企业家中有头脑的人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或被驱逐出境。

否定市场经济，造成极大的浪费与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主观地随意地变动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关系的官僚化与科技文化的落后。

今天重温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对于肯定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力加深改革，防止走回头路，大有教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者来信摘登

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看了2010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一文深有感触,我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叫裴国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今年63周岁,在北京矿院附中退休3年了。我早年是北京钢院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被招工去了青海省,在青海西宁钢厂当工人。由于对“文革”不满,1975年5月,我被人揭发“偷听敌台”,攻击毛主席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书写、散布反动言论,被厂里开会批判,并被处以“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

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虽然我的分数远远超过当时青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第一批录取就张榜公布有我的名字,没想到“政审”通不过,几经努力也没上成大学!

由于当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一种“上大学”的强烈欲望驱使我到处求人帮助,不久“我因政审不合格而上不成学”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其中有一个外车间姓赵的师傅听说此事后就主动带我找到当时一个主管政工的副厂级干部叫杨明福,叫他帮忙想想办法。杨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但是他也很难地说:“你叫我把裴国成写成一个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我都敢写,但是这种政治问题确实爱莫能助,谁也帮不上忙啊!”最后有朋友帮我出主意,不行就到招生办找找人。但是招生办比工厂更“左”,说:“政治问题是原则问题,无论成绩多好也不行,免谈!”青海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历史系的老师都想要我,历史系林均海老师特别同情我,他不甘心,拿着我的成绩和材料找到学校领导,还是被学校拒绝了。1977、1978年以后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原来整我的保卫处长调到厂里当上了教育处长,他把我从车间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语。以后几经转折,1993年年底调回北京。多年来我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工作有些成绩,终于在回龙观和沙河买了两套房子,并于2006年开上了自己的爱车,生活无忧。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将永世不得翻身,别

说自己买房、买车。

裴国成

看了《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何伟先生撰写的《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一文,作为一名国企普通员工,我觉得文中有部分观点和说法不太妥当,具体如下:

一、文中提及“全国7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我不知道这一数据是否准确,但本人的年收入只有在外企工作的同班同学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国企员工的收入并不高。

二、文中提及“石油出口价大大低于国内销售价。”在这里,何先生未能说明出口成品油的组成及数据出处。成品油出口量中一般还包括来料加工数量,而这些油品一般只收取加工费;另外,国内油品价格中包含了销售费用,而出口产品的费用并不包含出口国的国内销售费用。因此,何伟先生在文中进行分析比较的数据并无可比性。事实上,国内两大石油公司都是海外上市公司,除了国内的监管以外,还要接受国外股东的监管,如果国内石油公司真的这么低价出口到国外,海外的股东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三、文中提及的国企持有的特权:“其次,国企享受着国家投资的优先权”。我觉得这一点是十分正常的。国企是国有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国家的投资优先投给国企,是最正常不过的了。总不能国家将全体纳税人缴纳上来的钱,优先投向一个只能惠及少部分人或是个别人的其他所有制企业吧?

四、文中也提及了劳动生产率,并拿中石油的人均盈利和埃克森美孚作比较。本人认为,目前的中国劳动力大量富裕,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已经成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在当前时期,应该将企业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之一,而不应该再去一味追求人均盈利。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脊梁作用,这是谁都无法抹杀的事实。当今的国企还是承担着很多政府或社会职能,国企还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机时最可靠的经济保障。

霍拥军



老人出书
历史见证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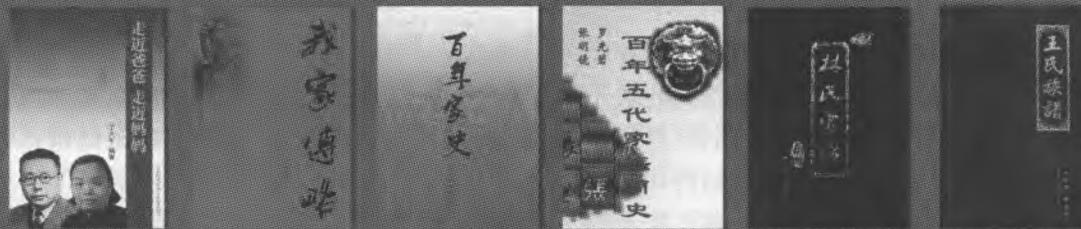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生平传记：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 3、思想论著：理论专著、自研著作，旧文结集、旧书翻印等。

一般标准：

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两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特别说明：

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家族出书
文化传承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谱图册、家史传记！

- 出书范围：
- 1、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录音、摄像，遗作汇编。
 - 2、家史传记：家族大事记、家族先贤传、家谱族谱、家史档案等。
 - 3、传家宝盒：百年家族史、家族图片册、家史光盘、家族音像等。

一般标准：

16开本，封面与重要照片插页铜版纸彩印，文字内页胶版纸黑白印刷，无线胶装或锁线精装。基本价格：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四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一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一作者寄送稿件图片一公司核算成本价格一协商签约支付定金一电脑录入编排校对一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一专业编辑修改一协商设计封面插页一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一作者终审签字付款一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另行协商）。

出版服务专员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 (www.grcsw.com)
《老人出书网》 (www.lrcsw.com)
《家族出书网》 (www.jzcswnet.com)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长途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欢迎订阅2010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0年第**7**期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纪事

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

大饥荒年代迫害上访者史料

刘少奇和江渭清的一场争论

淮海战役日记摘抄

日军投降后的牡丹江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6.90元